

为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繁荣服务

为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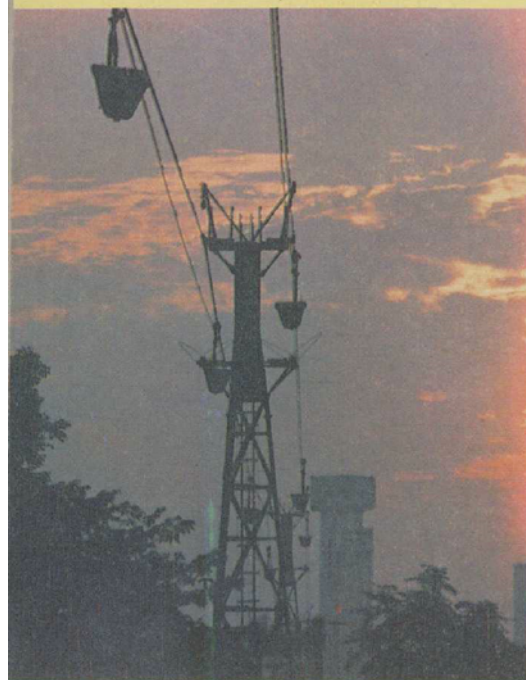
为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服务

学术研究

- 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怎么办
- 中国价格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
- 认识新探
- 论腐败

凡口铅锌矿夜景

凡口铅锌矿在深化改革中前进



▲雄伟的空中运矿索道



▲矿长冯秋明（左四）、党委书记陈先舜（左三）与矿领导班子成员在研究工作。



▲大型选矿磨浮车间



▲办公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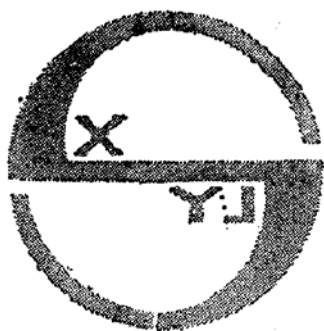
大型井下铲运车



▲外国专家到井下参观考察



铅锌产品标本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州 市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 外 代 号 : BN268

北 京 2820 信 箱

代 号 : 46-64

国 内 定 价 : 每 册 0.50 元

国 内 统 一 书 号 : CN44-1070

ISSN 1000-73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 穗 工 商 广 字 207 号

本 刊 每 逢 双 月 25 日 出 版

学术研究

双月刊

1988年第六期

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李文治 (八〇)

「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景钟 雷泉 一诞 (八四)

梁启超是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回国的第一人.....张铁宝 (八七)

·国情、省情、市(县)情·

凡口铅锌矿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体会.....冯秋明 陈先舜 龚天培(执笔) (八九)

韶关毛巾厂的外向型发展经验.....郑 净 (九二)

·国际经济之窗·

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向.....罗克明 (九五)

·小 品·

论腐败.....舒 展 (一〇〇)

杀鸡吓不住猴儿.....老 烈 (一〇三)

治官倒良方.....杨浩泉 (一〇五)

·书海酌蠡·

客方言——「牵阳叛」的语源略释 (潘允中·八八) 《茶经》成

书时间考 (杨 浩·三〇) 文天祥佚文 (官桂銓·九九)

《易·讼》九二爻辞解 (黔容·一〇四)

·学术动态·

广东省青年书法理论研究会成立(九一) 本刊参加广州地区报刊

咨询活动(四一) 《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第一卷出版(二八)

《学术研究》一九八八年一—六期总目录..... (一〇七)

封面设计：陈沛林 总校对：黄荣显

目 录

ISSN1000—7326

总第 九十一期

成绩显著 形势严峻 试验区怎么办？

——广东理论界、实际工作者研讨综合改革理论与对策
……
本刊记者 郑英隆 (六)

· 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 ·

中国价格改革的困境与对策……………林江 (一五)
实现价格改革的配套措施……………贾葛辉 (二〇)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杨越 (二四)
近年来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简述……………陈明央整理 (二九)

· 哲学研究 ·

认识新探……………肖君和 (三一)

适用于普通逻辑的文恩图解……………马铁军 (三七)

评《资本论》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同一性……………傅小平 (四〇)

科技进步与民主发展……………吴志明 (四二)

·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 ·

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王琳 (四六)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

——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本刊记者 林有能 (五〇)
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本刊记者 凌峰 (五六)

· 文史研究 ·

《文心雕龙》的修辞论……………谢红华 (六〇)

论艺术心理治疗的意义……………丁宁 (六五)

粤北古代知名诗人述略……………黄志辉 (七〇)
「商团事变」前后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温小鸿 (七五)

CONTENTS

After Mak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Now Confronted with
a Grim Situation, What Should We Do in the Experimental Zone?
—A symposium held by scholars and Practical Workers in
Guangdong on the theory and tactics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Zheng Yinglong (6)

The Predicament of China's Price Reform and the Ways to Deal
with It Lin Jiang (15)

The Matching Measures for Carrying Out Price Reform
.....Jia Gehui (20)

Several Theoretic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Building Up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Yang Yue (24)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Recent years
..... (Edited by) Chen Mingyang (29)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Concerning Cognition
..... Xiao Junhe (31)

"Venn Diagrams" that Are Applicable to General Logic
.....Ma Tiejun (37)

Comments on a New Book; *The Identity of Dialectics, Epistemology and
Logic as Expounded in the Book "On Capital"*.....Fu Xiaoping (40)

Socialism: The Progress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dvan-
cement of Democracy.....Wu Zhiming (42)

The Progress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ll-round Deve-
lopment of ManWang Lin (46)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Lin Youneng (50)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 famous historian Li Shiyue's reply to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newspaper reporters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Ling Feng (56)	
"The Theory of Rhetoric", as Expounded in the Book "Wen Xin Diao Long"..... Xie Honghua (60)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rtistic Psychological Therapy.....Ding Ning (65)	
A Brief Account about Well-known Ancient Poet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Guangdong.....Huang Zhihui (70)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Merchants in Guangdong before and after the "Incident of Merchants' Guild".....Wen Xiaohong (75)	
The Academic Attainments of Mr. Liang Fangzhong and His Methods for Scholarly Research..... Li Wenzhi (80)	
The Historical Role Played by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Jing zhong et al (84)	
Liang Qichao—the First Scholar Who Copied and Carried Back to China from Abroad Printed Book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 dom.....Zhang Tiebao (87)	
Our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 em at the Fankou Mine.....Feng Qiuming, Chen Xianlin, and Gong Tianpei (who did the actual writing) (89)	
The Experience of the Shaoguan Towels Factory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onomy (Production) of the "Export-oriented Type"..... Zheng Jing (92)	
The Current Tre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EconomyLuo Keming (95)	
On Corruption..... Shu Zhan (100)	
The Killing of a Chicken Cannot Scare the Monkey and Stop Its Evil-doingLao Lie (103)	
An Effective Way to Expose and Punish the "Official Speculators and Black-marketeers"Yang Haoquan (105)	

成绩显著 形势严峻 试验区怎么办？

——广东理论界、实际工作者研讨综合改革的理论与对策

本刊记者 郑英隆

与会者的公认，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综合症”只能通过综合深化改革来解决。

对综合深化改革的入手，提出多种思路，其中有一种主张：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战略。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变换机制，而三大机制是一种配套关系，难点在宏观层次，应把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作为带动改革全局的“牛鼻子”。推进宏观承包制，可以构造调节总量平衡的宏观调节机制。总量平衡，天下太平，总量失衡，天下不宁。经济不稳定，又不得不实行紧缩银根，压缩投资规模，而且又得强调集中统一，难于完全避免“一控就死”的现象再度出现。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与对外开放”重大决策以来，中国正进行着一场特殊的“革命”。这场“革命”成绩显著，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亦遇到严峻的挑战。今天，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广东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的决策者们于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广州举行“广东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理论与对策研讨会”。与会者总结经验，面对现实，对显著的成绩和严峻的形势进行估计与预测，寻求广东试验区综合改革的理论与对策。

人们一谈到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往往提到特区、开放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看到广东人的思想观念更新快，商品经济发展程度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优于内地等等。而对广东理论界

及其理论研究，则认为是个只出经验，不出理论的地方。其实不然，商品经济理论首先在广东大地生根和发展，促使广东商品经济观念快速更新，放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商品供给大幅度增加，市场繁荣。所有这些成就与广东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又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有制问题、外向型经济理论、山区经济发展理论、财政包干、价格改革、住房改革、金融改革……等理论的研究，都直接配合广东经济实际，形成了广东理论

研究与实践应用紧密结合的一大特色。

当然，从整体来说，我国改革与开放，一开始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十年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盲目性，尤其在这攻坚阶段，出现了改革过程的“综合症”，其特征表现为：投资攀比，楼堂馆所制而不止，物价大幅上扬，通胀压力沉重，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经济问题骤然上升，新旧体制转换的摩擦与冲突更加尖锐，人民埋怨情绪不断加剧。这也是广东试验区面临的问题。下面是这次研讨会的综述。

一、别无选择——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综合症”只能通过综合深化改革来解决

综合改革方案的出台与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标志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了全面攻坚阶段，配套改革和综合改革试验是治理“综合症”的良方。

广东省体改办提交的研究报告分析了新旧体制转换期的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①中央和地方在各自的职能转换之中，尚未建立起协调的关系，导致宏观的失控，尤其是投资失控与货币发行失控。②企业体制方面，新的企业制度还未确立起来，尤其是国有企业，至今尚未解决财产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因而产生许多复杂的情况。③从市场体系看，整个市场体系、市场价格机制还没完全建立，“双轨制”价格导致企业的扭曲行为、政府工作人员腐败及舞弊行为难以根治。④宏观管理方面，对商品经济实行有效地宏观调节的经济没有形成，商品经济的各种法规不健全，造成市场组织、市场行为紊乱，缺

乏正常的市场秩序。

价格改革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省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何杰指出：广东从1978年至1987年，物价水平上升了69.3%，平均每年上升6%，改革过程中曾出现过三次物价上涨的高峰，第一次是1981年上升9.3%，第二次是1985年上升13.6%，第三次是1987年上升11.7%，今年上半年继续出现逐月上升的势头，比去年同期上升22%。涨幅之大，远远超过1978年以来的三次大升幅。由于物价上涨幅度大，出现了承受能力的制约：一是成本上升，影响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二是部分人民群众的生活负担及心理承受能力跟不上；三是整个改革开放政策和政府的信誉将受到严峻的考验。目前物价问题已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

经济的过热现象与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相交织。经济过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基建规模超过工农业产值及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1988年前8个月，全省工农业产值增长32.1%，而基建投资却增长45%以上，这促使信贷失控、造成通货膨胀，加上原材料紧缺，“官倒”抬价激发物价全面上涨。

与此相伴的是，企业经济效益不高，表现在，①亏损严重。1987年全省国营工业企业亏损户占12.39%，亏损额达1.13亿元。②利润率下降。1987年全省国营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率和资金利税率与去年相比均呈下降趋势，资金利税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原因是销售成本率上升了2.34个百分点。③人平工资上升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87年国营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14.87%，而人平均工资却上升了15.19%。④企业职工生

产积极性并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形势是严峻的，改革就是打破旧体制建立新秩序。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综合症”在所难免，只有通过综合改革去解决，我们别无选择。

二、综合改革，从何入手——战略的大决战

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由于改革是牵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的根本性变革，长期维系着的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必须打破与重组，它意味着社会要建立起新的秩序、新观念、新机制。改革的历史表明：改革越向深层发展，目标越接近，就越触及问题的本质，阻力和风险也就更大。

从何入手，选取何种方案，才使第二阶段改革的实效更接近期望值，才减少社会的震荡与摩擦，这是当前举国关注的问题，也是广东当前理论与实际工作者面对的现实。尽管与会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但强调综合配套改革，似乎是一个共识。然而一接触具体现实，综合配套改革又将选择哪一点为突破口？或说，以什么为基点来牵动“连环扣式”配套改革，才是最有效的呢？研讨中大致有如下四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广东省政府体改办主任易振球同志提出的“双线推进，配套改革”，即：系统设计，全面配套，分步实施，区域推进；以创造现代企业制度和理顺价格，完善市场体系为重点，加深综合改革试验；力争在五年内基本建立新经济体制框架和商品经济新秩序，促进广东经

济稳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使全省人民进一步富裕起来。主要依据是，改革已经进行了近十年，广东积累了些经验，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已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应该而且有条件系统地进行设计，把各方面改革依照目标模式全面配套进行，如果继续“零敲碎打”，就可能出现“体制打架”。另一方面，企业、市场、政府三个层次（环节）本来就是一个宏大的系统，从系统论观点说，它又是一个多变量的自组织系统，每一个变量产生的变化，对整个系统的运行状态，都会发生连锁反应，体制系统必然要用系统的方法来进行改革，仅是单方面进行的做法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因此，他们不赞成“价格改革中心论”与“企业制度改革中心论”。

据此思路，提出广东今后五年改革的重点对策：①从理顺财产关系入手，进行所有制形式及其管理体制的改革，创建现代企业制度。②在价格改革方面，要放调结合，以放为主，大部放开，分步实施，形成市场价格机制。③设立与“三权”分开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相适应的新的政府机构。同时对计划、外贸、物资、物价、金融、财政等宏观管理的职能和行为方式进行配套改革。④区域推进与全国一盘棋结合起来。⑤大胆研究，移植、吸收、消化现代化商品经济管理的有效西方法规和制度，健全经济法规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的正常秩序提供法律保障。

第二种思路是“突破中间、带动两头”。暨南大学教授张元元、李金亮认为，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应是具有政府、工商企业、居民、金融企业、外国这五元构架，产品、资源、货币金

融、国际四大市场全面发展，并在国家宏观间接调控下，由价格机制推动运行的发达的大市场经济。据此目标模式的设想，他们主张，综合改革的总体战略，应以市场为突破口，即从建立市场和完善市场机制着手，形成强大的市场力量，从而一方面带动各种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带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综合配套，同步进行。

这种战略的选择，基于几点思考：①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各个企业活动的场所，也是政府调节的对象，市场机制建立和完善了，就会迫使企业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改革自身的经营机制，逼使政府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改变自己的职能。这样就可以加快改革的过程，达到广东超前改革的要求，争取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新体制的框架。②广东的改革起步较早，市场机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育。以市场为突破口，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种市场机制，具有有利的条件。③目前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价格的双轨制，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弊端：即人们所形容的“市场通行官场的原则，官场通行市场的原则”。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只有加快建立和完善各种市场机制、市场秩序，才能及早结束。

第三种思路是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的改革战略。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王琢研究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变换机制，大的机制有宏观调节机制、市场调节机制和企业行为机制。这三大机制是一种配套关系，不可能齐头并进，一步到位。三大机制变换的难点在宏观层次，所以他主张把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为带动改革全

局的“牛鼻子”。他认为，改革的措施是推行分层次的宏观承包制，包括财政、信贷、外汇平衡的宏观承包制，构造分层次的自我约束需求机制，打破层层争吃国家“大锅饭”的自我扩张需求机制，治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顽症——投资需求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基金膨胀、通货膨胀。他认为，推行宏观承包制，可以构造调节总量平衡的宏观调节机制。总量平衡，天下太平；总量失衡，天下不宁。经济不稳定，又不得不实行紧缩银根，压缩投资规模，在经济上又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且又得强调集中统一，难于完全避免“一控就死”的现象再度出现。

他认为把市场机制改革作为带动改革全局的“牛鼻子”是办不到的。因为形成市场机制要有两个基本条件：（1）要有个买方市场，才能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要把需求膨胀的卖方市场变为供需平衡的买方市场，只有改革宏观体制，形成分层次的自我约束需求的宏观调节机制，才能解决问题。（2）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开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形成价格，才能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放开价格要求宏观总量平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改革宏观体制才能办到。

第四种思路是由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郑炎潮、广东省计委经济研究所聂周荣、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张向荣等提出的。这种思路是紧紧抓住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解决所有制问题，尤其是如何重新构造新的公有制问题。但是所有制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市场、离不开生产要素和产权的商品化、市场化。如果产权无法出卖、转移，财产关系

很难理顺。同时，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牵涉到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如果不对国家职能、政治体制、上层建筑进行彻底改革，政企无法分开，国家和企业的财产关系极难理顺，所有制改革极难深入。

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市场——价格改革是整个改革中难度最大、风险最大的，这个改革险关既不能绕过，也不可冒进。但市场——价格改革离不开所有制改革，离不开理顺企业产权关系改革。市场——价格——工资的放开，意识着企业成本上升，就要求企业要有更大的独立性来进行风险投资、提高经济效益，这就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将企业承包制转向股份制、转向企业制度的创新。同时市场——价格的放开，首先要求政府放开市场、放开价格，取消计划价格、行政管理，这都需要政府管理改革配套。

中国十年改革的道路说明，要搞活企业，要放开市场，要搞好经济的总体平衡，都必须改革、健全宏观管理机制。但宏观管理改革如果没有搞活微观企业和放开市场配套，政府经济职能既无法转变也无法完善。

可见，所有制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宏观管理改革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相互牵动的改革，不可单线独进。因此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应选择系统改革全面配套的方案。这种思路的核心为，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的系统改革，使所有制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宏观管理改革协调配套，将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改革、开放、发展三位一体协调配套，全面创造新

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文化体制。

研讨会上各抒所见，畅所欲言，立意使综合改革试验区尽快走出困境，至于各种思路的可行性如何，将由综合改革试验区实践来检验。

三、争论的“热点”——广东当前改革与发展的四大专题

这次研讨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四个专题：（一）广东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二）广东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与对策；（三）广东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四）广东发展的科技与培养人才问题；形成争论的四大“热点”。

1. 抑制物价上涨、治理通货膨胀，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物价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已成了当前改革的障碍，是影响社会安定、社会经济秩序的主因子。

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多种评说。国家体改研究会常务干事詹武教授认为，主要有三大因素：基建规模过大（特别是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消费基金膨胀、财政赤字靠银行发票子冲平。王琢则认为，通货膨胀的实质不在发票子，而在需求膨胀。因为银行多发票子是被动的事，而不是银行的自主行为。其根子在理论与体制。在理论上盲目崇拜凯恩斯主义，在发展上追求高速度，八十年代几乎年年预算赤字；在信贷体制上，一是以中央为中心，实行全国统一的指标控制。二是中央放权，分级管理。造成了政府用钱，信贷失控，政府不用负责；银行负责信贷平衡，又没有独立自主权。因此，一放就

胀，一控就死。

如何治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既是当前宏观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又是稳定宏观经济的一项重要课题。詹武一再强调，治理通货膨胀，要狠抓四大平衡，即财政平衡、物资平衡、资金平衡、外汇平衡。他运用了建国以来三次成功的例子作为借鉴。王琢认为，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间接调节办法；二要彻底了解凯恩斯主义，不要盲目仿制；三要恢复广东的信贷承包制；四要加快企业制度改革步伐，理顺产权关系，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不要让政府过多地用行政干预银行业务。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家驹认为必须处理好搞活企业、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宏观控制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来管理。

省体改办的报告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必须实行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措施。所谓治标，就是坚决控制货币发行，紧缩信贷，紧缩投资，刹住不合理的消费膨胀。但要避免1985年底86年初的“一刀切”，不分对象的紧缩。为此应采取几项措施：一是提高存贷款利率，使存款利率不低于通货膨胀率，使贷款利率抑制企业的贷款需求，而转向更多地依靠自己积累；同时要实行差别利率，对生产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和出口产品的企业流动资金少加息或不加息，对基本建设和乱搞加工区的，要实行高息甚至惩罚性利率。此外，还要加强物价检查，整顿中间转手、哄抬物价的公司。所谓治本，就是深化改革。在通过对企业财产关系的理顺，改革企业组织和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建立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财产约束机制的基础上，刹住需求膨胀的

根源，结合这样的改革，要进行企业产权的有偿转让和拍卖，实行货币分流，压缩消费性货币流通，增加投资性财源。

市场经济研究组的报告则另有看法：他们认为，在现有新旧体制并存，供求关系不平衡，社会利益结构刚性等状况下，任何旨在调整比价关系的改革措施，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这是改革必须要经历的“阵痛”阶段，也是改革必需付出的代价。如果为此而放慢改革，全社会仍然要继续忍受旧体制的资源浪费与供给短缺，从而在长期发展中付出的代价更大。而愈快推进和深化改革，实行市场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供给，“阵痛”也就愈短。

2. 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的转换、调节。

广州市经济研究所的市场经济综合报告起草小组综合了多种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在如何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问题上，常常遇到双重困难：既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作用，发展竞争，又不能象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时期以自由放任推动自由竞争，要避免出现类似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对生产力的冲击破坏；既要用以间接方式为主的政府调节取代直接的计划调节，但又缺乏发达完善的市场体系作调节市场的基础。他们认为处理好当前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关系，必须强调以下三方面问题：①强调政府对建立、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作用，排除政治上和体制上的障碍，为市场运行提供法律上和行政上的保证。②强调政府调节手段本身的市场化，即在继续减弱行政过多干扰市场的同时，经济参数的确定必须以竞争

条件下形成的市场化价格为依据。③改变传统的狭隘的公有制观念,构造多层次的、不同组合的公有制经济企业。政府调节的主要任务是谋求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从阶段划分来看,政府调节的内涵分别体现在三个层次:从短期说,政府调节的重点是通过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证各级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掌握价格变动总水平和进出口平衡;从中期说,重点是通过推行产业政策以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从长期来说,重点是通过研究和确定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战略以达到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目的,确定公平、效率、整治环境、社会责任等一系列法则。

广东的社会主义外向型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的实现,有赖于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由于市场自身存在着的缺陷和“盲点”,需要政府从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调控与疏导,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再直接插手企业的微观决策和营运活动,让市场充分发挥其调节供需的积极作用。政府主要职能是,制定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规划及总体思路,确立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权等总的原则,把握总的经济发展方向、速度以及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保证经济行为的规范化和经济运行的协调;组织发展公用事业部门以及对仅靠市场难以调节的大型经济项目进行协调。

3. 外向型经济——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外向型经济的升格。

华南理工大学关其学教授、广东省外经贸委魏廷华等这样估价广东当前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些特点:①发展外向型经济

已成为全省各行各业共同目标;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就要形成一个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突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对接和对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问题。②我省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外向型经济战略带动了经济增长。它把发展出口产业放在主导地位,从而建立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新科技方向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以轻型劳动密集产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只能为今后外向型经济发展打个基础,进一步发展必须伴有产业的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外向型经济的根本转轨才能完成。

这里要求在经济发展上有一个有效的间接调控机制,即正确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走向更高层次。

广东省外经贸委七人小组报告认为: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依据之一是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动。据测,从现在起到90年代世界各国都面临正在到来的工业革命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一般认为,再过二三十年,在若干尖端科技领域将出现新的突破并转化为生产力,90年代正是为今后世界大变化做准备的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在进行不同方式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整,有可能出现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包括不同于现在力量的组合。这是挑战,也是机会。

4. 科技进步与人才是综合改革与发展一体化的根本所在。

世界经济的竞争,实质是科技的竞争,

人才的竞争，外向型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因而科技进步与人才对以外向型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作用。

近年来，广东科技进步对经济的促进，突出反映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并通过大量的设备和技术引进，使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广东外向型经济的科技进步对策”专题研究组对地方政府科研与开发机构的科技队伍数量与质量、科技投资、科技成果等科技投入产出的分析结果表明，广东在国内诸省市中综合能力排第9位，技术开发能力排第12位，科研机构明显出现研究骨干严重缺乏，即“人才断层现象”。

报告指出，当前开放的前沿地区外向型企业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劳务成本迅速提高，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加剧，这意味开放前沿地区以低层次出口加工为特征的外向型发展的第一阶段将逐步过渡到以技术和知识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第二阶段。对科技人才、科技知识的渴求将显得更为迫切。我省的人均资源不占优势，迫使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必要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但另一方面，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虽然国家宏观利益迫切需要科技进步，而在微观上，由于体制、政策和领导者素质等原因，企业的这种需求还不很强烈，这些奇特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省人才研究所的文章分析了这种状态：广东科技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科技队伍难以缓解的老龄化趋势，人才偏态分布、后备力量开发能力不足，科技人才管理体制没有实质性突破，将是困扰广东

综合改革开放与发展一体化的严重困难。

为推进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他们主张①组建人才搜索公司，重新制定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敞开大门全方位、多形式地补进各种人才。②实行“双向选择”的用人制度，适应扶持有效的人才社会调节机构，加快培育和完善人才市场，为人才潜力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③加大教育投资，调整教育结构，搞活教育，制定地方性教育法规，保证加快中初级人才的培养。④充分发挥“五大”毕业生的作用。⑤充分发挥50岁以上的专业人才，包括接近或已进入退休年龄的专业人才作用，延长他们的科学生命期。⑥多形式地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尊重知识、人才的社会风尚。

四、改革呼唤理论，理论更要创新

如果说改革开始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到了以综合改革为标志的阶段，该以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的标准来构建新体制的理论，否则，就会被历史推向无所适从的境地。

广东目前改革所显现出来的“中期综合症”和改革越向纵深发展，举步越艰难的态势说明，当改革已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冲刺，从而使得旧的理论显得无能为力时，改革就再也不只是靠经验、常识和勇气所能驾驭的了，改革需要实践，更要理论创新。

市场经济综合研究组的报告，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理论模式：包括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市场体系，动力结构四大块。组织结构模式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制经济、集体经济、私

营经济、股份、合作经济、中外合资、外资独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经济。运行机制模式是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模式，同时形成一个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机连接的运行机制。政府调节必须要以市场运行的客观规律为依据，以市场组织和经济参数为中介，以充分发挥和完善市场作用为前提，最终达到保证社会生产力协调发展的目的。市场体系模式是建立一个架构完整、发育完备、秩序良好、辐射面大、作用力强、与国际市场对接的、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以信息市场为先导、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动力结构模式是创造一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平等竞争、自由选择、共同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形成按劳动、资本、土地、科技、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多元的、高效的市场动力结构，充分调动个人、企业、政府的积极性，共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郑炎潮提出的广东综合改革试验的新理论模式是：公私混合结构论、有序市场运行论、多元分享动力论。公私混合结构论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应是一种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混合结构，其特征是①公私的长期并存互补，都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主体。②两个系统都是开放型的，相互渗透，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公私混合，公私统一。③这种公私混合的主要组织形式是股份制及证券市场。有序市场运行论是指新经济体制运行主要是靠建立一种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其内涵是：①各种生产要素商品化、

市场化，各种资源主要靠市场配置的运行模式。②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有序的，既保留市场的充分活力，又避免市场无法从总体上协同的弊病。③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它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制订出各类市场运行的法规、秩序，让市场运行的各类主体——政府、企业、团体、个人都共同遵守。多元分享动力论是指新体制运行的强大动力，不是单元驱动的，而是诸生产要素作为多元动力共同驱动形成多元的动力结构。因此，单元的按劳分配或单元的按资分配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模式，而应建立一种按诸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大小进行共同分享利润的多元分享分配理论。

综合改革实践和理论的深化，应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根本的指导。王琢等人提交的《过渡社会主义论》论文，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探讨。他认为，当今世界上有种种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有斯大林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有南斯拉夫模式的自治社会主义，有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社会主义等等。什么是当代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过渡社会主义。它包含两层意思：①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我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上又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②现时我国正处于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够格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过渡社会主义社会。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总揽改革全局。

以上理论观点、对策对广东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参考。

责任编辑：黄振荣

中国价格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林 江

●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缺乏效率导致价格信号扭曲，企业无法灵敏反应价格上涨的信号；价格的放开上扬未能抑制总需求的膨胀。

●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放开价格，刺激总供给增长，平抑总需求，从而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当前主攻目标是控制总需求。

●强化国家的宏观控制，严控货币发行量，提高人民币信誉。

价格改革困境所在

必须明确，中国进行价格改革是基于以下的假设（Assumption）：即社会产品供应不足是由于价格没有反映商品之价值，企业没有生产积极性而造成的，如果调整商品价格，让企业得到利益，产品供应就会增加。从目前中国价格改革陷入“比价复归”的困境看，我们不禁要对价格改革的现状及前景进行深刻的反思。

笔者认为，价格改革出台必须有两大前提：一是从当今社会现状看，企业单位能否在价格放开后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应，重新调配社会资源，增加短缺商品的供给，使市场价格恢复均衡；二是价格放开后，价格的上涨是否能反映社会总需求，换言之，价格的上涨能否抑制总需求。

经济学术语中用价格的供给弹性（Elasticity of supply）来描述第一种情形。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市场缺乏效率导致价格信号被严重扭曲，从而当某些商品价格上涨时，企业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这里可以从两个层次看：第一层次是企业不一定想跟着价格调整。长期以来，国家对企业实行统购统销，企业产值的90%以上均通过各种税收形式归国家所有，企业亏本由国家补贴，由于不是自负盈亏，生产增加并不会给企业带来多少好处，企业也就缺乏生产积极性。第二个层次是，即使企业愿意跟着价格调整，希望增加某些短线商品的生产，但投资权并不在企业，生产什么均列入国家计划，计划外的商品生产是没有

充分的物资来源来保障其正常运作的，因此价格放开后，企业单位也只得望洋兴叹。事实上，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里，价格是供求关系的指示器，社会资源随着价格的变动而流向效益最好的部门。但在中国，市场却被人为地分割，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力量去阻止社会资源的流动。以广东省为例，据统计，该省工业原材料的70%要靠内地省区供给。实行地方承包后，内地省区不太愿意继续以低价向广东提供原材料了；另外，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企业风起云涌，纷纷与国营企业争原料，造成原材料供应极度紧张，物资供应不足，企业无法对价格作出相应反应，增加生产和供给。因此，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下，价格的供给弹性很小，价格上升无法达到增加供给的预期目的，相反，企业成本会随原材料价格上涨而不断增加，结果是市场价格的轮番上涨。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价格上升后，社会总需求能否降下来，即考虑价格的需求弹性有多大。

毫无疑问，对当前商品市场冲击最大的是国内企业、事业单位的集团购买力。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营企业）可获得固定的财政来源，包括政府财政拨款以及银行信用贷款。价格上涨后，其集团购买力依然如故，社会总需求并无减少。另外，中国基建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大，从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缺口。据统计，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一万亿元，九年累积超过二十六年的总和。同时，改革开放九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日益改善，手中的货币收入也逐年增多，从而对消费品市场形成一种潜在的

需求。价格改革伊始，社会舆论宣传使人们一开始就对价格改革寄予过高的期望，一旦改革没能给他们带来即期利益，就可能变希望为失望，且会预期价格会节节上升，因而出现到银行挤提存款，超前消费，把货币大量投入商品市场抢购以求“保值”的现象。由此观之，因企业单位财政来源的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庞大的集团购买力高踞不下以及受人们预期心理影响，在价格放开后，社会总需求不但没有压抑，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概括说来，我们可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由于中国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完善的市场体系，价格放开后，价格不一定能反映市场供求情况，价格信号一定程度上遭到扭曲；二是在传统的投资体制未改变前，企业不一定愿意按照价格的变动作出相应的行动；三是即使企业愿意行动，但客观现实却处处掣肘。这三个结论无疑削弱了价格改革的效果，从而中国的价格改革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不改变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市场机制难以发生作用，要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也就遥遥无期了；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价格改革却步履维艰。那么是否要等到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出现后才去进行价格改革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只有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才能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价格改革的出路

必须指出，当前的价格改革已非八六年时所指的作为经济改革突破口的价格改革，其实，价格改革问题已决非单从价格

入手就可以得到解决的，其牵涉面极为广泛，必须依靠企业体制改革、货币金融改革等其它措施来配套进行。

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固然是希望放开价格后，增加社会总供给，平抑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经济体制的基本转轨，使市场机制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但在笔者看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社会总需求。若社会总需求不断上升，放开价格仍无济于事，反而会造成价格轮番上涨，互相攀比，这当然与产业部门之间结构失衡有关。因此，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同时，国家应采取有选择的紧缩政策，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加快包括投资体制在内的企业体制改革的步伐固然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国内讨论得较多，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想详细赘述，而希望就货币金融政策如何配合价格改革的进行以及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谈谈个人的想法。

其实，企业单位面对各种物资上涨的情况而总量需求没有下降多少的原因在于企业资金主要由拨款和银行信贷渠道供给，银行资金供给的“大锅饭”体制至今尚未改变，加上贷款利率偏低，得来十分容易，企业也就不会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及成本核算。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当然是对策之一，但却无法根治“大锅饭”的弊端。从长远来看，较为有效的办法是削减银行信用贷款在企业资金中所占的比例，迫使企业转向社会集资，即采取直接融资（Direct Financing）的方式，它包括企业向社会发行中长期债券和上市股票来筹集企业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这样做效果一举三得：一则由于企业资金来自于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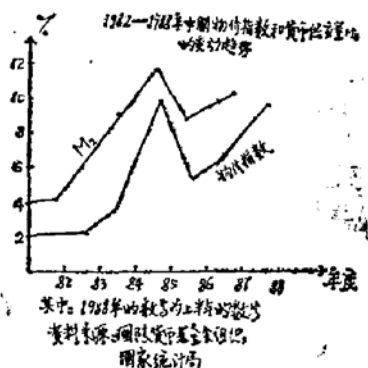
会，债券到期不管经营状况好坏，都须还本付息，企业压力增大，就会力图把资金使用效益提高；股份企业则要向股东负责，股东也会通过参与股东大会或董事局会议去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改善管理水平，从而增加社会产品总供给。二是有了一个有效的债券和股票市场去吸收社会闲散资金，避免其变成巨大的购买力去冲击消费品市场。三则通过银行信贷渠道或财政拨款给企业的资金少了，国家可集中这一部分资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集中力量狠抓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等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的建设，为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

中国的债券、股票市场的形成才刚刚起步，1986年初，沈阳市办起了全国首家股票交易所，代理当地上市企业发行股票以及进行有价证券的买卖。尽管交易量不大，但毕竟是新生事物，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巨大反响。上海也是全国最早成立股票市场的城市之一，且近年来发展很迅速。目前上海已拥有九家较具规模的股份制企业，公开上市的股票有五种，共一千六百万股，去年下半年放开了股票价格，交易日趋活跃，平均每星期成交1600股。在债券市场方面，广东省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1984年，广东的佛山市已开始发行债券。目前，广东省正筹备成立证券公司，进一步开拓股票市场。另外，为了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到能源、交通等部门建设中来，应适当提高基本建设债券利率。

制定适合国情的货币政策

要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抑制通胀，

国家必须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有人认为，中国通胀率的急升是因价格改革引起的，其实不然，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量失控，造成货币流通量过剩。据统计，中国今年上半年通胀率升至33%，而1987年只有7.3%。预计今年实际通胀率至少较官方估计高出一倍。另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中国1987年第三季度的M₂①比1986年同期增加30%，按平均计算，M₂自1985年至1988年间增长了35%，今年货币供应量仍不断增长。因货币供应激增，消费品价格暴涨。在传统的体制下，财政可以向银行透支，财政赤字也就靠多发钞票来弥补，从而使通胀率加速上升。相信在资金市场逐渐完善后，国家可通过发行公债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来弥补赤字。通胀抑制得住，价格改革也就得以顺利进行。



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 宏观控制职能

目前国内大力推行企业承包制，这固然是企业体制改革的良策之一，一定程度上防止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但这并非万应良药。事实上，各地在推行承包制后，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以省与省之间、市

与市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出现的经济分割最为令人头疼现象，地方政府设立重重关卡，以保护地方经济利益为理由，严格限制原材料及其它物资流出，使一些大城市的国营骨干企业的正常生产因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受到影响。另外，在承包之后，地方企业大多乐意追求短期利益，而回收期较长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利润回收率较低的原材料工业却无人问津。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全国工业总体增长率为17.2%，其中原材料工业只增长3%，无疑原材料工业的缓慢增长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当前国内各地工业部门之间结构失衡的状况愈演愈烈，而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又只侧重于放权让利给地方，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去解决实施承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社会资源遭到严重浪费。为了增强省与省、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建议中央政府当机立断，采取选择性紧缩的政策，一方面，控制住主要原材料的价格，保证大型骨干企业的正常运作及其原材料供应渠道畅顺；另一方面，收回地方的部分财权，集中力量去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能源、交通设施建设，狠抓原材料生产，否则的话，社会总供给无法得到增长，而社会总需求又高踞不下，进行价格改革是徒劳的。有人可能认为选择性紧缩会使改革倒退，其实不然。因为价格改革并非仅指放开价格，在“放”的大前提下有选择地“收”有助于冲出价格改革所面临的困境。

设法提高人民币的信誉

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人民币在国内群众心目中的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近

来黑龙江和广州等部分省市出现群众抢购的现象就是证明。不可想象,若人们对国家法定货币失去信心,社会总需求不能有效地控制下来。对于如何重建人民币的信誉,各种意见众说纷纭,较有代表性的是主张把人民币再贬值50%,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贬值一来可以抑制外汇黑市的猖獗气焰,二来可鼓励出口创汇。笔者对此举不敢苟同。因为人民币的外汇牌价与其实际价值相背离已是公开的秘密,从现状出发,鉴于目前黑市交易的状况,贬值50%并不足以使人民币的外汇牌价与实际价值相一致。而当前沿海开放城市正致力于增加出口创汇,在产品换汇成本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取缔公开的“黑市”——外汇调剂中心,则无异于将“外向型”企业推向深渊。至于说本币贬值可刺激出口,也要视客观条件而定,上文已谈及,中国的价格需求弹性与价格供给弹性都很小,未必符合“马歇

尔—伦纳条件”^②(Marshall—Lerner Condition)。到时不但不能增加出口,抑制进口,而且还会使国内通胀水平进一步上扬,后果不堪设想。为今之计,国家不能听任外币、人民币、外汇券三种货币同时流通的现象再继续下去,此外,必须动用国家行政力量下决心取缔非法的外汇黑市交易;而对于外汇调剂中心,则要加强管理,严格控制交易价格,只有这样,才能重建人民群众对人民币的信心,价格改革才能奏效。

①: M_2 包括现金、定期储蓄存款。

②: 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原理。它表明,只有该国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绝对值之和不小于1,贬值才能增加出口。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 黄振荣



实现价格改革的 配套措施

贾葛辉

广东实现价格改革必然要遇到困难和风险,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精心设计,扎实工作,作好各方面配套改革。

主要是加强价格改革的物质基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发挥国营商业部门的流通主渠道作用;切实加强市场物价的宏观管理,建立市场交换的新秩序;工资改革必须与价格改革配套进行;注意处理好省内外的价格关系。

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从广东的实际来看,实现价格改革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最基本的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是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环境中进行价格改革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新的价格改革措施不出台,市场物价水平也会因供应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而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今年我省率先对粮、油、蔗(糖)等重要农产品的购销体制和价格进行改革,但在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22%中,价格改革的直接影响大约5%。所以,在现阶段我国处于短缺经济的市场环境下进行价格改革,市场物价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下一步所要改革的价格大部分是基础商品,其价格既低于价值,又不反映供求,改革必须要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相关商品价格上涨,牵动整个市场物价的上升。社会总需求过大,不仅导致通货膨胀,给企业、财政和群众生活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不利于形成比较合理的价格体系,很可能使旧的

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复归”,使价格改革的任务难以完成。其次,我省的企业虽已逐渐适应市场调节,但现在消化原材料价格上升的能力并不很强。据对广州市11个行业300多家国营工业企业的调查,对原材料涨价的压力,通过节约物耗消化的只有3%;通过开发新产品进行分解的有35.7%;通过产品提价转上市场的有42.3%;完全无法消化的有20%。另据统计,全省国营工业企业中1987年亏损面占13.7%,处于盈亏临界线的占25%。据此推测,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生产成本上升压力的只有30%,70%的企业将以各种形式把涨价的压力转上市场,或关停并转。企业能不能把涨价压力转上市场,不仅取决于省内市场的承受能力,还取决于省外市场和外贸部门的承受能力(我省工业总产值约有一半要在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实现),若我省产品价格过高,将直接影响产品的外销和出口,反过来制约我省企业的生产。若我省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能

以较髙速度发展，将缺乏承受价格改革的物质条件。

我们认识价格改革的困难和风险，并不是要使改革的步伐停顿下来，而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精心设计，扎实工作，作好各方面配套改革，实现价格改革的既定目标。

价格改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利实现价格改革目标，必须有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主要配套措施是：

（一）努力发展生产，增加商品供应，加强价格改革的物质基础。

价格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市场的货源多了，供求矛盾才可能缓和，物价也就不会暴涨。要把价格改革和发展生产有机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各级政府对关系人民生活密切的商品和大宗出口商品，要加强生产指导，建立和健全生产基地，实行集约化经营，并要随时根据市场变化和供求情况，调整政策，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生产的发展。

而生产发展的根本之点，在于深化企业改革。为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如理顺企业产权关系，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真正做到自负盈亏；认真执行《企业法》和《破产法》，让那些长期亏损而又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的企业破产，逼迫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积极推行企业股份制，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充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等等。

（二）采取多种措施，调节控制社会总需求，为价格改革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首先，全省上下必须统一思想，采取

得力措施把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压下来；投资重点应转到能源交通和主要原材料等，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其次，搞活金融，把消费基金更多地转化为生产资金，在现行银行财务体制同中央挂钩和我省无权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城乡信用社的吸储能力（因城乡信用社的财务体制同地方财政挂钩），同时大力发展地方性的非银行金融组织，积极推行股份制，把居民购物保值引导到购股保值上来，这既可减少消费又可增加供给。其三，开征一些地方性税种，增加财政收入，这既可控制消费又可为改革筹集资金。其四，拍卖一些长期亏损的企业特别是商业小型零售企业，财政既可抛掉包袱又可增加收入。其五，在实行住宅商品化中出卖一批公房旧房，既可增加财政收入又可引导居民消费，减轻对其它商品购买的压力。

（三）国营商业部门必须发挥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

目前市场体系还不完善，许多重要商品不能自然流通，造成有的商品此地积压彼地脱销，价格此跌彼涨，成为价格波动过大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明确规定国营商业、物资、粮食、外贸和供销部门发挥主渠道作用，承担商品流通、平抑市场物价的责任。对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要明确经营部门的职责分工，克服目前无人对市场负责、商品流通不正常、物价波动过大的被动局面。主渠道的经营部门要掌握市场的供求情况，发布市场行情，传递供求信息，正确引导生产，通过合同关系组织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为市场提供货

源。努力做好收购、供应工作，保持合理库存，组织渡淡措施，实现市场供求平衡，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

（四）切实加强市场物价的宏观管理，建立市场交换的新秩序。

价格放开后各级政府要对市场物价进行更高层次的管理。要根据“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实现对市场物价的宏观调控，建立市场交换的新秩序。

第一、认真研究商品经济环境下各种经济规律运动对价格的影响，同时发挥财政、税收、金融、工资和汇率等的作用，制订带宏观性的中长期价格政策，以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通过调整某些重要差价关系以制约和调节其他商品价格，使国家定价和市场调节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良性的价格运动。同时，建立健全高效的价格信息网络，通过价格信息的搜集、传递、咨询和发布，实现对市场供求和价格运动的科学引导。

第二、完善和发展价格调节基金制度。

价格调节基金（也叫价格风险基金）是实行市场调节之后政府用以对市场物价进行宏观间接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我省今年开始已试行主要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并初步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尤其要广开调节基金来源和深入研究基金的使用办法。建议设立一项地方调节税，向价高利大的商品以及大宗的进出口商品开征价格调节基金，财政开立专户，用于主要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和某些

专项商品价格的调节，避免或缓解突发性因素对上述商品价格和生产的冲击，保持市场上主要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条件成熟的行业，要尽快建立行业性价格调节基金制度。

第三、尽快建立和健全物价法规。研制企业定价、涉外价格、反暴利等地方法规，以及行业性价格管理办法，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商品价格和收费管理。严肃查处中间倒卖，层层加价，哄抬物价，谋取非法暴利的不法行为。

第四、政府要保留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对放开的重要商品要规定作价原则或作价办法，推行合同期货价格、行会协调价格。当市场出现某种特殊情况时，对某些非国家定价的商品实行最高限价或最低保护价。

（五）工资改革必须与价格改革配套进行。

第一、在不断推进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应与经济效益密切挂钩，并随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和竞争过程的渐趋正常化，使企业内部分配制度逐步完善。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企业职工工资将不但可以实现对物价上升的补偿，而且能够根据生产发展状况获得相应的增加。

第二、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工资水平，应根据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市场物价变动情况作出灵活调整。这样，才能保证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在获得物价上涨的补偿之后，还能因经济发展而每年有所提高。

第三、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应尽快过渡到通过社会劳动保险制度统筹解决。工资发放的标准，同样考虑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的因素。

(六) 必须注意处理好省内外的价格关系。

第一、与中央的价格关系。

广东的价格改革要继续比全国先走一步，所以，必须努力争取得到中央的支持，落实好国函25号文中规定的各种政策权限，尽量弱化由于改革时间差所带来的矛盾和摩擦。某些牌市差价过大的生产资料价格调放，要与中央出台的时间差保持适度，不宜过分“超前”；粮食价格改革可考虑先搞试点，以点带面，分区进行的办法；指令性计划调给中央的物资，执行国家统一价，差价由中央计划内调入广东物资的牌市差价（统收省财政）弥补；广东的大宗进出口商品（包括应联合成交的进出口商品）的对外成交价，进口执行国家最高限价，出口执行国家最低限价。

第二、与内地省份的价格关系。

广东的价格体系实行市场调节的深度和广度皆大于外省，必然会与内地省份尤其是毗邻地区存在一些矛盾和摩擦。而正常的商品流通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调节。因此，应采取“宏观适当调控，微观放开放活，积极疏导协调”的原则，在

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尽量处理好与内地市场的价格关系。国家指令性计划调进调出广东的商品，执行国家统一价格；国家规定某些限价的非指令性计划商品价格，广东境内按照略高或略低的价格安排，并尽量协调，减少对内地省份的冲击；广东率先调放价格的某些生产资料，可与原料产地实行“产销一条龙”联合，增加的差价收益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以弱化对方的封锁动因。

第三、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关系。

为有利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外向型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省内的市场价格必须逐步实现与国际市场价格适度挂钩。但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价格瞬息万变，广东作为社会主义整体市场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任由国际市场价格涨跌所左右和冲击，必须配合关税、汇率的变动，以及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管理制度等，协调内地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关系，主要进出口商品，应遵循统一对外的原则，执行国家有关价格政策和市场策略；有关部门必须密切注意国际市场信息尤其是金融、产销和价格信息的变化，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和减少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

作者单位：广东省价格学会

责任编辑：郑英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 若干理论问题

杨 越

一

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成果，智慧的结晶，历史发展水平的标志。从所属的领域来说，它划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当人类告别了野蛮时期，便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明。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说，精神文明可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中的一些部分，具有人类的共同性，一些部分则打着阶级的烙印。一般都具有其历史性和连续性。所以，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进入文明时期以后，人们几乎没有间断过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思考、探索、研究和阐述。关于精神文明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丰富积累，是人类社会的一项珍贵的遗产。

二

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服务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使人们逐渐懂得，不能正确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理解我们社会的性质和它所处的阶段，便无法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会事倍功半或寸步难移。所以，在理论上提出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是十分明智的，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便被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的重要标志。

现在，回顾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程，并实事求是地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的认识，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就多次发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这以后，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实践。当然，这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普遍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虽然还不能说深入，但它提出了许多理论性的问题。由于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实践，精神文明的建设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后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回顾和讨论了这些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及时地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和分析了一系列的理论性问题。可以说，作为指导方针，它初步建立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具体表现在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身的理论建设，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这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创造的观点的结晶。

四

我们曾经提出以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核心的观点，这个观点从远景来说是正确的，但它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决议》在《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部分，明确指出：“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中国和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一方面又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一系列新问题。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命题。用这种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便在理论上保证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既不迷失方向，又不脱离实际，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可能成为十亿人民共同努力的事业。

五

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是在我国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有没有其发展的阶段性？当前处在什么阶段？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许多失误，相当程度上根源于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以便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克服前进中的矛盾，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这个过程，由于历史的、社会的诸因素，必然会呈现由低到高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不同的国家，必然会具有各

自的特色。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以为可以一步登天的观点，或者否定社会主义的现实性，把社会主义当作水月镜花的观点，实践证明都是错误的。

《决议》重申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基本论断，并规定现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决议》是在分析现阶段的道德建设问题时说这番话的，这实质上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要领，指明了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途径。

“这个论断非常重要，对我们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清醒的认识这一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就可以避免‘左’，也可以避免右”。（赵紫阳）回顾过去的实践，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特别是联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身的理论建设，它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也将起着制约的作用。

六

理想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理想建设在根本任务中居于首位，是一切素养的中心。没有理想，或者理想卑劣，其他都不会有什么可取。

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这一认识，逻辑地规定了理想的层次性。在理想的认识上，我们过去只承认一个层次，不谈理想则已，一谈理想就是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个最崇高的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切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但是这个最高理想显然不可能是中国全体人民在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普遍追求。存在决定意识。如果我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坚持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自然会承认理想的层次性，实事求是地在高度重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同时，提出在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所能接受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理想建设问题上，科学地把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克服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片面观点，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同国外侨胞，总之，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将会证实提出现阶段的共同理想这个概念的科学性，充分显示理想的层次性这个创造性的理论威力。

七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因此，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道德建设，也不能不受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客观实际

的制约。这种制约便表现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层次性。

我们的最高理想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此相适应，我们也将建设人类最高的道德水准——共产主义道德。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不能忘记现阶段实行的还是按劳分配，还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还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等。这表明，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还不丰富，人与人之间还有差别。这就迫使我们在道德建设上不得不正视现实，承认道德要求的层次性。从而肯定社会主义道德这个概念，并科学地确立社会主义道德的准则。

《决议》在道德建设方面主要规定：

第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在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承认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相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

第三，社会主义道德反对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

第四，要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第五，要尊重人，关心人，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人，尊敬老人，尊敬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

残疾人。要遵守公共秩序，讲文明礼貌。要提倡人人爱护公共财物，保护境环和资源，自觉履行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受到危害的时候，要挺身而出，英勇斗争。

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所以，社会中的先进分子，他们在道德修养上往往会达到更高的层次。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决议》最后提出在道德建设问题上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道德建设的层次问题，社会主义道德的准则问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道德建设作了理论的阐释，它将有力地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又将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加深我们在理论上的认识。

八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这个道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要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同步以至

超前的发展，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兴旺和成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身的理论建设是当务之急。这是理论研究领域一项很有意义的创造性的工作。

当然，《决议》没有也不可能回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全部理论问题，有些问题不容讳言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挥，但它的确初步地建立了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并且对若干重要问题作了精辟的创造性的论述，取得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突破性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

（本文是作者为《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一书所作的《前言》，本刊刊载时略有删节。该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第一卷出版

列为广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研究”已在1987年按计划完成实地调查，并编写出《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第一卷，于1987年10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新世纪出版社出版45万字的《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一书，向国内外发行。此书由穗、港两地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教授（暨南大学方言研究室主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和张日昇

博士（原香港中文大学语言研究室负责人，现香港理工学院中文及翻译系主任）共同主编，两地青年语言学者多人参加编纂。目前，这一科研项目仍在继续进行，调查报告的第二卷《词汇对照》（50万字）已在印刷中。第三卷《综述》正在编写，预计1989年10月以前全书共三卷出齐（150万字）。

（韦恩）

近年来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简述

陈明央 整理

近几年来，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他们从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现摘要简介。

同志们认为，特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特区的意识形态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由于特区的政策、经济结构、地理环境、战略任务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效果具有不同于我国内地的特殊性，因此决定了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与内地精神文明建设不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保证特区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也是特区的物质文明建设得以较高的速度和较好的效果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

2. 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的特殊政策能够毫不动摇、贯彻始终的保证。这是因为，特区的特殊政策是特区的生命，没有特区的特殊政策就不会有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特区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持之以恒，是特区的特殊政策得以坚决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

3. 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特殊的经济结构赖以站稳脚跟，发挥威力的保证。特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一个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综合体，而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则是这个综合体的主体成分。加强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保证各种经济成份能够置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下，健康发展，才能够真正用社会主义的形象来塑造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形象来塑造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

4. 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特区各项事业繁荣的保证。特区毗邻港澳，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阵

地，易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在特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需要进行革命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确保“四有”新人的健康成长。建设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不仅仅是提供物质条件，还包括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风貌和社会秩序。这样才能增强外商和内联单位的投资安全感和经营的信心。

5. 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特殊的战略任务能够预期完成，全面实现的保证。因为第一，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信息，借鉴科学管理方法，发挥“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辐射的枢纽作用的保证；第二，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作为我国体制改革的试验场所，通过改革试验，总结经验，为内地提供有益借鉴的保证；第三，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特区人才的成长，使更多的干部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至于如何加强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志们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1. 要按照特区的特殊规律办事。解决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比翼齐飞的问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解决好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向同步并进的问题；此外，还要从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革命的原则性同革命的灵活性很好地统一起来，处理好下面几个关系：借鉴（吸收）和“抵制”的关系；“搞活”和“管理”的关系；“疏导”和“堵塞”的关系，坚持“堵”“导”结合，以“导”为主；“宽”与“严”的关系。在思想道德和生活作风上，我们对特区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求比较严格，而对在特区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则不苛求。

2.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紧紧地抓住两条：

从教育入手，从实际出发。

3. 要培养一代新人，树立一代新风。

4. 特区精神文明建设要树立适应经济建设和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新观念，克服旧观念。大力提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观念，勇敢打入国际市场的观念，按国际规则和惯例办事的观念，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机制的观念，以及时效、质量、信息、信誉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开拓创

新观念，等等。在这过程中要注意不断克服僵化的观念，破除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封建的宗法观念、平均主义、本位主义和特权思想、专制作风，等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达才



《茶经》成书时间考

杨 浩

唐代陆羽的《茶经》成书于何年，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元756—780年之间，跨度长达二十四年之久，未免笼统。考《茶经·八之出》载：“……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因此，弄清“浙西（浙江西道）”的设置时间和区域，当能有助解决成书时间。

据新《辞海》载“浙江西道，唐乾元元年（758）置”，《中国历史大事年记》中唐乾元元年十二月条下有“置浙江西道节度使”之记。当时的浙西道管辖那几个州呢？《旧唐书》三十八卷有具体记载“浙江西道节度使，治润州，管润、苏、常、杭、湖等州”，这说明，当时的管辖范围内没有歙州。据《旧唐书》等记，公元758年，改称新安郡的歙州复其旧名，但当时隶属于宣歙饶道。次年（759年），歙州改隶浙西道管辖。一直到大历元年（766年）重又划归宣歙饶道。据此，可以把《茶经》的成书年限大为压缩，定在公元759—766年之间。因为很明显，陆羽不会把不属浙西道管辖的歙州凭空划入其管辖范围之中的。陆羽在写作《茶经》时始终居住在“浙西之湖州苦溪”，对于当时浙西道的管辖及建置变化应该是了解的。

有的同志把《茶经》的成书定在公元760年。其主要依据是《新唐书·隐逸》中的“陆羽传”，应当说这种说法是比较切合史实的，但笔者认为仍有商榷的余地。首先从时间上看，公元760年是乾元三年和上元元年尾首相接的一年，上元元年始于是年的4月。在这大半年里，陆羽并非如《新唐书》所说“阖门著书”，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茶树种植、茶叶品质等的研究上，大部分时间奔走于湖、常、润州等地考察，他的好友皎然去拜访他也时常扑空，在《寻陆鸿渐不遇》诗中就有“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之语。再从客观环境看。是年11月，扬州长史刘尺叛乱，陆羽所居住的湖州一带也逃脱不了战火的洗劫。叛乱到次年才平息。最后，收在《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中的“陆羽自述”，其中说已有著作“《君臣契》三卷……《茶经》三卷”，《茶经》列于末尾，似在自述写成之前不久完成的，自述写于“上元辛丑岁阳秋二十有九日”，即上元二年（761年）八九月间。

因此，笔者认为，《茶经》撰写于760年，而成书于761年之说，应当是更合史实的。

《书海酌蠡》责任编辑：刘斯翰

肖君和

认识新探

现行哲学教科书和辞典，都把认识看成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有很大的片面性，即使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也未能避免这种片面性。为了克服这种片面性，应将认识看成是“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文章采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此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

我国编辑出版的各种哲学教科书和辞典，都以“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断语给“认识”下定义，还认为“反映指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的模写，即认识。”^①这就在“认识”和“反映”之间划上等号。其实，认识是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认识”和“反映”之间划等号是不对的。

—

认识的基础、第一环节和实质，都与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它们或者是这种相互作用的本身，或者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体现。这种情况都将说明，认识是人脑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一）认识的基础是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实践是

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中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它又反转来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认为，生产活动、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实践。这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生产活动、生产劳动是认识的最基本的基础。那么，作为认识的最基本的基础的生产劳动又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人就“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②显然，作为认识的最基本的基础的生产劳动，是人（包括人的头脑及这个头脑生产出来的“目的”）和自然变换物质

或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其实，就前提而言，实践是由人的要求(主体)和外部现实性(客体)这两个方面组成的。这两个方面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能动的潜力。有了这两个方面作为前提，一般实践就必然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且这种相互作用总是存在着“从客体到主体”和“从主体到客体”的方向相反的运动：一方面，是客体本身的结构和属性制约、规定着人的活动，并引起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另一方面，是主体根据自己关于客体的知识在符合自己需要的形式上占有客体，使客体从属于自己的目的。③这样，人的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实践），就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包含着“从客体到主体”、“从主体到客体”这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相互作用、变换物质的过程。因此，认识以实践为基础，就意味着以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为基础。人脑是认识的器官。以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当然就是以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为基础。这个基础包含着人脑和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着的两个方面。基础包含着两个方面，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认识也就包含着两个对立面以及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说，认识基础的人脑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性质，必然导致认识本身的人脑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性质。

（二）认识的第一个环节是人脑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形成的“合金”。

认识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它包括两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阶段）、六个环节（感性认识的感觉、知觉、表象，理性认识的概念、判断、推

理）。这两个阶段、六个环节是紧密相联，构成系统的。感觉是感性认识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它的性质对于整个认识过程、认识系统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感觉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呢？

传统观点认为，“感觉是指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然而，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感官生理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这种传统观点很不圆满。事实告诉人们，感觉的内容同客观刺激的关系极其复杂，感觉不是或不完全是客观刺激物的直接反映、复写、摄影和模写，而是人脑以及感受器、感觉传导通路等与客观世界的某种“合金”。对于患某种疾病、酗酒和“心不在焉”的人来说，客体的作用无论多么强烈，也只能在视网膜上留下“视网膜象”，而不能产生主观映象，也就不能形成感觉，因为这样的主体没有或不能调动主体的神经系统和感官去注意或投射客体（即作用客体）。常人看起来很漂亮的一块色布，在印染工人眼里却看出了着色的不匀，常人听起来很美的一首乐曲，乐队指挥却听到使他痛苦的杂音，这是因为以往的经验影响了感觉。同一盆水，冷手觉得热，热手觉得冷，这是受到感官原有状态影响的缘故。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感觉受到刺激量、作用时间、需求程度、准备状态、情绪状态、以往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将诸多因素中与外界环境有关的因素概括为刺激因素（S），与主体状态有关的因素概括为主体因素（O），则感觉应被看作是由刺激因素与主体因素共同决定的〔E =

$\hat{f}(s, o)]$ ④。还有人用下列数学公式来表示： $S = f(x_1, x_2, x_3, x_4 \dots)$ ，这里的S代表感觉变量（因变量）， $x_1, x_2, x_3, x_4 \dots$ 为自变量，其 x_1 为刺激变量，代表客体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 $x_2, x_3, x_4 \dots$ 为情境变量，分别代表诸多感觉器官的状态，人的机体在不同行为条件下的主观状态，以往的经验及有关的知识对当前感觉的影响，等等。感觉的这一数学公式表明，感觉是刺激变量和情境变量的函数，依赖于刺激变量和情境变量，随着刺激变量和情境变量一起变化。感觉的这一数学公式还表明，传统观点所谓的“感觉是客观事物的直接反映和复写”，只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即 $x_2, x_3, x_4 \dots$ 这些情境变量等于零、接近于零（也就是可以忽略不计）或为常数。⑤

我们可以说，“所谓感觉是从外部刺激力向意识的转变，就是感觉‘合金’的‘冶铸’过程。参加‘冶铸’的，不仅有大脑皮层，而且还有感受器和感觉传导通路，其中大脑皮层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⑥既然作为认识过程、系统的第一个环节的感觉，都是主体（以大脑皮层为主）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金”，那么，建立在感觉基础上，与感觉相连的其他认识环节以及整个认识过程、系统，都是主体（以大脑皮层为主）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都是这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金”，就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了。

（三）认识的实质是体现人脑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内外信息的混合加工过程。

正因为人的认识是一种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活动的，正因为人的认识是主体（以

大脑皮层为主）和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及其产物，所以，在产生认识的过程中，主体在先前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方法、知识，所形成的立场、观点、目的等因素，将以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即内信息）的方式，和眼下从客体而来的信息（即外信息）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现为内外信息的混合加工过程，即以各种内外信息为原材料制成成品的过程，而绝不仅仅是生理反映过程。

这种内外信息的混合加工过程，首先表现为认识的选择性。这里单以视觉的形成为例。科学实验证明，人的眼睛通常只能对大约由380—760毫微米的电磁波进行加工，并分别反映成为不同的主观色觉形象。对红外光波和紫外光波，人的眼睛就没有接受加工的能力。这说明，视觉器官对客观世界的光信息是加以选择的，它以光信息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为加工对象；同时，对某些非光刺激也以视觉形象的形式进行加工。视觉形象既决定于客观实在的一定属性，又决定于视觉分析器的性质、结构——功能。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一定波长的电磁波，经过主体一系列的选择、加工、制作而转换成主观的色觉。对颜色的感觉，就是主体对光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的产物，而这种选择、加工的实质就是主体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体现人脑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信息加工过程，还表现为认识主体对客体形象的补充性。这种补充性突出表现在知觉的形成上。知觉具有整体性，而这种知觉整体性特点不仅在于它对当前的感觉材料进行选择、整理、加工，还在于它能够把过去的经验加上去，以求形成对当前感知对

象更加生动和确切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联想常常是不知不觉地参与的。联想不是当前的感觉和知觉过程，而是过去的知觉的回忆和联系。显然，联想的参与，意味着主体及其经验对客体形象的反映进行补充。

感觉和知觉的形成既然是主体和客体对象相互作用的内外信息混合加工过程，那么，作为认识阶段的思维就更是如此。根据苏联著名神经心理学家 A·P·鲁利亚提出的关于人脑三个机能联合区的理论，外部世界来的新的信息在大脑皮质第二机能联合区第一级皮质区被采纳。接着，在第二级皮质区里，与人脑内部的旧的信息存储（记忆里的东西）汇合，并被混合加工。这加工的产物即半成品，可以成为意识在第三级皮质区里储存下来，也可以继续前进，被传送到大脑皮质第三机能联合区，并在第三机能联合区第三、第二级运动皮质区内，汇同更多的旧的信息存储，被进一步加工如行为目的、程序、计划、纲领。这种行为目的、程序、计划、纲领作为意志的前提，在第一级运动皮质区里被发射到外围。也有不被作为意志前提、运动冲动发往外围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会被以意识形式再次储存下来。上述的层层混合加工的过程，就是人们所说的思维过程。在这里，内信息就是主体内部的信息，外信息就是客体对象所发出的信息，内外信息的汇合、混合加工，实际上就是主体和客体对象的相互作用、变换物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认识的基础，人的认识的第一个环节（乃至所有与之相连的环节，以及整个认

识过程、系统），人的认识的实质都与主体和客体、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它们或则是相互作用的本身，或则是相互作用的产物，或则是相互作用的体现。既然如此，人的认识的人脑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性质，人的认识是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二

提出“认识是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观点，其实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要求。因为现代物理学、现代控制论、分子生物学、现代心理学等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认识是主体和客体、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我们仅以玻尔、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为例加以说明。

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认为，在一切科学研究中，被研究的客体对象与研究者的本人，包括研究者使用的观察工具及测量仪器，都是“相互作用”着的。实际的研究对象，并不纯粹是客体属性，而是客体与研究者的“相互关系”。在一般的科学研究中，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极其微弱，可以忽略不计。而在量子物理学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研究过程中一丝微弱的光线，就足以改变作为观察对象的基本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这些基本粒子自身的物理属性是无法准确测定的，所能测到的只是观察对象与观察手段之间的相互作用。海森堡把这种情形归结为“测不准原理”。显然，玻尔、海森堡等所揭示的“测不准”现象，有力地说明认识是主体和客体对象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主体对客体对象的反映。如果仅仅是

“反映”，那就“测得准”了。

三

现在，我们将“相互作用”论同反映论做个比较。

“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第一，客观世界作用于人脑，表现为客观世界反映到人脑里面，亦即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第二，人脑反作用于客观世界，表现为人脑对客观世界、客观事物进行评价。

马克思论述人的劳动时曾经指出过，人在劳动中“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①为了达到“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的目的，人就要知道客观事物“是什么样子”；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要懂得哪种自然物对人类“有用”。正因为如此，人的认识活动面临着二重任务：既要从事物出发，对客观世界里的各种事物进行符合其本来面目的如实反映，又要从人自身的需要出发，对客观事物是否有利于人类生活进行评价。显然，作为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认识，是由“反映”和“评价”组成的，是“反映”和“评价”的统一。认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反映论”者，只看到“反映”方面，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评价”方面，这就是片面性的具体表现。相反，认为“认识是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既重视“反映”方面又重视“评价”方面，这就全面了。

说到这里，有人会不以为然：“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能够避免你所讲的片面性呀！”不错，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比较机械

反映论来说，确实要进步得多。它认为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是直观的、消极的反映，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能动的反映。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之能动的飞跃。然而，即使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也没能避免反映论所固有的片面性。第一，所谓“反映”，指的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的“摹写”、“复写”或“摄影”。不论是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论，还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都建立在对“反映”的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既然如此，它们就都是片面的，都是一种从客体到主体的信息运动，都是一种主体在头脑中再现客体事物的活动；它们不可能包含相反的从主体到客体的信息运动的成分，也不可能包含主体对客体事物进行反作用的内容。第二，与前一点相连，能动的革命的反映仍然是从客体到主体、从外到内的单向线性的活动。列宁说得好：“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②列宁的话表明，人的意识（即认识）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从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的一种方向（暂且定它为“正方向”）的运动；其二，从主观世界到客观世界的另外一种方向（暂且定它为“逆方向”）的运动。前者为“反映”，后者为“创造”。显而易见，反映论只看到“反映客观世界”的正方向运动，而未同时兼顾“创造客观世界”的逆方向运动；第三，与“创造客观世界”相连是对客观世界进行评判。因为评估、判定了客观事物与人类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搞清了客观事物对于人类生活有没有价值或意义，确定了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目标，才能

指导人们按照主体自身的需要去创造客观事物。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本质，决定它只能研究如何反映客观事物的问题，而不可能同时顾及如何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客观事物进行评判的问题。

总之，即使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只要它还是反映论，就不可能避免反映论所固有的片面性。要避免这种片面性，就要用包含反映论全部正确成分而又超出反映论范围的“相互作用”论来代替反映论，如实地承认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所揭示的真理：“人的认识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人在积极的活动中认识世界，在整个认识过程中存在着对外界输入信息的主观加工”，^⑩如实地承认人的认识是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认识是人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认识是内外信息的混合加工过程，这种新的理解可以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个正确认识的获得，有赖于认识主体的内信息和客体对象的外信息这两个方面的积极因素的发挥。这就是说，为了获得正确的认识，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对认识对象、客观事物进行了解，从而对客观存在的各种事物作出符合其本来面貌的如实反映；此外，我们还要从认识主

体的自身需要出发，利用以前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技能，对面前的认识对象、客观事物进行评判、评价、估计。须知，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着改造世界，既然如此，在认识过程中，就不能只知道认识对象、客观事物“是什么样”或“怎样存在”，更重要的还应该知道认识对象、客观事物对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无价值”或“是否有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学习，使自己具有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经验技能，使自己具有更多的内信息。

① 见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哲学分册）》和《简明社会科学词典》。

②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③ 参见《哲学研究》评论员文章：《加强主体—客体问题的探讨，深化认识论的研究》。《哲学研究》1988年第3期。

④⑨ 参见谢小庆《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认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⑤⑥ 参见王树茂《关于感觉的几个问题》，1983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

⑧ 列宁《哲学笔记》，第228页。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责任编辑：范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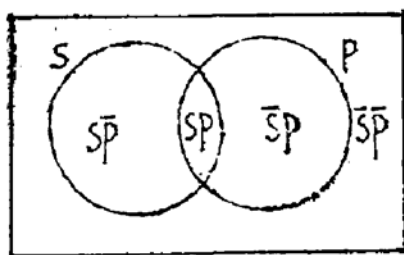
适用于普通逻辑的文恩图解

马铁军

有人把文恩图解引入普通逻辑，但未能证明从两全称前提推出一特称结论的有效式。①有人通过设定主项存在的方法，来用文恩图解检验直言三段论的全部有效式，但是因第四格 AEO 的存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不完善的。②那么，适用于普通逻辑的文恩图解究竟应是怎样的？这正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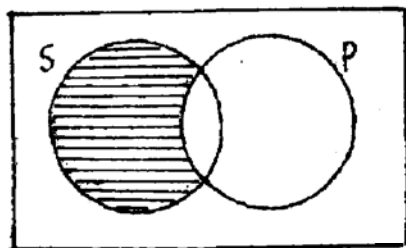
一、原文恩图解不适用于普通逻辑

对 A、E、I、O 四种直言判断的文恩图解通常是以方框内两个交叉圆圈为基本方式。方框表示论域，两个圆圈表示主项和谓项，方框里由于交叉圆圈而划分出的四个区域表示在论域内可能包含的类。若以 S 示主项，P 示谓项，则四个类为： $S \Delta P$ 、 $S \Delta \bar{P}$ 、 $\bar{S} \Delta P$ 和 $\bar{S} \Delta \bar{P}$ 。此四者也可简写为： SP 、 $S\bar{P}$ 、 $\bar{S}P$ 和 $\bar{S}\bar{P}$ （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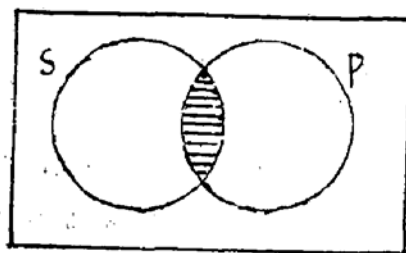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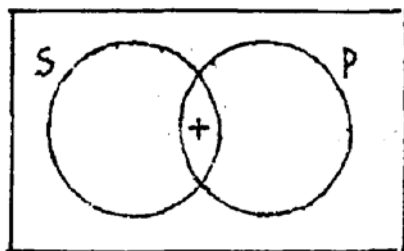
图解某直言判断就是显示该判断断定了哪类空（没有分子），哪类不空（有分子）。通常用“+”表示断定有分子，用阴影表示断定无分子，对某类不加标号表示未断定有否分子。这样，对 SAP、SEP、SIP、SOP 的原文恩图解分别为图二、图三、图四和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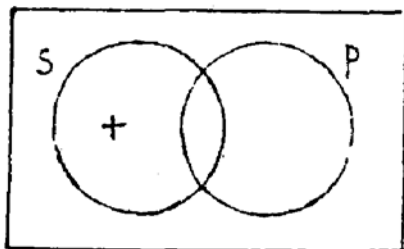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这样的图解是不适用于普通逻辑的，因为它脱离了普通逻辑形式规则系统的适用条件——直言判断中的词项都是非空非全的类。脱离适用条件，或者说图解中允许词项为空类或全类，普通逻辑所确定的一些规则和逻辑关系就不能成立。例如：在 SAP 的图解里，SP 被示为空否不定，即该图表示当 S 为空类时，SAP 也真；而在 SIP 的图解里，SP 被示为不空，即该图表示当 S 为空类时，SIP 则假；因而这种允许词项为空类的图解至少相悖于普通逻辑所确定的 A 与 I 的从属关系。因而，这种允许词项为全类的图解至少不能表明该推理是有效的。由此可见，这种图解由于脱离适用条件而不适用于普通逻辑。因而要使图解适用于普通逻辑，就要考虑适用条件，弥补原图解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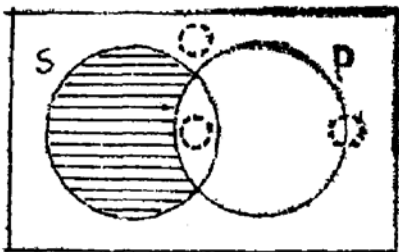
二、适用于普通逻辑的文恩图解

弥补原图解的不足就是在图解中标明词项是非空非全的类。而在论域分为 SP 、 $S\bar{P}$ 、 $\bar{S}P$ 和 $\bar{S}\bar{P}$ 四类的情况下，若要标明词项 S 不空，则需标示 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若要标明 S 不全（不是全类），则需标示 $\bar{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若要标明词项 P 不空，则需标示 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若要标明 P 不全，则需标示 $\bar{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而且，这种标明只是表明词项的特点而不是表明判断对类的判定情况。

如果用“+”示断定某类不空，用阴影示断定某类空，用标在某域内的“⊙”示当判断真时由词项特点决定的某类不空，用标在两区域分界上的“⊙”示当判断真时由词项特点决定的两类不都空，那么，对四种判断可图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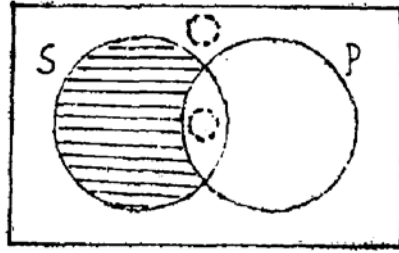
1. SAP 图解：要图解 SAP ，一则需要图解该判断对类的断定，另则需图解词项的特点。前者与原图解相同，后者需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在用阴影标示 $\bar{S}\bar{P}$ 空之后，（1）标示 S 不空：由于 $\bar{S}\bar{P}$ 空，故需标 SP 不空。（2）标示 P 不空：由于 SP 已标不空，故无需再标。（3）标示 S 不全：根据前述，标 $\bar{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

（4）标示 P 不全：由于 $\bar{S}\bar{P}$ 空，故需标 $\bar{S}P$ 不空。这样得出图六。从图六可看出，由于 $\bar{S}\bar{P}$ 标为不空，对 $\bar{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的标示成为不必要，故可省略，图六可改为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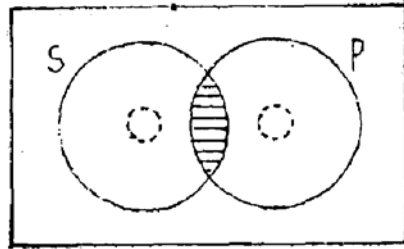
图六

2. SEP 图解：图解 SEP 也是先图解判断的断定，之后图解词项的特点。前者也是与原图解相同。这样，在用阴影标示 SP 空之后，（1）标示 S 不空：由于 SP 空，故需标 $\bar{S}\bar{P}$ 不空。（2）标示 P 不空：由于 SP 空，故需标 $\bar{S}P$ 不空。（3）标示 S 不全：由于 $\bar{S}\bar{P}$ 已标为不空，故无需再标。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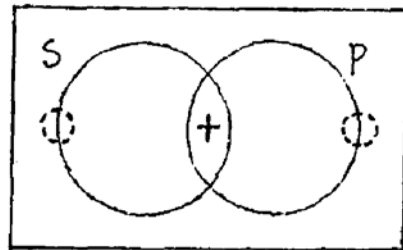
（8）标示 P 不全：由于 $\bar{S}\bar{P}$ 已标为不空，故也不需再标。这样得出图八，也即所求图解。



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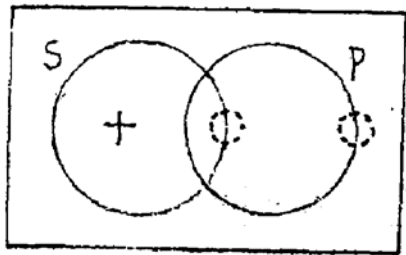
3. SIP 图解：图解 SIP 也是先图解判断的断定，之后图解词项的特点。前者也是与原图解相同。这样，在用“+”标示 SP 不空之后，（1）标示 S 不空：由于 SP 不空，故无需再标。（2）标示 P 不空：由于 SP 不空，故也不需再标。（3）标示 S 不全：依据前述，需标 $\bar{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

（4）标示 P 不全：依据前述，需标 $\bar{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这样得出图九，也即所求图解。



图九

4. SOP 图解：图解 SOP 也是先图解判断的断定，之后图解词项的特点。前者也是与原图解相同。这样，在用“+”标示 $\bar{S}\bar{P}$ 不空之后，（1）标示 S 不空：由于 $\bar{S}\bar{P}$ 已标为不空，故不需再标。（2）标示 P 不空：依据前述，需标 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3）标示 S 不全：依据前述，需标 $\bar{S}P$ 和 $\bar{S}\bar{P}$ 不都空。（4）标示 P 不全：由于 $\bar{S}\bar{P}$ 已标为不空，故不需再标。这样得出图十，也即所求图解。



图十

上面这种标明词项特点的对四种判断的图解是适用于普通逻辑的，这可由读者自行验证。

三、适用于普通逻辑的文恩图解的主要作用

这种适用于普通逻辑的图解的主要作用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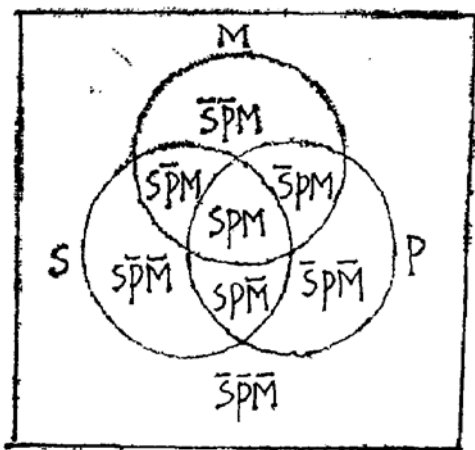
(一) 可用以较简便判定判断变形直接推理是否有效。对某一判断变形推理，如果图解其前提判断，就可从中直观地看出其结论是否有效。例如，对于从SAP经一系列换质换位得出 \overline{SOP} 这种推理，查看SAP图解(图七)，不难看出，由于 \overline{SP} 不空，因而推出 \overline{SOP} 是有效的。再如，对于从SOP推出POS这种推理，查看SOP图解(图十)，不难看出，由于 \overline{SP} 空否不定，因而得此结论是无效的。

(二) 可用以较简便判定直言三段论推理是否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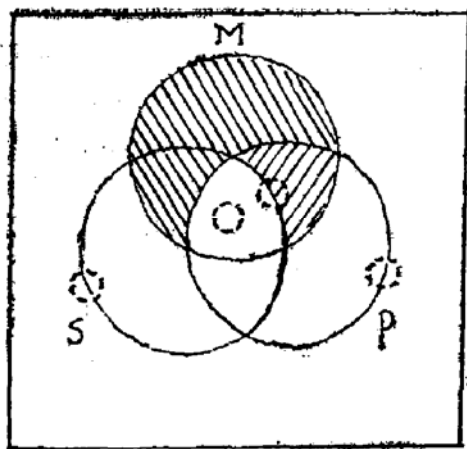
判定直言三段论是否有效需要借助方框内的三圆交叉图。方框表示论域，三圆分别表示大、中、小项，而由三圆切割成的八个区域表示论域内可能包含的八个类。若以S示小项，P示大项，M示中项，则此八类为： $S\Delta P\Delta M$ 、 $S\Delta P\Delta \overline{M}$ 、 $S\Delta \overline{P}\Delta M$ 、 $S\Delta \overline{P}\Delta \overline{M}$ 、 $\overline{S}\Delta P\Delta M$ 、 $\overline{S}\Delta P\Delta \overline{M}$ 、 $\overline{S}\Delta \overline{P}\Delta M$ 、 $\overline{S}\Delta \overline{P}\Delta \overline{M}$ 。此八者也可简写为： SPM 、 $SP\overline{M}$ 、 $\overline{S}PM$ 、 $\overline{S}P\overline{M}$ 、 $\overline{S}PM$ 、 $\overline{S}P\overline{M}$ 、 $\overline{S}P\overline{M}$ 和 $\overline{S}P\overline{M}$ (如图十一所示)。

判定的一般步骤是：首先图解大前提判断，然后在前一图解的基础上图解小前提判断，最后于结果中查看得某结论是否有效。按此步骤判定直言三段论是否有效是较严格且简便的。例如，若判定推理：“ $M\Delta P\Delta M\Delta S \rightarrow SIP$ ”，则可图解为图十二。从图中可看出，由于SPM不空，故可推出SIP，因而该推理有效。如果推理的结论是SAP，由于 $\overline{S}P\overline{M}$ 空否不定，则推理无效。

综上所述，使文恩图解适用于普通逻辑，既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



图十一



图十二

① 见《普通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版文恩图解一节。

② 见《学术研究》1987年第5期《文恩图解与预设存在含意的三段论》一文。按作者的意见，第四格AEO式可先变形为第二格AEO式，即将小前提MES换位为SEM，然后再通过设定SEM主项存在的方法，用文恩图解证明第四格AEO式有效。这样处理的方法值得商榷。因为：一、所证明的仍然是第二格的AEO式而不是第四格的AEO式。二、对于设定主项存在的直言判断而言，MES与SEM并非等值，M存在并不蕴涵着S存在。对此，可参见金岳霖著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关于Ac、Ec、Ic、Oc的换质换位部分。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武装警察学院政治系
责任编辑：范英

评《〈资本论〉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同一性》

傅小平

多年来，国内理论界致力于研究《资本论》中哲学思想的人并不多，出版的学术专著就更少。原因很简单，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各时期的著作比较熟悉，还要求有相当的经济理论素养。黄春生的新著《〈资本论〉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同一性》（中山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同一性》）的出版反映了作者在这个领域多年来默默耕耘的丰硕成果。

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材料丰富立论严谨。作者在考察《资本论》中哲学问题时，不仅注意这部三卷本巨著本身的直接论述和体现在其结构中的方法论思想，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三个手稿、《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有关《资本论》的大量书信也做了细致的研究。例如，作者经过认真研究指出，《资本论》第三稿主要写于1863—1867年，提出了和学术界流行的看法（认为写于1863—1865年）不同的主张；作者详考《资本论》四十年写作过程，从中追寻其哲学思想的足迹。在大量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做出分析、提出论断，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与国内外研究《资本论》的其他论著相比，《同一性》还有一个明显特点。作者的论题不限于探讨《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和逻辑方法，他站在唯物辩证法总体结构的高度，相当全面地考察了唯物辩证法诸原理和范畴在《资本论》中的渊源和杰出运用，向读者展示了存在于《资本论》中的一个丰富而完整的唯物辩证法体系。列宁早就指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在《资本论》中是同一的。

但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出版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专著。《同一性》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它的探索使人们能比较具体地了解《资本论》是如何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运用于同一门学科的。这一成果对于辩证法体系结构的研究也是一份宝贵的贡献。

《同一性》是一部研究《资本论》的专著，同时又是对唯物辩证法理论的独特阐发，作者立足于《资本论》又不局限于《资本论》。书中广泛涉及辩证法思想发展史的各种问题，上至黑格尔哲学精髓的讨论，下至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贡献的评价，作者都以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同一的思想线索一以贯之，从这一独特视角深窥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足迹和理论本质，反映出作者对唯物辩证法理论的独到理解和以此观照辩证法思想发展线索的深邃历史眼光。譬如，作者不仅以丰富的材料说明《资本论》中三者如何被运用于同一对象，而且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运用是辩证法本身的内在要求。作者指出，三者同一性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个论断具有深刻的含义。一方面重申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原则区别；另一方面强调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把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关于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一致的论断、列宁关于三者同一性的论断统一起来，看作一个逻辑上连贯一致、历史上逐步展开的过程。

对于辩证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本书也提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见解。譬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三者同一性，这个问题理论界历来众说纷

统。本书作者将其概括为一个简明的公式，即“一体多用”。三者就其实质和基本逻辑结构讲是同一的，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三个东西，这就是“一体”；但它在被运用于不同的领域时又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从而获得了多种具体表现形式，这就是“多用”。这种以中国传统的“体”、“用”之辨来理解三者关系的思路新颖独到，颇为耐人寻味。

本书设专章讨论了《资本论》中的系统思想。作者认为，系统方法是《资本论》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资本论》中的“系统”与现代系统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本书作者以丰富确实的材料和严密的逻辑分析揭示出，《资本论》中运用的系统方法与现代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有着惊人的一致，并且从整体性、有序性、动态结构性、总体最优化原则、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这些可贵的探讨，对于系统论的研究和辩证法的研究都

很有启发性。

本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作者注意运用《资本论》的方法论研究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书中以专门章节讨论了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量变质变问题和否定之否定问题。

总之，在这本文字平易质朴的书中，读者只要耐心地读下去，就可以发现丰富的经过提炼的历史材料，更能得到许多思想启发，这些都是笔者一篇书评所难以尽述的。至于本书的不足，笔者窃以为，虽然作者强调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内在一致性问题，但无论在全书的篇章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具体的阐述中，这个一致性都不能像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同一那样得到很好的体现。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达才



本刊参加广州地区报刊咨询活动

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广州市邮政局和广州地区的报刊社，于10月9日在广州农讲所旧址广场举行“世界邮政日广州报刊咨询活动”。本刊派出人员设立咨询点和销售杂志点，参加了这一活动。

本刊自1988年第四期起，根据广东要办成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和贯彻十三大对理论研究提出的新任务，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改革，开辟了一些新专栏，内容一方面保持了学术性，一方面体现了现实性，更好地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前来我刊咨询点和杂志销售点翻阅及询问我刊有关各种情况达数百人次，对我刊改革给予好评，不少读者要求购买今年的杂志。通过这次咨询活动，加强了我刊与学术界、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联系，扩大了我刊在社会上的影响。

（黄荣显 凌峰）

科技进步与民主发展

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至少具有这样两大趋势：一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二是民主政治的日益高度化。科学技术进步和民主发展的顺利实现，不可能是自发的。首先，必须具备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其次，无论是科技的进步还是民主的发展，都是一个社会的制动过程，需要借助于社会其他因素的调动和激发。

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业已具备科技进步与民主发展的根本的社会条件。然而，如何认识和处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进步与民主发展这两种社会现象间的关系？下面谈点粗浅的看法。

—

属于上层建筑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民主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作为非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对民主发展有无影响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科学技术进行历史的、社会的和哲学的考察。20世纪中叶以来，科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大大加强，科技进步和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已成为整个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贝尔纳呕心写作《科学的社会功能》（1935年）、《科学与社会》（1953年）和《历史上的科学》（1954年）等著作，就体现出这种关心。奈比斯特于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中，把科技革命影响下的美国社会发展趋势，归纳成十大发展方向，其中就包括从代议民主制向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以及从等级制度向网络组织的转变，等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进步对民主发展发生影响的集中表现，就是发扬和扩大了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各项原则，表现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是在不断地同科技进步的要求、条件和结果相协调一致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的。

（一）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它的发展有赖于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巩固，这是客体发展对主体的最基本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依靠力量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利益的日趋接近以及一致性的增长，反映了科技进步的社会成果的重要方面。

首先,科技进步日益提高了作为社会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地位,并使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质量普遍得到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及其发展经济和政治的积极性和参与感,也将得到显著提高。

其次,在科技进步过程中,农民阶级的面貌也呈现出显著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生产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工业的生产方法,工农业之间建立了尤其紧密的生产联系,其结果必然大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在科技进步的强烈影响下,过去农民所固有的在生产、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局限性,将逐渐消失。

科技进步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的科学潜力的迅猛增长,生产与科技联系的日益紧密,社会的专业管理人员数量上的日趋增多,以及科技进步所产生的其他一系列后果,都无疑会导致作为科技载体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显著增加,并充分发挥其社会作用。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知识分子阶层和工人阶级总体之间,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利益状况和组织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也将逐渐消失。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又必须借助于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并且要受到知识分子阶层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完善程度的制约。

(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进步不仅能巩固和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可以造就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并且是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法律地位、扩大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在科技进步的条件下,这一特征将愈加突出地表现出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它对计划、协作和纪律的要求也将不断加强,这对于培养和加强作为参与者的人民群众的讲究民主、遵守法制纪律的习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实质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科技进步,对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经济以特别深刻的影响。其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作为劳动者和管理者;已经不是为剥削者而是为自己和社会工作。这种发展自我的意识,只有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并且真正成为事实。这种事实一经出现,又将激发人们以更饱满的热情、更自觉的主人翁意识,去参与对社会经济的生产和管理,加强自己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其二、在经济领域内,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经济管理的过程的复杂化,迫切要求科技的不断进步及其成果的应用。其三、随着科技的进步及其成果的应用,人民群众不仅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且对劳动集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成果,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并给予愈来愈多的关注。这样,科技进步便成为促进经济生活领域内的民主发展的一个极其现实的因素。其四、科技的不断进步,不仅促使人民群众越来越积极地参与管理经济事务,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保证生产和管理的成效,而且把对社会要求的广泛性和严格性,提到愈来愈高的水平。这就是说,科技越发达,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自主精神将愈发加强。

(四) 科学技术的一个最基本的本质要求, 就是实现各种管理活动的科学化, 这就决定了科技进步对民主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一、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社会条件, 对领导全社会发展的机制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机制的完善程度。因此,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方面, 必须尽可能地适应和反映出科技进步的一切成果, 诸如权力下放、扩大企业及地方机关的自主权等改革方向的提出, 也是科技进步导致的一个合乎规律的后果。科技进步对领导体制的影响, 不仅涉及到职能内容, 而且涉及到机制自身结构的完善, 同时还涉及到管理人员构成的合理化等许多方面。科技的进步还为民主发展创造了它所需要的辅助技术条件和其他社会条件。

二

科技进步对民主发展的依赖性, 主要体现在它的实现条件方面。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科技进步的成就主要是作为资本家阶级攫取高额剩余价值, 巩固其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手段, 科技进步的潜能和意义与资本主义的活动目的之间, 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美国, 发展最快的科学技术, 都是与军火工业有关的, 许多真正有利于科技进步和满足人民需要的基础理论和民用工业的研究, 则往往得不到政府和垄断组织的支持。这样, 必然遏制科技进步最大程度地实现。

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方面, 保证科技的不断进步, 保证把科技进步的成就真正变成人民和社会的财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 同时也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意义、性质和结构的改造。随着私有制的被废除, 剥削制度的被消灭, 已经有条件形成科技活动本身的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相吻合,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在这方面, 社会主义民主具有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经济计划性等同等程度的意义, 成为科技进步得以充分有效地实现的先决条件之一。

社会主义民主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 尽管存在着差别, 但是它们作为一个统一体, 应当反映出科学和政治的有机融合。尤其有意义的是,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制定科学性政策的有力机制, 它对科技进步的意义表现在, 只有在发扬和发展民主的基础上, 才能正确地把握社会利益和需要, 揭示社会生活的大趋势, 明察社会的力量和潜力, 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去完成和推动科技的进步。同时, 它还能保证人民群众真正地、有效地监督科技进步, 朝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面发展, 并充分挖掘、利用科技进步的潜力, 给科技进步以支持。

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扬和扩大。实践表明, 社会主义民主能较大程度地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加强社会管理的合理性、科学性。只有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 才能有效地解决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纷繁复杂的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那种认为科技进步将使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原则失去意义的观点, 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忽视了科技进步是整个社会发展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同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紧密相联。

三

当前，我国正在拓展和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应当注意两大问题，一是发扬民主的问题，一是发展科技的问题。科技进步和民主发展必须在两者和谐一致的社会状态中，才能获得实现。一方面，科技进步必须依靠民主机制的发展和完善，获得必要的变革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注意并反映科技进步的社会成就、主要趋势及其历史前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进步和民主发展是两个彼此不可分割的、交互作用的社会现象。这种交互作用的发生机制是“科技进步 \rightleftharpoons 民主发展”。如何使这一机制起作用呢？

首先，以经济过程作为机制发生作用的中介。要切实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参与管理社会经济事务，实际参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使科学技术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

其次，以教育文化活动作为机制发生作用的保障系统。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的报告中指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提高全体人民群众的文化科技水平和政治觉悟，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以国家组织作为机制运转的操纵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不仅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民主的形态和主要形式。只有充分利用国家组织这一社会改造的主要工具，才能使科技进步和民主发展结合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目前的关键步骤，是实行党政分开。必须指出，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忽视党的领导作用，相反，加强党在社会建设所有领域中的领导作用，是科技进步和民主发展的最重要的要求。

作者单位：中共南昌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范 英



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王 琳

关于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在西方尽管众说纷纭，但不外乎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派。乐观主义派认为科学技术革命的进步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和曙光，科学技术能够消除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弊端。他们并把人的发展条件简化为技术条件，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看作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医治一切病症的万能手段，从而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悲观主义派则预言人类在技术文明的道路上必遭毁灭。现在人类正在技术的重压下辗转呻吟，科学上的突破和新技术成就并没有开辟良好的前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恶果，便提出停止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来消除人类面临的威胁的主张。其实这两派同样夸大科学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现代历史的完全独立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没有科学地说明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揭露出人的发展前景及其社会条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说明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指个人的智力、体力、才能方面的充分发展，而且还包括个人的思想、道德、志趣、审美能力、文明交际等等精神方面的高度发展。因为只有上述所有因素的总和，才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特质。在考察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是从科学技术及其社会使用形式两个方面进行的，认为科学首先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在考察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视人本身的发展变化，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智慧发展的结晶，“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页）科学技术的变革和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用全面发展的人代替片面发展的人。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其社会使用形式。马克思在考察机器生产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时，认为机器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本来是对劳动的解放，但是资本主义对机器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则使工人的智力完全同工人分离、对立，成为异己的力量，工人的体力、智力得到片面的发展，并造成人的道德的堕落和片面化。因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旧的分工的消灭是人的全面发展、获得彻底解放的前提条

件，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才是使“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

运用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当前新科学技术革命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就会立即发现，尽管科学技术革命是一种世界进步现象，但是科学技术日益增长的威力并不是独立地发生作用，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根据某个具体社会、某些阶级、政党、国家的一定目的而发挥作用。科学技术是经过人们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进步成果应用的方向和性质，取决于人们活动的社会组织。因此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和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根本不同的。

先从科学技术与一般生产劳动过程的发展变化来考察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

第一，从一般劳动过程看，新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和内容，从而改变了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目前我们一般把劳动解释为人们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物使之适应自己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即劳动力的使用 and 消费。这主要是指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但是，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电子计算机、微电脑、机器人等自动化装置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过程，人们的劳动不再完全是从事有形物质产品的生产，而是从事自动程序设计、图像识别等无形的技术生产，从而使劳动自身发生了不断趋于智力化的过程，呈现出不同层次和程序的自动化系统。正是科学技术革命利用自然力和技术装备来代替人的体力劳动，靠着由人控制的物化知识发挥作用而使人不必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从而使劳动者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这样就根本改变了社会主要生产力——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劳动性质和内容。这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二，由于生产者劳动摆脱了狭隘的知识和片面的技巧，生产工具得到改善，劳动对象不断扩大，因而在客观上要求通晓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全面发展的人来掌握它。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以现代大工业技术为基础的日益自动化的生产劳动，较之机器大工业对人的全面发展更为迫切。因为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过程，已经变为综合了各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自动系统，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生产工具日益得到改革和创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使生产物质财富所加工的劳动对象也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扩大，新的原料和能源被开发。这样的自动系统需要的是具备各种知识和熟谙整个自动化过程原理的管理者和调节者。只有这样，人们对材料的本质的认识才能从宏观深入到微观结构，也就有可能更加合理地利用劳动对象以促进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第三，新科学技术革命，使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充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将为人们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自由支配的时间则是人自由

发展的空间。当今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60%—80%要依靠新的科学技术的成果。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两种趋势:一是许多生产劳动者脱离物质生产,成为非生产性的劳动者。例如近几年来,很多国家出现了科学——工业综合体和大型科学——工业区,在这些综合体内有大学、研究机构和不同类型、规模的企业,有各方面的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员和工人,他们都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以及站在机器旁边从事管理工作的白领工人。这也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8页)二是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大量的自由支配时间。只有拥有大量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个人才能获得应当具备的各方面的知识或者满足对其他的活动的各种要求。生产者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才能去从事和享受物质生产以外的种种精神性的“高级活动”,使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

以上说明,新科学技术革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实现的条件。

再从科学技术的社会使用形式方面来考察新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第一,资产阶级使用新科学技术的目的是攫取超额利润而根本不顾工人的需要,使劳动者不可能利用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这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现代化大生产的尖锐矛盾,造成生产自动化科学化排挤工人、产生劳动就业率降低等问题。比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原有装配工人大约有4万人左右,近年由于机器人的使用,机器手操作代替了人工劳动,结果使得装配线上的工人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

第二,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人的身心造成了危害,使人们感到极度的恐惧、空虚、疲劳和冷漠。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造成的:一、由核战争、军事竞赛的威胁。资本主义对新科学技术总是首先并且大量用于军事和战争,表现出科学技术进步军事化、军备竞赛、核武器生产耗费了巨大的物质、财政和劳动资源,而这些巨大的负担必然是极其沉重地落在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身上。二、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节,劳动者受资本控制,劳动成为一种精神负担和折磨,工人成为自动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半自动化机器的附属品。结果使人的全部才能和天赋仅仅屈从于资本在社会各个活动领域发挥功能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三、由于生态平衡失调和环境污染,不仅破坏了社会经济生态平衡,而且给工人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现代工业的资本性在客观上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人得到片面发展,不仅使人的智力和体力,而且使人的肉体和精神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与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社会使得科学技术进步获得了应有的进步性质,使得科学技术进步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是对以往剥削制度把人变成畸形的人的直接否定。正如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列宁选集》第3卷第571页）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归社会共同占有，人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奴隶，而成为社会的主人，因而人们对劳动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劳动成为自我活动、自我设定目的的手段，即对社会、对自己都是自由的劳动，它不是由外部强制决定，而是由自我实现中的内在需要来决定，劳动的成果也由生产者本身支配。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探索性和创造性，是一种真正创造意义上的活动，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了整个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计划性，保证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以满足全社会人员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使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服从社会更新的各项任务的需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计划性和自觉调节性，保证了生产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方法，实现自动化，不会造成劳动者失业。电子计算机、微电脑和机器人的应用，将代替劳动者大量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脑力劳动，从而使人们有机会和有时间来学习和研究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原理和工艺原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革新和创造。

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同样不可避免受到新技术革命的影响而发展变化。它一方面使精神生产获得了现代化的手段，另一方面引起了精神生产内容上的深刻变化。例如，广播、电视、录音、电子计算机等成为保存和传播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新科学技术革命使各种不同的科学知识之间加强了联系和渗透，向越来越综合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科学技术革命还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引起了人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需要等品质的深刻变化、发展和提高。因为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发展的美好未来。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说开辟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新科学技术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当然，新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并不是自发地表现出来，它需要科学地利用和调节。只有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才有可能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

责任编辑：范英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

李时岳：

“两半”论的失误，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尤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由于没有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统一的整体，导致在反帝的任务完成之后，反封建的任务迟迟没有完成。这是直到今天反对“封建残余”仍是我们严重而艰巨任务的思想根源。

张磊：

“两半”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定性分析，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对国情研讨的结果，在这认识基础上建立和制订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已被历史进程所验证。应该说，它是科学的——反映了社会客观存在。不应把半殖民地半封建分割为不相隶属的范畴，它们是同步共生的，两者标志了近代中国社会过渡型而非相对独立的基本状态和属性。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

——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

本刊记者 林有能

自从150年前帝国主义列强相继用坚船利炮轰开古老的封建主义中国的大门，强行阻断了它的自然历史进程之后，中国便开始了它的由中古社会向近代社会进化的历程。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被断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似乎已成定论。但近年来有些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对这

个定论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观点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当然也受到反驳，从而引起了一场学术争论。最近，本刊邀请广东部分史学工作者，就这一问题举行座谈。现将会上的发言综合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我们期望把这一场争论引向深入。

毛泽东“两半”论的权威面临挑战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生和形成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过程，因此，确定这个社会的性质，并据以理清其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尤其当这一过程尚未完结之际，囿于时代的局限，解决问题难度更大。毛泽东在1939年著《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举理清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等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两半”论被看成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定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家们遂把这一概括作为近代史建构的指导思想，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论也为学术界接受。直到今天，这一理论的权威性似乎还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人的认识总要向前发展，随着历史的推移，对原来似乎无可置疑的理论概括，也会提出重新认识，引起重新探讨，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常有的。毛泽东的“两半”论现在被质疑、挑战，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十年之后出现，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这是中国人的反思由当代及于现代，再推而至于近代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在座谈会上，围绕对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作出估价，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李时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指出，“两半”论把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过程与半封建过程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是不当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二者虽有联系，但并非不可分割，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既非同趋，亦不同步，半殖民地主要指国家地位，虽然也包括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以政治统治为前提的。半封建主要指社会形态，它以经济为基础，自然也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征候。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原因，毫无疑问，这是民族的灾难，历史的沉沦；而资本主义的发生和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斗争是中国变为半封建社会的动因，这是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

展，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并不完全是灾难性的不断向下沉沦的历史，而是既有向下的沉沦，又有向上的发展。“两半”论的失误，即在于无视了向上发展的方面，过于轻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的巨大历史进步意义，尤其对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缺乏足够的重视和估价，后来并予以全盘否定。由于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统一的整体，导致不能了解：反帝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反封建任务的完成。没有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就难以产生自由、平等的社会观念，“封建残余”就不会自动退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半”论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这是时至今日反对“封建残余”仍然是严重而艰巨的斗争任务的思想认识根源。

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定性分析，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对自己的国情研讨的结果，而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建立和制订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则已被历史进程所验证。应该说，它是科学的——反映了社会客观存在。所以，在考察近代中国社会时，不应把半封建与半殖民地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是同步的、共生的，两者又都标志了近代中国社会——过渡型的、而非相对独立的——的基本状态和属性。半殖民地的概念不仅仅是政治状态，即附属国的不完全独立的内涵，事实上，它意味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定状态和属性。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呈

“扭曲”形态，多半也是由于半殖民地的原因。半封建意味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定状态和属性，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最能反映近代中国社会本质和特点的概念作为定语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次，近代中国社会（严格说来，应是五四运动以前的阶段）的主线是发展资本主义。据此，应肯定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对农民起义和战争不宜溢美。但是，在探究资本主义发展时，决不可忽略和撇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桎梏或障碍。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民主派都懂得这一道理，都不同程度上把发展资本主义同社会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洋务派的局面和农民起义与战争的积极作用均在于此。宋德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也指出，“半殖民地”所表明的是中外关系上中国主权和应有地位遭受损害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本身也意味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取得了特殊的合法地位，成为与封建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中很大的一部分；而中国封建主义的逐渐解体、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不与“半殖民地”的状况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因此，作为定性的概念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所表示的应是一种统一的社会形态，不失为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形态较好的概括。钟卓安（中山大学历史系）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半封建”状况是因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造成的，这种“半封建”明显地表现出由于帝国主义的控制、节制而来的半殖民地

色彩。所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尽管作为概念可以分开来理解，但作为历史事实却是有机地联为一体的。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统一体，不但有利于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是受帝国主义制约的半封建社会，而且明确表示出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方向。

多层面多角度研究的共存

李时岳和张磊等之间的分歧是明显的，主要集中在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这两个过程的关系：可分不可分以及交互作用如何。但是，必须看到，在若干问题上双方却有着一致的认识：第一，中国近代社会的主线是资本主义化；第二，中国近代社会确实存在向上发展的一方面；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半殖民地的状态消灭以后，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严重地摆在中国人面前。我们认为，这些一致的认识，无论如何都应视为是史学界共同的对“两半”论重新思考的新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并力图修正“两半”论的失误与不足。至于存在的分歧，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性，有待于双方继续具体、深入去探讨。我们又注意到，史学界对“两半”论的再认识，开始从民族矛盾、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趋势，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中国近代社会的进退，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这条思路很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带有根本意义的新起点。在这次座谈会中，我们看到，除李时岳之外，其他与会者虽未对“两半”论提出直接的质疑或驳难，但通过发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不同看法，显示了对问

题的深入研究的实绩。

钟卓安提出“半殖民地性质的半封建社会”说。他主张强调近代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认为由于内外压力，中国社会实际变化的结果，不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是成为受他人控制的有条件的资本主义，即带有浓厚封建性和受帝国主义节制的资本主义，畸型的资本主义，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半封建主义。所谓半封建，其真实意义就在于它既有封建主义，又有资本主义，但突出的是封建主义，是以封建主义为主体的资本主义。这种“半封建”，明显地表现出由于帝国主义的控制、节制而带来的半殖民地色彩。

方志钦、赵立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提出资本主义范畴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说。指出，在世界已步入资本主义这个大趋势之中，中国虽然是一个落伍者，但也逃脱不了世界潮流的裹挟和冲击，门户开放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在农业型经济尚未根本改变、民族资本主义又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中国就慢慢发展为以官僚资本为主体的畸型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很不发达、很不正常的资本主义，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资本主义属性。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应仅仅静态地看该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数量和比重，主要应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在该国经济中所代表的发展趋向和地位。当然，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曲折的、畸型的，因为它是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的产物，走的是官僚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水平低下，封建性严重，没有民主和法治，遭到全民的强烈反抗。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始于洋务

运动，确立于袁记“中华民国政府”，成熟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并迅速走向灭亡。陈胜彝(中山大学历史系)则从东、西方的历史进程，结合近代中国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实际状况，论证中国近代社会。他说，中国近代社会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种东方社会形态，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角度去考察，它应该是资本主义形态。但其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主导；生产关系极不成熟，半资半封(严格意义上都不完整)、亦资亦封、封中出现资、资中存在大量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极端混乱，不中(中世纪)不西(西方近代文明)、亦中亦西，最先进与最落后的思潮和意识掺在一块，落后的拉住、溶化先进的。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带有浓厚封建和殖民主义色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

王燕军(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张撇开五种社会形态模式，从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角度去考察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把它定性为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他说，判定中国近代社会究竟属于什么形态的前提是如何从宏观上看待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因此，当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形态时，我们的视角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近代社会，而应把它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从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角度去考察。中国社会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的变动过渡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际，由古代向中古过渡时期；第二次是由中古向近代过渡，它始于明末清初，至今尚未结束。所谓中国近代社会应理解为是一个由

中古的、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近代的、开放的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因此，把中国近代史限定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或1949年，均过于狭小和短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抽出这么短的、且又未能代表一个阶段的全貌的一小节，来加以定性，是自找难题。如果硬要定性，则只能说是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但必须说明：第一，这一过渡并未终结；第二，表述方法上，用“中古、封闭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更确切。陈胜彝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指出对这一过渡阶段还可以具体分段：明末清初是这一过渡的酝酿期；1840年至1949年是这一过渡的前期；1949年以后是后期。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追求独立、富强、文明、民主的历史，1949年争得了独立，但富强、文明、民主至今仍在奋斗争取之中。

同与异的交叉

“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中国近代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而为人们所承认，并且长期以来都把两者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存在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自身的许多问题被这个整体所掩盖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实际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是否同步？如果不是，那两者又分别何时开端？何时形成？标志怎样？等等这些以往所忽略的问题，都是在对近代中国社会进行再认识中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因此，与会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各抒己见，出现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同观点直接交锋的热烈场面。

李时岳、钟卓安都认为“半殖民地”与

“半封建”既不同趋、亦不同步，两者的开端和形成的时间都不一样。在具体确定标界上，李时岳主张半殖民地确立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半封建形成于辛亥革命。钟卓安则主张半殖民地始于鸦片战争，形成于《辛丑条约》签订；半封建始于洋务运动，形成于辛亥革命之后。

张磊、陈华新（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则认为两者是同步共生的。在分期的标准问题上，张磊提倡多元化，但不是等量齐观，而是在多元中把握主元，以之作为基本依据，对这一历史时期加以分段。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中日战争、辛亥革命都堪称为关节点。陈华新则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8页）为据，认为中日战争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继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踵登上历史舞台，半资本主义（相对半封建而言）的经济基础已建立，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合法化从而加速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所以，1894年的中日战争确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界标。

问题并未就此而止，关于概念的时限和标界等问题的争论的意义何在？它对于我们今天从总体上反思中国近代社会有何作用？对这些问题，在座谈会上也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似无多大必要。宋德华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首先是一个侧重于质的规定的、表明历史发展趋向性的概念，对两个“半”

字不宜作量的苛求和时期上过于严格的限制,应当而且可以看得“模糊”些。1840年至1949年的110年中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总的概括之下,对洋务运动开展前后,中日战争爆发前后,《辛丑条约》签订前后,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等各个时期外国列强侵华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特征作全面、具体的分析比较,指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准确地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形态演变的整个进程。但是,如要在上述进程中确定某一时期,某一事件甚至某一年代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否形成或确立的分界线,似乎无很大必要,且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势必使寻找确定分界线的努力难以得到科学的结论。

与上述意见相反的看法是强调对这些问题讨论的意义。张磊认为,历史进程的发展,总是会有其阶段性的。正确地划分阶段既有助于具体的研究和评价不同阶段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有利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度”——质与量的统一。所以,讨论了几十年的分期问题,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我不认为这是缺乏意义的讨论。

研究中的手段与方法

怎样评估以往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探讨这一问题,是仍然沿着过去的路子走还是另辟蹊径,采取新的方法以求取得新的认识?这是我们能否更科学地重新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是目前史学界、也是这次座谈会上学

者们关心和注意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严重束缚人们的思维和认识,主张予以彻底抛弃。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以往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理论;二是传统与近代化理论,把近代中国视为传统与近代化的对立转化。由此产生两种偏向,一是明显或潜在地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二是过于强调定性一面。事实上,正是由于认识局限于固定的框架之内,本来作为论点的社会形态成了原则和目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反而成了思维的桎梏。因此,今天重新讨论这一问题,关键不在于修缮旧框架,而是连同对它的迷信一起彻底抛弃,促成认识的真正解放,这样才能复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和环节出现了程度不同、先后有别、方向各异的适应性变化调整,这就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把这些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总结归纳直接间接地套用到中国,必然出现削足适履式的曲解。

有的学者则对过去以及今天的各种研究方法、思维模式不置可否,不予评判,主张百花齐放,采取多元的方法和思维,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分析。王燕军指出,多元的社会需要多元的思维,一元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今天重新讨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形态,可以而且应该采取多种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去进行,这样才会有多种不同体

系的中国近代史问世。陈胜彝也主张从多种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例如，从社会文明史角度来分析，会得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形态；从五种社会形态的角度去考察，则会把中国近代社会定性为资本主义形态。这并不互相矛盾，却说明了采取多方法、多角度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分期以及研究方法诸问题进行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把握中国近代社会是新的历史时期一项尝试性的工作，毫无疑问，仅靠一二次座谈或讨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这次座谈会的讨论能够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再认识的起点，经过史学界的共同努力，把讨论引向深入。

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问题答记者问

本刊记者 凌 峰

问：李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即“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几十年来已成定论的理论概括，自从您提出并进行了重新检讨之后，在史学界引起了注意和争论。我们编辑部也感到，这将是一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论争，所牵涉的不仅是近代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关系到现代史乃至当代史的研究。所以，我们想请您谈谈您提出这一问题的思路和背景。

答：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是三十年代学术界讨论社会性质时提出的。当时只是作为一种观点在争论中提出，并没有权威的定论。1939年冬，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是分开使用的。其原话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

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后来有的学者在论述过程中，才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

问：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

答：是这样。但在毛泽东那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并不是不可分割的。用“不可分割”来建构近代史，是以后史学界的事。在这一理论思想指导下，近代史被写成一部革命史，一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其特点是：抬高农民与农民运动，否定、贬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强调暴力

革命，反对妥协，反对一切形式的改革与改良，进而否定整个近代中国的向上发展，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有屈辱与沉沦。这种理论主要是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与要求，在当时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这一理论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当时这样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很自然的，它也确实对于推动革命斗争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理论的贡献。但是，今天看来，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它过分强调了暴力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而相对地忽略了历史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的变动所制约的。就近代中国而言，正是有了从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几十年的发展，才会产生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无论农民阶级与暴力革命，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和独立的意识。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没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争取民主、独立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近代史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因此必须充分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应该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构架呢？

答：显然有这样的意图，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但是，我并不认为必须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提法。我只是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既有联系性，又有其可分性，就

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封建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二者并非同一范畴中的概念。近代中国，就国家的地位而言，既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没有完全（至少在形式上）丧失独立，故称半殖民地；就社会形态而言，虽然发生了资本主义，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故称半封建。当然，因为对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帝国主义的侵略起过促进作用；而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的保持，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从联系方面着眼，我认为仍不妨把中国近代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必须看到两者之间又确有区别。从各自的特定含义着眼，则并非“不可分割”。半封建的“半”并不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指封建社会内部发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半封建的另一半并不是半殖民地。半殖民地，指丧失了独立，强调国家的地位的沉沦；半封建，则是封建社会解体，发生了资本主义，说明社会的进步。由此观之，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向上发展的趋向。正因为存在着向上发展的趋向，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才可能获得越来越进步的性质，最终埋葬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问：您已经谈了区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理论根据，那么，它在历史发

展中是怎样体现的呢？

答：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与半封建化过程并不是同步的。一方面，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领土、领海、海关、司法等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清朝统治者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步步退让，谋求妥协的，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还有所不甘而试图反抗或挣扎。从而发生了光绪朝的三次对外战争，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庚子义和团战争。而光绪皇帝是甲午的积极主战者，西太后则是庚子对外宣战的决策人。直到义和团战争失败，《辛丑条约》订立，清朝统治者才完全放弃反抗挣扎的打算。这也就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样，移植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封建统治阶级有识之士的肩上，而且只能从移植“造船制械”的军工机器生产开始。十九世纪70年代以后，在买办商业网形成的同时，出现了中国的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家表现出对产业投资的浓厚兴趣，这是洋务运动发展为兴办民用企业的社会基础。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经过和封建顽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多次较量，建立了中国第一批轻重工业和交通电讯等现代企业，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奠定了始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救亡旗帜下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政治运动迅速高涨。产生了戊戌变法，出现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运动。经过十次以上的武装起义，终于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推翻了清朝统治，结

束了封建帝制，这是资产阶级的一次历史性的胜利。然而，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并占据优势。中国没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了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

问：记得您在1980年《历史研究》第一期上发表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后来被概括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梯”的新观点，它是否构成您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思考？请简要地谈谈。

答：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最早是在1979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来的，当时思路还没有现在这么明晰，也没想到“四个阶梯”的概括，我只是想重新评价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几次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且力求给予它们之间的联系以新的认明。后来，我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我的观点。

我认为，在近代中国，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任务最初只能由农民来承担。通过太平天国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以及对最腐朽的权贵势力的扫荡，才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提供了逐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西方移植的，所以在开始阶段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借法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而在封建主义密闭的殿堂中为资本主义打开缺口。随后有了资本主义，于是发生了资产阶级为扫清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因此，反映中国半资本主义化趋向的线索

及其标志，既不能忽视农民战争的作用，也不是纯经济性的现象，更不应和阶级斗争相背离。它正是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经济和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形势是怎样发展的。这就是“四个阶梯”论的基本思想。

问：最后，提一个问题：您对近代史的新构想大体是怎样的？

答：我想可以从分期方面作点说明吧。我的看法：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基本上没有改变，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也基本上没有改变。所以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以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标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形成期，后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终结期。前期包括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战争、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运动；后期包括资产阶级为保卫和争取实现真共和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前期即晚清史，可暂称为中国近代史，后期即民国史，暂称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可称为当代中国史。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称谓是会改变的。我想，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代需要我们有新的突破。我正在撰写《晚清史》(1840——1911)，希望能在近年内把它完成，可以说是用自己的实际努力作出响应。也期待着接受学界同仁与广大读者的批评。

记者：谢谢！



《文心雕龙》的修辞论

谢红华

本文从四个方面去组织《文心雕龙》的修辞论点：

- (1) 修辞的原则；
- (2) 字句章篇的修辞；
- (3) 修辞方式(辞格)；
- (4) 文体及风格。

一、关于修辞的原则

§1·1道文的关系。《序志》和“文之枢纽”部分集中论述了道文的关系，其他篇章也一再重申，并把它提到“立文之本源”(情采)的高度，可见作者对此十分重视。作为修辞论，刘勰所指的“道”是文章所表现的内容，是“质”、“本”、“志”、“实”。“文”指语言技巧、辞采等形式方面的组成因素。所以，道文的关系，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刘勰作《文心雕龙》的动机之一就是针对当时文法的浮靡文风的。

刘勰认为，文章写作“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附会)，而以“述志为本”(情采)，内容是决定文章优劣的主要因素，形式是为内容表达服务的。但“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神思)，形式并不被动地服务于内容，好的形式能取得强烈的修辞效果，充分地表达内容达到言志抒情的目的。“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总术)，可见语言表达也很重要。刘勰还明确地指出要以情理为主，文采为次，同

时又要“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并把这一点提到文章的“金科”“玉牒”的地位。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因为“情者文之经，辞者文之纬；经正而纬成”(情采)，这是创作的总原则，也是修辞的总原则。

以上观点也表现在刘勰给文章定的评判标准之中。《宗经》篇明确写道：“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在这“六义”中，一三四是内容情感方面的要求，二五六是风格文辞方面的要求。在刘勰看来，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很重要，情真志实，文章便有价值、有意义；文切辞巧，表达便能恰到好处，收到预想的效果。内容是根本，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决定形式的选择，而恰当的语言形式又是一篇好文章不可缺少的因素。

§1·2变通适会的辩证原则。这也是修辞的一条重要原则，在《征圣》《总术》《通变》《定势》等篇中有明确论述。例如简言与博文、明理与隐义是相对的，对表达内容情感各有千秋，撇开语境就难说谁优谁劣，要“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通变)。要有好的修辞，必须弄清题旨，并“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

雕画奇辞”(风骨)。在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他虽主张宗经,但并非墨守陈规,而是要加以革新和发展。《通变》一再强调“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而“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认为“离骚”就是“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辨骚)的杰作。在分析作品风格时,刘勰认为各体有各体的特点和长处,但并非互不相干,“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体性)。

二、关于字句章篇的修辞

§2·1字。字即文字、语言,是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手段,是内容情感借以寄托的物质形式,所谓“心既托事于言,言亦寄形于字”(练字)。所以,要达到状物写景,抒情言志的目的,首先要注意字词的使用。

第一是用字要准确。“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神思),可见用字准确是多么重要。为此,必须锤炼、多思,“剖析毫厘”(体性),“权衡损益,斟酌浓淡”(熔裁)。锤炼的过程,就如“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宗经),在掌握大量词汇的基础上选择最恰切的一个。有些字,“据事似闲,在用实切”(章句),只要用得准确,平凡的字也可收到奇妙的效果。准确是修辞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准确,就谈不上生动、形象。我国许多流传百世的佳句,首先莫不因为用字准确。

第二是用字要简练。对齐梁时代那种好用奇字怪句、堆砌辞藻的文风,刘勰是十分反感的,所以把简练作为一条重要的修辞要求提出来。刘勰崇尚简约,主张“剪裁浮词”,使句无可削,字不得减,字字句句都有份量。简洁,能使文章短小精悍;简洁,又常常是含蓄的基础,能使文

章意味无穷。

第三是要避免几种用字不当的错误:“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练字)。最值得注意的是“避诡异”,要用“后世所同晓”而不用“时所共废”的字,字体“诡异”,只会“大疵美篇”(练字),那种有意造奇作怪,如“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定势)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2·2句。以上对字的修辞的要求也适用于句。实际上,刘勰也常常把字句放在一起论述。刘勰认为,句式的选择主要看需要,句子的长短并无优劣之分,“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章句),有应机权节才是最重要的。他还注意到汉语是音节文字,根据情绪、内容的不同,或者用高昂急促的音调造句,或者用低沉缓慢的音调造句,这也是“随变适会,莫见定准”(章句)的。

§2·3章。《章句》篇较为集中地分析了章句的关系及修辞。章由句组成,句的选用常由章决定。“宅情日章”,“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章的分排,是由情理表达的需要而定的。又“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每一章都应有个明确的中心,并给予充分的阐述,全章前后呼应、始终一贯,做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至于如何分章、章与章之间如何组织,那是谋篇布局的考虑了。

§2·4篇。《章句》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所以,“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不妄也”,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一篇好文章,是由好字、

好句、好章构成的，所以字句章是篇的基础，对字句章的要求，自然也包括在篇的修辞中。

关于篇章结构的修辞，刘勰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是“附辞会义，务总纲领”。为使文章条理清晰、脉络贯通，应“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明确要表达的内容和突出的重点，牢记纲领，根据题旨内容来安排篇章结构、遣词造句，避免“统绪失宗”、“义脉不流”（附会）的现象。另外，由于“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总术），篇章结构的众多因素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所以在“总文理”时，还要细心处理好各因素，才能写好文章。

第二是“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章句》说“若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附会》说“统首尾，定与奇，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目的都是“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熔裁》）。可见，刘勰很重视文章的前后呼应、始终一贯，认为这是篇章结构修辞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是结尾有力。刘勰要求文章结尾既要写得有力，如“乘舟之振楫”（附会），又要“寄深写送”（附会），耐人寻味。这一关处理得不好，同样会影响全文，所谓“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馀风不畅”（附会）。

三、关于修辞格

§3·1 比喻：主要见于《比兴》篇，原称“比”，理论已较完整。刘勰说：“何谓为此，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就

是用相似的事物或现象来说明作者要表达的“事”或“意”。比喻的原则是“切至”而物不相类：“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喻体是丰富多彩的，在“切至”而物不相类的前提下，“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都是可以的。

§3·2 夸张：见于《夸饰》篇。原称“夸饰”。刘勰首先说明了夸张的客观基础，那就是“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区别，也即抽象与具体的不同。他指出，“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神妙的道理不好描绘，精美的语言也不能直陈其极妙之处；具体事物容易描绘，夸张的文辞可以显示其真相，所以要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和夸张来阐明道理。夸张的原则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要“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刘勰用具体事例说明了“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和“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两种情况。夸张的修辞效果，可“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譬而骇聋矣”。但是，夸张的评判标准，历来有争论，刘勰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笼统地认为诗书中的夸张“辞虽已甚，其义无害”，相如、扬雄、班固的夸张是“欲夸饰其威而忘其事义睽刺也”，却没讲出具体理由，或提出判断夸张优劣的标准。事实上，诗书的夸张不一定优，相如等人的夸张不一定劣。

§3·3 对偶：见于《丽辞》篇，原称“丽辞”。对偶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反映在主观上，则“心生文辞，运裁存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所以自古文章就存在对偶。刘勰还给

对偶分了类，从其材料上分，有“言对”和“事对”，从内容色彩上分，有“正对”和“反对”。其中“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未免绝对化了。不过作者并不认为所有的对偶都是可取的：“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所以必须“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精味并载”，使之意义精辟又有辞彩。他虽然推崇对偶，但并不排斥单句、散句，认为应该“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使文章具有错综之美。

§3·4引见：见于《事类》篇，原称“事类”。刘勰把它分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两类。一是引用事例说明道理，使文章具体、生动，使读者容易理解；二是引用古言说明今天的道理。引用方式有三种：一是“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复述；二是“万分之一会也”，只摘取原文很少一部分；三是“渐渐综采”，同时引用不同文章的言或事并加以注明，这是作者知识广博的表现。刘勰把末一种引用称为“后人之范式”，似有贬抑前两种之意，其实，这三种引用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好的引用应该“理得而又要”，“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这就要求作者“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有丰富的知识，引用才会准确和恰到好处。

§3·5委婉：见于《隐秀》篇，原称“隐”。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委婉中有些是意思不便明说，有些是为了耐人寻味，刘勰强调的是后一种。但如“晦塞为深，虽奥非隐”，

委婉并不是深奥，真正的委婉，是“深文隐蔚，馀味曲包”的，能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

§3·6摹拟。《物色》篇论述了景、情、辞三者的关系，并列举了许多摹拟格的修辞现象，指出了摹拟的两种形式，一是拟形，如“依依”、“杲杲”之类，一是拟声，如“啾啾”、“嚶嚶”之类。摹拟因“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刻，而曲写毫芥”，“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所以能使读者“瞻言而见貌”，收到如见其物、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修辞效果。

四、关于文体和风格

§4·1文体论。刘勰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据统计，《文心雕龙》涉及了35种体裁，并在不同程度上探求了它们的文体风格、语言特点。比如，在《明诗》中，刘勰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在《诠赋》中，他认为赋的语言应该是“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而论文的语言则“辞忌枝碎”，注释的语言应该“要约明畅”（论说）。在《定势》篇中，刘勰把体裁归纳为六种类型，并对每种类型的语言特点作了扼要的概括，我们从中大致可以了解到刘勰对各种文体的语言特点的认识。

虽说文体的问题很复杂，同一文体如都是散文，而诸子各家语言风格却很不相同，孟荀辞雅，管晏言练，列子采奇，邹子辞壮等等（诸子）。但文章体裁一旦固定，又自有其体制、形式，所谓“文之体有常”（通变）、“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定

势)。对体式的选择，刘勰在“草创鸿笔”的“三准”中提出“设情以位体”(熔裁)的准则，就是根据内容来选择合适的体裁，而在审“阅文情”时，则要求“观位体”(知音)，首先观察作品的体裁和风格。

§ 4·2 风格论。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是文体风格；每个时代、每个作家、每篇作品都有不同于其他时代、作家、作品的特点和个性，这是时代风格、作家风格、作品风格。本节讨论刘勰关于时代风格、作家风格、作品风格的论述。

§ 4·2·1 时代风格。第一，他认为每个时代的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强调用“通变”这一原则从发展变化的角度去分析文章的语言特点，指出“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具体到某种文体，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同是诗体，汉诗“直而不野”，建安之诗则“不求纤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明诗)。第二，认为“质文代变”的原因是“时运交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哪些时代文辞质朴，哪些时代文辞华丽，这跟当时的学术、风俗、经济、政治等有关。例如春秋战国时代“以雕龙驰响”、“交彩于风云”的文风，是“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建安时代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激昂文风，“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序》)。第三，每个时代的风格对前代都有所继承，对后代都有所影响，如“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通变)。

§ 4·2·2 作家风格。《文心雕龙》评论了二百多个作家的风格特点。《才略》

篇是最集中的作家论，不仅列举了作家的成就，还作了或褒或贬的评价，但更多的时候是从语言方面着眼的，如“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等等。

关于作家风格形成的原因，刘勰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时代的影响。如“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谡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这与上面提到的“质文代变”是由于“时运交移”这一点是一致的。第二是作家本身的经历、才能、性格、学识等，这一点在《体性》《才略》《程器》等篇中有详细论述。他认为造成作家风格差异是因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的不同：“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体性)，“才”“气”是先天“性情所凝”，“学”“习”是后天“陶染所凝”。

§ 4·2·3 作品风格。这是《文心雕龙》风格论的中心和重点，因为时代风格、作家风格，最终都体现在作品风格中，只能通过作品风格去说明。在《体性》中，刘勰从修辞学角度给作品风格分了八类，并对每类风格的语言特点作了说明，还把八类分成了四组，两两相对：“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乘”。这个分类是很有创见的。齐梁以前，涉及风格的文章都谈得很笼统、很简单，而刘勰却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作品风格论，这确实是难得的。

* 引文据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艺术心理 治疗的意义

随着现代心理学和脑科学等学科的发展，艺术如何通过情感的作用对接受主体的身心健康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一秘密，已开始从主观的揣测进入科学、深刻地把握的阶段。

正如艺术心理学家 R·阿恩海姆所指出的那样，“身体的盛衰原因分析到最后毕竟还是那些对相关的个体所产生的心理影响”，而且这是一种互为循环的过程：精神影响身体，身体又会影响精神……^①因此，通过艺术接受去影响人的精神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约一百多年前，德国生理学家阿·雷蒙在一次学术讲演中谈到，“……身体和心灵的关系，这个原始谜语有着千种形态，万种变化。提出这个谜语的斯芬克司永远也不会纵身跳下她的岩石”。^②而差不多与他同时代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却真真切切地描述了审美对象如何以感官反应为触发点而引起全身心感动的情状：“当美激动我们的瞬息之际，我们可以感到胸部的一种灼热，一种剧痛，呼吸的一种颤动，一种饱满，心脏的一种翼动，沿着背部的一种震摇，眼睛的一种湿润，小腹的一种骚动，以及除此以外的千百种不可名状的征兆。”^③然而，要较切实地把握艺术的心理治疗的奥秘，离开了科学的观察和大量实验性测试而只凭经验性的猜测甚至没有真实前提的思辨是无法趋近研究对象的本真面目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尽管愈来愈分化，然而对于人的研究却愈来愈表现出人作为整体组织的统一

意义。这种统一并不只局限于生理的层面，而是具现为生理和心理的辩证统一。正由于人是一种整体统一的存在，因而把艺术的心理治疗想象成一种独立的疗法也是可笑的。

艺术的心理治疗实际上是通过设定的艺术手段所形成的“心理反馈”去调动主体在系统发育中所构成的特殊反应潜能，从而调节其神经系统以趋向于比较稳定和舒展的情绪体验。艺术之所以能达到这种特殊的心理效应是与艺术活动质的规定性密切相关的。艺术对于人的灵魂总有一种至性至情的呼求。艺术接受给予人一系列愉悦的心理波动，而这种波动是不通过外界的强制性因素而实现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强制性的反应体验往往对心理有害）。然而，艺术接受又有一种无可抵御的、令人心悦诚服的统摄力，使艺术接受在普遍意义上对不同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心理调适作用。一旦接受主体由衷地投入艺术的情感怀抱，由于高度自觉的审美注意的形成，一切外源性的干扰就会被有效地阻断，从而拥有一种心情充实、情绪饱满的“内心环境”，^④整个身心在愉悦的兴奋中有可能自然趋向一种健全的平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情绪的调适意味着身心的调适。实验表明，人的情感总是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一）内省体验；（二）行为的习性反应；（三）内部器官的生理变化。具体地说，情感变化在生理方面是通过血液中化学成分

的变化、呼吸和脉搏频率的变化、汗腺和消化器官运动的变化而实现的。⑤因而，如果艺术能够唤起人的愉悦的反应和体验，就可能调适人体重要器官的生理机制。在这种意义上说，艺术接受具有独特的心理治疗功能，两者的不解之缘就在于斯。

然而，虽然情感的意义十分显要，但情感本身毕竟太复杂了，实验的观察和研究都难以为之。因此，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艺术的心理治疗就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方法。在西方，由于现代认知心理学渐趋发达，对于艺术的心理治疗的晚近研究就大多侧重于艺术的认知功能方面。

一般地说，人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知识往来自各种感觉，但是，人凭借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所接收到的表象与现实物的性质和功能的“易读性图式”(easily readable diagrams)尚相距甚远。一棵树、一朵花或者活动中的人等给予人的视觉感受可能是乱而无序的东西。因此，感官知觉不能把自身局限于单纯复录那些碰撞接受者感官的表象，它还须寻求结构。知觉事实上也往往是对结构的发现。结构的意义体现在它能够使人了解事物的构成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程序类型。艺术作品，正是对结构的追求的果实，它使艺术家所知觉的客观对象变得更明朗、更具表现力。同时，更有意味的是，所有的知觉都含有象征的性质，R·阿恩海姆这样认为：“严格言之，一个人从来就不是与独一无二的个体特征打交道”，人所面临的是作为类的存在的特定事物和个人，并与这种特定事物或个人所传达的一般的定性取得一致的联系，所以可以说，“一切知觉都是象征性的”。既然结构的品质往往就是一般性的品质，那末人们所知觉到的事物的个别外观也就是事物或行为的类意义，换一句话说，个别的知觉或者知觉的对象可以象征性地意味着事物的一种整全的范畴。因而，当诗人、画家或是接受艺术治疗的对象将一座火山知觉或再现为一种充满恐怖色彩的进犯、将一棵树知觉或再现为春天的勃勃生机时，他们所依赖的正是知觉过程的一种固有的承受作用，即能够在任何特定情形下从广泛的意味中辨别出一般性品质。艺术，尤其是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由于是通过具有表现性的形态、色彩、线条、肌理和运动等而实现特定的审美认知目的，其吸引接受者的结构的意味就格外富有力度，甚至可以使接受者通过“替身”的方式(stand-ins)让艺术的结构取代

现实的情境，从而满足自身隐潜的认知需要以产生相应的治疗效果。不过，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使接受者趋向于对现实的认知，不仅仅是为了矫正其单一的内心现实，而且还有利于使他内心的表象世界适应于那些可能会被他以后贮存起来的未来经验所确认的诸种现实条件，由此，疗理意义就更显深远。应该指出的是，认知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对艺术心理治疗所持的立场初看起来似乎大同小异，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分歧。R·阿恩海姆就曾认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形式和内容是两相分离的，形式只是为了使接受者能够主动承诺本能欲望的满足而设立的“掩体”，而作品的内容才提供了欲望本身。这种看法的不可信之处几乎是不辩自明的，因为“我们是极愿意主动地接受优秀艺术作品所赋予的理想化的英雄、善的胜利和恶的败北”等，根本毋需在“掩体”的遮盖下满足我们内心的认知需要，艺术乃是作为一个圆浑的整体向我们呈现的、开放的世界。

自然，认知和情感并不是截然可分的，两者往往是浑然一体难分难解，因而努力把这两种研究角度结合起来无疑会有助于对艺术的心理治疗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二

人们真正自觉地运用艺术来进行相应的心理治疗还是相当晚近的事实。譬如，美国是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组织第一个音乐治疗学会的，五十年代初才正式出版专业年刊《音乐治疗》，六十年代创办了《美国艺术治疗杂志》。在我国，艺术的心理治疗则还是相当新鲜的说法，具体工作(包括研究和运用)更是微乎其微。

人们到了这么晚近的年代才开始认识艺术的心理治疗的意义，这无疑关涉到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复杂的历史背景。这里只想讨论一下艺术和巫术的关系。美学家科林伍德就曾认为，假如从再现的唤情目的来看问题的话，那末“如果是为了它们的实用价值，再现就称为巫术；如果是为了它们自身就称为娱乐”；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仪式“至少在潜在意义上可说是艺术形式”，而这些仪式“实质上都是巫术”。⑥确实，巫术作为企图借以超自然地影响周围事物和现象的一种活动和仪式，其实质就在于使人相信各种实在现象之间的非现实的联系，换言之，是企图将主观愿望当作实在对象。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巫术活动和人

的心理紧密地联系起来。《山海经·大荒西经》曾记述巫咸、巫彭等土巫由于能和大荒山上的神灵声气相通而能祛病除患；美国医生加里·赖特曾详尽地考察了土著村落中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他也认为巫师：“无论如何都应当是一个精明的心理学家”，巫术的力量不是别的，正是在于巫师通过暗示、自白等手段使人兴奋、增强自信从而达到心理治疗目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巫术的全部本质就是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基本原理”。⑦

还应看到原始宗教对认识艺术心理治疗的启示作用。远在上古时期（约在公元二千多年前），就有了所谓“信仰治疗”的记载。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宗教庙宇曾是这种治疗的重要场所，其中音乐的功效得到特别的重视。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曾意识到音乐艺术的心理治疗意义。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过，不同调性的音乐具有不同的情绪激发和调适作用，诸如E调安定、D调激烈、C调温和、B调哀怨、A调高亢、G调烦躁、F调轻浮等，其中，C调最适合于陶冶青年的情绪和性格。他还对祭颂音乐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大胆的猜测：当人们“每每被祭颂音乐所激动，当他们倾听兴奋神魂的歌咏时，就如醉似狂，不能自己，几而苏醒，回复平静，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⑧不过，类似亚里士多德的观感并非自觉之为，而且颇多虚设和牵强的意味。

三

E·厄尔曼认为，艺术治疗中所运用的艺术对象可能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对象，然而即使如此，它们也从来不是以反艺术的形态出现的。⑨其实，并无足够的依据把具有艺术品格的各体作品界划为可能或不可能发挥心理治疗作用这两大类，其差别也许只体现在所能达到的治疗效果的程度。

本世纪二十年代，维尔纳的心理学家莫兰诺（J.L. Moreno）开始运用戏剧这一形式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治疗。他设计的心理剧（Psychodrama）就是要让被试或患者通过即兴的自演角色而获得心理治疗的效果，所以莫兰诺又把“心理剧”称为“自发剧”（theatre of spontaneity）。“心理剧”的实验表明，它后来的发展愈来愈紧密地和以下三方面的心理效应结合在一起，即（一）古典主义的“宣泄”，也就是古希腊哲人观念中的“克脱西斯”（catharsis）；（二）弗洛伊德的

所谓通过“自由联想”而达到的宣泄；（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关于“情绪记忆”的强调。⑩其实，除了“自发剧”以外，一般的戏剧艺术也有使接受主体获得满意感的体验能量。一出喜剧可使观众获得一种优越感从而对丑和卑下发出无情的嘲笑，于是在无意识的阈限里悄然验证了自身内宇宙与丑和卑下的必要距离；一场悲剧则既由于对象的崇高而产生怜悯、恐惧以至痛感，也会因为自己所能唤起的、与周围观众相一致的正义的情感反应而激动，以致会产生一种希求再体验的冲动……舞蹈，这种与原始巫术活动联系深长的艺术活动，也被证明颇有心理治疗的意义。R·阿恩海姆认为，舞蹈艺术的目的就在于“抛开对理性和中庸的四平八稳的驾驭而使人服膺于本能的‘粗犷’。舞蹈的这一异教性质便是它对情绪上受压抑的人具有健康治疗效应的原由所在”。⑪阿恩海姆讲述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年青女舞蹈演员一度艰难而痛苦地同一种心理冲突抗衡，后来在一次独舞中，她被那种在自己想象中自发形成的并与其显意识中的意向、传统标准等大相抵牾的人物性格所驱使，渲染了一种恶魔似的宗教专横。由此，她得以正视了在舞蹈之外所不愿触及的某些事实，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不过，人们对于无论是心理剧、喜剧、悲剧还是舞蹈艺术的心理治疗的认识，都还只偏重在宣泄和净化郁结的情绪这方面。其他方面的认识则有待于现代科学的进一步验证。

现代实验心理学不但注意到艺术接受与接受者内部机体的关系（如用乡音朗诵诗歌改变接受者的内分泌），而且测定出人的感情反应和脑电波变化之间的联系，譬如，人在对某种对象产生兴趣并引起兴奋时， α 波就减少，而一旦恢复了平静的心情， α 波又开始增加；当人的情绪处于紧张状态时， β 波则明显地增多，而 θ 波、S波等却只有在睡眠状态时才产生。⑫当一个人欣赏巴洛克时代的古典音乐约半个小时以后，其脑电波就能从 β 波降低到 α 波的水平，这表示大脑正处在一种舒展而机敏的良好状态。⑬晚近的研究还表明，人对特定艺术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反应与大脑中的一种特殊物质有关。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专家高德斯丁在一系列的生理实验中发现，人的大脑存在着一种人体自行产生的麻醉剂——内啡。它的存在与人在接受艺术作品时所唤起的愉快体验有相当直接的关联。高德斯丁曾在七十名大学生身上注射一种能够破坏体内内啡作用的药品，尔

后再由被试任意选取和聆听平素最喜爱的乐曲。实验的结果表明,大多数被试的反应显得缺乏热情,并且不再能体验到种种愉快的情感。^④高德斯丁的结果尽管来自单一因子的研究分析,然而确实在生理层次上揭示了音乐对人的身心的直接影响。科学家还指出,当音乐信号被转换成中低频电流刺激后,音乐声能的治疗作用就更加突出。直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一般的低中频电流刺激并无显著的治疗作用,而唯有音乐所转换的电流刺激才有其微妙而神奇的治疗功能呢?也许艺术形式结构上的黄金律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给我们些许启迪。

人脑中的任何波带均可分为高频率和低频率两种,它们之间的比例取决于这个波的极限频率的比值。虽然人脑中波型颇多(诸如S波、 α 波、r波和t波等),然而为主的则是 β 波,它是脑电波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以 β 波而论,其平均频率为22.13赫兹,低频带和高频带的频率分别为8.13赫兹、12.87赫兹,总波带(即高、低频率之和)为21赫兹。由此,可以求出: $21 : 12.87 \cong 12.87 : 8.13 \cong 1.618$ 。这一数值恰好吻合黄金分割的比例。^⑤曾被认为是“上帝规定的比例”的黄金律在现代科学的审视下终于得到第一次曝光!它也为上世纪末德国美学家费希纳的一次实验提供了一种解释的依据。在费希纳的实验中,近600名被试在选择十个不同边长(边长为1~25单位)的长方形时,都选取了边长为1:1.62或接近这一比例的长方形。大多数的艺术家,很可能未曾意识到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的黄金比竟会与健康人的脑电振荡构成奇妙的对应,然而,正是他们为人类创造了妙不可言的审美对象,并成为心理治疗的最佳手段。

以视觉艺术为例,从古希腊时代开始,1.618就成为审美常数,被广泛运用于构图上。西方古典画家在选取画布的横竖两边长的比例时往往偏爱以下三种:(一)F型(Figure);(二)M型(Marine);(三)P型(Paysage)。其中F型由两个合乎黄金律的长方形合成;M型本身即为黄金律长方形;P型的画幅为1:0.414,有“谐调之门”的美称,亦接近黄金比。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乔尔乔涅的《田园协奏》、普桑的《阿卡迪亚的牧人》、大卫的《萨宾妇女》、安格尔的《土耳其宫女和女奴》、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米勃的《牧羊女》和德加的《舞女》等画都是精熟地运用黄金律构画的范例。再看听觉艺术。从音乐

运动的内在结构中我们可以找见新的“亮点”。先说和声。无论哪一种三和弦(小三和弦也不例外),都是两个音和一个半音的比例关系,即: $2 : 1.5 = 4 : 3$,很接近黄金比。这就使音乐的和声充满了美妙而和谐的变化,也可印证音乐的电频率为何会比一般的电频率刺激更有魅力和治疗功能。再看曲式。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奏鸣曲式)中,呈示部结束于第124小节,展开部结束于第248小节,再现部则结束于第347小节。假如从展示部看,它恰是开始于呈示部和展开部的总长的黄金分割点上;而从再现部看,它又是开始于展开部和再现部总长的黄金点上。其实,不少乐曲的高潮往往就设在全曲的中点之后,或中点之前,都处于全曲的黄金分割点附近,而实践表明,这些分割点确是乐曲出现高潮和转折的最佳位置。

诚然,黄金律并不是心理治疗的唯一依据,比如音乐,还因为能比语词信息更直接地通达大脑并引起较快的反应而倍受心理治疗专家的青睐。不过应该承认,黄金律作为一种历史久远、渗透了艺术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的形式比例,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内在尺度”的凝结,所以,它有可能成为接受主体生理——心理和谐平衡的一种理想条件。

四

把艺术接受和心理治疗联系起来,可以使人从中获得观念上的启示。

我们知道,在艺术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原始形态的艺术作为一种“前艺术”,被人们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功能多元而又混融的实体活动,是多种心理需要得以同时实现的手段和目的。但是,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还能十分自然地将艺术和医学这种极其功利的活动相提并论,^⑥那末到了十八世纪,经过古典主义者对崇高理性的高扬之后,人们对于艺术的观感就大为改变了。譬如,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说可算一大显例,后来的黑格尔的所谓“艺术兴趣”和“实践兴趣”绝然界划也多少反映了这种倾向。而谢林则判定:“艺术是很神圣、很纯洁的,以致艺术不仅完全与真正的野蛮人向艺术所渴求的一切单纯感官享受的东西断绝了关系,与唯有那个使人类精神对经济发明作出最大努力的时代才能向艺术索求的实用有益的东西断绝了关系”。^⑦此话并不全对,然而与之类似

了唯美派以外，也大都倾向于把艺术奉为最纯粹的、最少与手段性的、理性的或技术性事件相掺杂的精神对象。所以，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感慨道：“没有别的部分会象艺术这样使我们觉得我们的文化所带有的贵族气了”。尽管二十世纪的艺术思潮构成了对十八、十九世纪的一种反拨，而且波德莱尔也称，真正的诗应该能在接受者身上唤起所谓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热狂的两重感应，也即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彻悟，^⑩但是艺术仍更多地被视如唯精神的操作。可以说，二十世纪的艺术的贵族气并不比以往的艺术少多少。

- ① 《艺术作为治疗》，《艺术心理学新论》，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阿恩海姆的引文同，不另注出。
- ②⑫转引自石峰：《音乐世界趣谈》第8—9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参见同书第17页。
- ③ 《心理学原理》第2卷第470页—471页，纽约1889年版。
- ④ 王昌龄《唐音癸签》卷2中的所谓“处心于境，视境于心”似可参证这种“内心环境”中的心理活动。
- ⑤ 〔苏〕A·N·鲁克：《情绪与个性》第50页—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⑥ 《艺术原理》第58页、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⑦⑭转引自史仲芳：《心理与健康》第4—5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参见同书第52页。
- ⑧ 转引自〔苏〕B·л·舍斯塔科夫：《美学史纲》第2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 ⑨ 《艺术治疗：定义的诸问题》，E·厄尔曼和P·达钦奇编《艺术治疗：理论和实践》，纽约1975年版。
- ⑩ G·威尔逊：《表演艺术心理学》第157页，伦敦1985年版。
- ⑪ 《走向艺术心理学》第264页，加州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 ⑬ 参见沈建军：《音乐与智力》第74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 ⑮ 参见《黄金分割的奥秘》，《世界科学》1981年第2期。
- ⑯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医学与艺术的概念与现在的完全不同。当时，这些领域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佛罗伦萨，艺术家、医生和药剂师等都属同一行会的成员。参见《文艺复兴和生物学、医学的进步》，《世界科学》1983年第1期。
- ⑰ 《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译本第271页。
- ⑱ 参见梁宗岱文，《鉴赏文存》第3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粤北古代知名诗人述略

黄志辉

自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由于岭南山重水复，密林深谷，又受五岭山脉的阻隔，故而是比黄河流域开发较晚。其中粤北连阳一带，起初归楚湘管辖的时间较长，基本属于荆楚文化范畴；南（雄）韶（州）则为古代南北通道，与中原接触较多；南雄、始兴二县，地临赣南边境，并受江西文化风情的影响。因此，相对于粤东、粤西、南路及广西而言，这些地方的开发，自然要早一些。明丘濬说：“盖自三代以至唐，人才之生，盛于江北。”清李玉鸣也说：“岭南诗学最盛，自张曲江开文献之宗，扬风扞雅，历宋、元、明，代不乏人。”据有关史籍记载，在唐之前，粤北即有著名的文士出现。西汉浈阳（今英德）人何丹，乡里举茂才。东汉桂阳（今连县）人唐珍，幼号神童，官至司空。与唐珍同时的曲江人郭苍，亦富有文学。东晋曲江人张魴，广涉经传。南朝梁连州人廖冲，博学能文，兼通经史。南朝陈曲江人侯安都，亦善诗文。

岭南的文化发展，起初有赖于边将、谪宦及僧侣的传播。梅锷、张九龄、刘瞻的先人都不是土著，因战事或任职的需要，辗转居留于粤北。韩愈、刘禹锡在中唐贬至阳山、连州，谪居了较长的时间。惠

能在曹溪弘扬佛法，在韶州活动了三十多年，成为禅宗“南宗”之祖。他们对粤北及岭南中古封建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唐五代时期，粤北诗学较盛，决非偶然。当时，粤北的开发虽尚处草创阶段，可是人口已较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岭南占了领先的地位。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在开元年间，韶州（六县）二万余户，户数仅次于广州（十三县），在岭南道二十二州中居第二位；连州（三县）一万八千余户，户数在湖南道七州中居第五位，但如与岭南道各州相比，则仅次于广州与韶州，而远在其余各州之上。另据阮元《广东通志》（以下简称阮《通志》）载：唐代广东最早登进士第的，是张九龄的伯父张宏雅；最早举乡贡的，是张九龄的从弟张瓊龄。终有唐一代，广东进士三十八人，举人八人，其中始兴、曲江进士七人，举人四人；连州进士七人，保昌（今南雄）进士二人，翁源举人一人。而张九龄家族进士四人，举人三人。五代时期，广东进士八人，粤北仅连州有进士四人。现在有作品传世的粤北唐五代诗人，大都在科举与仕宦的途程蹭蹬一生，程度不同地经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

张九龄（678—740年）是初、盛唐间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诗人。对于张九龄的政绩，历史学家多有注意。但对他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张九龄的诗作虽仅二百三十余首，但古体、乐府及五、七言律、绝与排律，各体大备，尤其五古、五律的成就更为突出。他不仅写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并提出了赋诗“扬美”的理论纲领。特别他在晚年出贬之后，写了《登荆州城楼》、《荆州作》、《杂诗五首》及《照镜见白发》等一批具有切肤之痛的作品，并有堪与陈子昂共相媲美的十二首《感遇》诗，把张九龄誉为有真才实学、身体力行的文坛领袖，是唐诗革新运动中有理论、有实践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不会过分的。

在张九龄的家族中，张随（族侄）、张仲方（族孙）张偁（从侄曾孙）等人，继承其家学渊源，也有一些诗作传世。虽然数量不多，也能反映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某些侧面，并可见到时代变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唐时期的曲江人刘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人称其“文章与韩（愈）、柳（宗元）齐名”。只是他的著作几乎全数亡佚，无法窥其全豹。今存遗文十四篇，《牛羊日历》1卷。诗仅存试帖诗《玉声如乐》1首，约略可见刘轲对诗歌创作也有较高的造诣。

在晚唐的粤北诗人中，翁源人邵谒的成就较高。《唐才子传》说他“苦吟，工古调”。其诗学孟郊，今存三十二首。所作多能针砭时事，题材广泛，思想深刻，风格深沉，是唐帝国行将灭亡的写照。明黄佐《邵谒传》说：“谒以晚唐一介士，获其永

名，与诸名家并行，其诗当不下人矣。”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在晚唐五代时期，连州接连出现了一批著名诗人，包括黄匪躬、吴霁、张鸿、陈拙、石文德、黄损、李廷珙、邓洵美、胡君防、孟宾于、孟嘏等，其中以南汉的黄损及南唐的孟宾于，创作成就最高。据《唐才子传》载，黄损早年曾与著名诗人郑谷、齐己（僧）等人“共定用韵，为葫芦、辘轳、进退等格”，为渤海骚人所宗。惜仅存诗四首，已难窥其原貌。孟宾于青少年时期力学不倦，成名甚早。但屡试不第，后又历仕楚及南唐，仕途坎坷，饱经忧患。今存诗十首，反映了较丰富的社会内容，艺术风格也较多样。陈尧佐序其诗集说：“如百丈悬流，洒落苍翠间，清雄奔放。”可谓能道其意趣。

在五代末年，还有两位值得一提的诗人，就是原籍连州，后来流落到昭州（今广西恭城）的周渭、周澹兄弟。因周渭（兄）较早从南汉脱身归宋，排入宋代；而周澹不知所终，便排在五代之末。周澹存诗四首，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几乎首首都好。

合计粤北唐五代诗人及其诗作，共十三人，诗约二百八十首，人数及诗作均未及全国的百分之一。尽管数量不算多，但初、盛唐和中、晚唐与五代几个时期都有相当著名的诗人，尤其张九龄、邵谒、黄损和孟宾于四人，在全唐诗这座丰碑里，是应有其位置的。

二

宋代以前，广东地僻人稀。但自张九龄于开元年间主持开凿了大庾岭山路之后，广东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往日渐频

繁。而大庾岭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成了南北交通的主要轨道后，南雄便成为各地官民南下广州的中转站。宋代比较重视发展教育，府州县学有较大发展，不少地方并创办了书院。在北宋时期，粤北办学之风甚盛。连州州学、南雄府学与英州州学、韶州府学依次建于咸平（998—1003年）、庆历（1041—1048年）与至和（1054—1056年）年间，在岭南说来都是建学较早之地。另外，五代时期连州名士黄损在保安的读书之处，在北宋兴建了天衢书院。于此前后，南雄建立了孔林书院，英德建立了涵晖书院。这些府学、州学与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据阮《通志》载：在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间，广东进士一百二十七人，其中连州四十三人，曲江十三人，保昌九人，始兴九人，乐昌七人，翁源四人，英德二人，乳源二人，阳山一人，合计将近占了百分之八十。这个时期，粤北诗人在岭南诗坛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初的粤北诗人，有连州人周渭、邵晔、邵奕、吴世范、欧阳经等，都是由五代入宋的遗民。他们亲身经历过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饱受乱离之苦，较易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不过，流传下来的几首诗作，还清新可读，且内容比较充实，留下了北宋初年社会动乱的一些痕迹。

余靖（1000—1064年）是曲江人，北宋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学者与诗人。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余靖是核心人物之一。又是欧阳修开展诗文革新运动的同盟者和支持者。余靖一生曾两度被贬，归家闲居达八年之久。今存编入《武溪集》中的一百三十五首诗，大部分写于贬谪期间，尤其是第二次乡居之时。

余靖极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主张“有美必宣，无愤不写。”即使是唱和或题咏、宴游之作，也都是有所为而为，极少吟风弄月或茶余饭后的消遣笔墨。《宋诗钞》称余靖的诗“坚炼有法”，“弃华取质”；《粤北诗海》则赞余靖的诗“骨格清苍，吾粤宋诗无出其右。”事实上，在有宋一代，余靖的诗作不仅在寥寥可数的岭南诗人中可以首屈一指，即相比于北宋同时期的几位大家，也是自有其独特的风格的。

与余靖相去不远的粤北诗人，有始兴人许光、谭粹，乐昌人李渤、李岩兄弟，南雄人张渐，英德人郑敦义。他们的存诗，全部是纪游、题咏之作，所写名胜古迹多在广东境内。这些诗歌，都不是为写景而写景，往往寓情于景，有一定的寄慨，打下了时代的烙印。他们的诗作，对认识粤北一些风景名胜的面貌，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

自北宋中叶起，由于中原人民不断南徙，加之粤北战乱频数，广东的经济、文化重心，渐次南移。据《宋史》统计崇宁元年（1002）的户数，广南东路共五十七万四千多户，其中韶州五万七千多户，连州三万六千多户，南雄州二万余户，英德州三千余户。合计粤北几州的户数，在广东虽仍不算少，但较之循州（今龙川，四万七千余户）、潮州（七万四千余户）、梅州（一万二千余户）、惠州（六万一千余户）、南恩州（今阳江，二万七千余户）、新州（今新兴，一万三千余户）及肇庆府（二万五千余户）等地，后者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历经变迁，到南宋时期，粤北的知名诗人已经甚少。

南宋前期连州人廖颀，乐昌人宋时

参，南宋后期英德人郑玠、郑康佐父子，地方志中也收录了一些纪游之作。其中郑玠存诗较多，诗中所表现的自我形象相当鲜明。他生活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南宋小朝廷苟安一隅，许多有志之士尽管不满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便转而逃避现实。郑玠为官望隐，习儒崇道，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所写诗作，离不开山林和仙道，明显受到江湖诗派的影响。南宋后期连州人蔡齐基，笃学业文，诗尤高。有集传于时，但没有流传下来。

元朝统治时间不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复杂，对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苦闷的时代。整个元代，全国诗坛都较沉寂。今有诗传世的粤北诗人，仅知二人：南雄人麦澂和乐昌人李鼎。两人都是州县官吏，前者乐在山水，不务政事；后者寄情诗酒，慨叹兴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

合计粤北宋元诗人及其诗作，共二十一人，诗约一百九十首。除余靖之外，只冯晦有《南山杂咏》传世（已佚）。其余人，一般仅存诗二、三首，顶多为六至八首，无法挤进全省、全国的行列。

三

明清时期，广东不断吸收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兼采众长，并利用自身优越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大大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农业、丝织业、造船业和对外贸易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不少“广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此时，珠江三角洲和韩江平原已成为广东的主要农业基地，而广州则成了岭南各地物资交流的集散地和

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粤北原先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遂被取而代之。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明显落后于岭南其他一些地区。据阮《通志》载在明清两朝（至道光二年止），广东进士一千八百三十一人，其中保昌十二人、曲江、乐昌各八人，连州五人，英德三人，始兴、仁化各二人，翁源、乳源、阳山各一人，粤北合计仅及全省百分之三。

明代粤北诗人有诗传世的仅明初南雄人陈进，明中叶翁源人王器先、南雄人谭大初，连州人李邦义，乳源人邓如昌，明末连州人莫与齐等。他们的诗作，收录于方志里，多是纪游诗。唯谭大初，所作七古《吊邱忠臣》，通过凭吊宋末本乡守节尽忠的烈士，抒发爱国之情和民族大义，歌颂为国捐躯的献身精神。李邦义七绝《谢朝贵》，不满于严嵩乱政，表示了不事权贵、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态度。

还有一位隐居于阳山县的韩洽，流传下来的诗歌只有六首。但每一首都有丰富的内涵，形象地反映了明代边事迭起、战乱连年的社会现实，思想性很高，感情色彩极浓。另一位隐居于仁化县的李永茂，也有一些诗作传世。

入清以后，粤北诗坛稍振。清初，有乳源人胡之宾，连州人莫宏龄（莫与齐孙），曲江人廖燕；清中叶，有乐昌人欧堪善，始兴人林明伦，南雄人胡定；清后期，有连州人张惟勤，英德人杨模，等。

廖燕（1644—1705年）是清初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和诗人。廖燕家贫好学，十八、九岁便补为秀才。然而抗志不羁，不趋时俗，以致毕生不为所用。他的知识

面很广，主张读“无字书”，见识不凡，敢于离经叛道。晚年辞去诸生，杜门著述。所著有《二十七松堂集》，编入诗歌五百四十九首。其文恣肆犀利，论诗主“性情”之说，反对“袭人”、“牵强凑拍”及“无端之歌哭”。所作大都语言浅近，形象鲜明，直抒胸臆，很有个性。

廖燕与“岭南三家”约略同时而稍后。他与屈、梁二人似无往来，而与陈则相知颇深。廖燕《二十七松堂集》有《与元孝（即恭尹）》书，而陈《独漉堂集》亦有对廖燕的评论，称廖“人真妙人，文真妙文”，“虽欲不推为古文中第一手不可”。廖燕去世之后，其著作不仅流传于国内，部分诗文还一再刊行于日本，被誉为“明代文坛的大殿”，“几合乎介甫（王安石），”获得很高的评价。

除廖燕之外，欧堪善有《泷涯集》，杨模有《文泽堂诗集》，张惟勤也有古今体诗五百余首，诗的数量堪称洋洋大观。林明伦留下的诗作仅有《吊五人墓》一首，写的是明末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阉党的重大主

题，表现了反抗暴政的坚定立场，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杨模的诗，语言明快，构思新巧，有些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官吏离乡别井、驱驰仕途的艰难困境，或表达了清廉自重、勤政爱民的志节，也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合计粤北明清诗人及其诗作，共十六人，诗在一千四百首以上。其中廖燕名传中外，成就最高。韩洽、林明伦及杨模等人，也有较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广东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最先入侵的主要目标，并且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次重大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岭南诗坛人才辈出，众星灿烂，在整个中国诗坛首屈一指。不过，粤北经济、文化久久不振，诗家几乎消声匿迹。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以后，才稍有改观。但这已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了。

作者单位：广东省韶关师专科研科
责任编辑：刘斯翰



“商团事变”前后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

温小鸿

1924年在广东发生的“商团事变”，与这前后大多数广东商人的心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态度的变化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对两者的联系，尤其是商人的心理变化，过去忽略了。其实，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能更为合理地解释“商团事变”本身，而且有助于认识当时广东资产阶级的状况以及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

一、喁喁望治：广东商人的心理祈求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封建专制制度虽然大势已去，但真正的共和制度并未建立起来。谋求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依然可望不可及。于是，阶级的领袖与阶级的主体之间出现严重差异：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仍在为共和制度而斗争，而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分子则被趋安厌乱的心理所占据。“十年前赞助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商人，现在已经对其不置可否。”^①相反，当上海总商会提出“裁兵、制宪、理财”三大目标时，则全国呼之者众。时人称此为“国人急切望治心理之表现”。^②这种厌乱望治情绪在广东商人中尤为突出。因为辛亥以后，广东逐渐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基地，不少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云集广东，同时也有大批政客、军阀南来，使广东政局动荡不已，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广东的工商业“有如江河日下之势。”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氛围之中，急功近利的商人再也无法理解孙中山的奔走呼号，甚至将他与政客军阀视为一体，反对孙中山在广州重设大元帅府；他们“莫不望战事早日解决，民困早日苏息”，因而对所谓“粤人治粤”表示好感。

对于商人这种心理和政治态度的变化，孙中山是深为理解的，而且其时的孙中山及其政府与辛亥革命时一样，同样需要商人们在经济上的

支持；再者，多年的斗争实践使孙中山切身意识到必须把广东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以作为革命的出发点，其中恢复广东的工商业是重要的一环。所以，孙中山为了争取商人的支持、力图制定和实施一些保护和有利于商人的政策。在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之职时，他即通电表示：“决裁粤兵之半”，“从事建设，以与吾民更始”，^③并决心“切实保护商民，回复交通”，以“改变广东商业的凋残之象”；下令建立“保商卫旅营”以保护省内各地商人运货安全；颁布“临时军律”，规定“凡抢劫财物，擅自拉伕，逮捕商民，随意封用商船、勒索打单者一律枪决。”这些措施与广东商人的望治心理正相吻合，使深存疑虑的广东商人有了积极的反应。广州总商会特别活跃，多次召集商人开会讨论孙中山的主张，各界商人“千余人踊跃赴会，可见人心之一致。”^④这与他们原来对孙中山的冷淡、排斥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

然而，对孙中山来说，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手中缺乏一支有力的军事力量，因而依靠军阀打军阀成了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此时，他同样也无法摆脱这一点。这样，在驱逐陈炯明重建帅府中立了功的滇桂等系军阀，“倚功自傲不可一世”，蔑视孙中山保护商人的各项措施，盘踞省城内外的主要商业区，截留税款，中饱私囊，“各种捐税多如牛毛，几乎无孔不入。”更有甚者，就连孙中山为保护商业运输而设立的“保商卫旅营”，也成了军阀层层抽剥商人的机关。至于孙中山下令实施的“临时军律”则成了具文，公开抢劫强行拉伕的，“藉名运兵封用商船，其实用以载家货渔利的”，数不胜数。总之，孙中山为保护商人所作的努力化为泡影。

军阀的所作所为，使商人们大为忿懣和痛恨，各地商人纷纷指控军阀，要求孙中山给予严

怨。在这种状况下，从经济上依靠商人，在军事上依靠军阀的孙中山，在此时则深深地陷于这两个阶层矛盾的夹缝中而左右为难。一方面，为平民愤，他下令限期将大部分军队撤出广州市区，以减少不法军人在城内滋事的机会，决定实行财政统一以缓解广东政府的财政危机，迎合广东商人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又实施军事优先的方针，使军阀们更是有恃无恐，对孙中山的主张采取了公开抵制的态度。他们不仅拒绝出席大元帅府的财政统一会议，甚至还私自增设“协饷局”，“护费机关”，使孙中山的努力再告落空。使广东商人心理和实际能力上难以承受的，除了军阀的勒索外还有政府方面的税收。此时的广东政府支出越来越大，仅军事一项，就占了政府开支的绝大部分；而各地军阀自设关卡，致使“各县税收，均为各军截留”，^⑤未能上缴政府。这样政府不得不向商人开征新税。其中对商人和市民影响最大的，是1923年底开始的“举报官产”。它规定，凡未交验“合格”契约的，其产业一律充公拍卖，并奖励举报有功者。于是不少投机分子随意“举报”，顿时使“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⑥广州总商会称此“与日本大地震不相几。”“举报官产”虽然筹巨款于一时，但却把商人的积怨推向顶端。佛山商人愤而指责政府是“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⑦这就使商人们对孙中山及其政府的祈望心理再也无法保持平衡，向着反面逆转。

二、“商团事变”：广东商人的心理逆反

“商团事变”是广州、佛山等地商团上层分子利用扣械事件向政府施加压力的举动。它所以能爆发，是否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动，因材料不详，在此不拟作评论。但笔者以为有一点是较为明确的，即有大多数商人的逆反心理为基础，没有这一点，仅靠少数人是难以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

广东商团是辛亥革命后“国体改变，秩序尚未完备的产物”。1911年12月，广州部分商人鉴于“社会秩序待整正殷，维持公安亦即维持商务”，决定成立粤商维持公安会。1912年，广州商团由此组织演化而来。不久，省内一些主要商埠也相继成立了商团。当时多数商人认为“维持公安是政府的责任，粤商负此责乃临时过渡性质。”^⑧可是这一“过渡”竟长达10年。在这期间，商团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1924年，广东商人逆

反心理日渐表露，普遍认为，“粤垣政局迭变，商场未大受蹂躏，皆商团自卫之力”，^⑨而“粤省商团成绩为各省之冠”，^⑩对商团表示好感；而广州商团在征求团员的布告中说：“地方多故，首受其害者，厥为吾商”，抓住了商人的心理要害，刺激了商人加入商团的欲望。所以，这一年，广州、佛山、江门、香山等地的商团都纷纷扩展，建立起分团，商团人数骤增，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连孙中山在1924年初广州警察与商团的联欢会上也要求商人与政府合作维持治安。实际上，商人加入商团，是“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心理”。^⑪

这种“官卫不如民自卫”的逆反心理通过南海九江商团与滇军对抗一事而迅速强化。1924年6月，南海九江滇军因屡次骚扰商店、抽剥商人并且焚烧商物、占据商团驻地而与当地商团发生冲突。事发后，南海商人联合起来，各地商人也纷纷声援，广州和佛山的商团还派队支援，最后迫使滇军撤出九江。上海的商业报纸就此事评论说：“兵多而不能防匪，反为民害，人民厌恶军队之心甚于恶匪，此种仇怨之气积之愈久能不如九江商团奋然而起耶？”^⑫

这一事件对广东商人的心理产生两大影响：其一，他们感到只有自己的力量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卫之力”普遍加强。所以，当以陈廉伯为团长的广州商团借机扩大势力，筹集巨款购置枪械时，各地商人纷纷响应，短时间内就筹集上百万元巨款。其二，他们认为政府再也不能替他们作主，因而对政府的不信任日渐明朗化。主要表现为金融风潮频繁和罢市次数增多。

金融是政府信用的指示器。为缓解财政危机，广东政府于1924年初决定由广州总商会、广东善团总所出面，联合发行短期军用手票50万元，以广州各善堂100万元产业作为担保。不久，政府又决定筹办中央银行。对于这两项措施，商人均持反对态度。《申报》指出：“粤商界饱受历任政府滥发纸币之苦，故对今次钱票，咸怀观望，宁愿歇市以避之”。^⑬所以，当这种手票流向市面，商人中顿起拒用风潮，关门歇业，前后达十天之久，直到手票停止在市面流通。至于中央银行，在其成立前夕，商人中就产生一阵恐慌。一钱业商人投书报社，要求政府“欲发行新纸，非先维持原有旧币”，否则只能“令政府信用大跌”。^⑭这一要求，显然是反对中央银行的成立。中央银

行成立时，虽然一再宣布已有资本1000万元作为准备金，并保证纸币可以随时兑现，但商人仍然不信任。中央银行成立次日，广州钱业公会召集钱业商人，决定翌日全城银行罢市，“以拒用中央纸币为目的”。广州大新、真光、先施三大百货公司也因军人强行使用中央纸币而关门，严重影响了商业流通。广州公安局只好发出布告，禁止强制使用中央纸币，才使拒用风潮得以平息。

罢市是商人与政府决裂的信号。1924年广东商人罢市次数之多，为历年所罕见。《广州民国日报》承认：“（商人）罢市所以表示其有所不能担任，而对官厅为消极之反抗也。”^⑨从年初开始，钱业、药业、航业等商人相继罢市。5月，政府宣布实施“统一马路辅业权办法”，规定所有马路两旁商店全部缴底价二成，“用于马路两旁建设。”这就损害了大多数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的利益，他们纷纷诘问政府：“吾粤商业凋残，已达极点，商人籍区区血汗，焉有余力以承受此重价辅业？”^⑩5月23日全市商人代表集会，建立广州市铺底维持会，以图有组织地与政府交涉，并通过决议：28日为全城总罢市日，广州、佛山及江门等地商团还携械云集省城，表示要以武力“为商人罢市的后盾”。

金融危机和罢市风潮的交替发生，从表面看，似乎是商人们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但实际上，它表明了此时的商人采取了与政府对立的态度，“政府之威信，乃因之扫地无余矣。”对此，孙中山也承认“革命政府渐失商人信任”。但更为可怕的是，商人们不信任政府的态度，为商团上层分子所利用，成了他们发动“商团事变”的群众基础。

扣械事件发生后，商团军的反政府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在佛山举行的全省商团联防大会上，商团就曾议决“停止纳税，封锁孙政府之经济”，^⑪对这一与推翻政府无异的举动，一向以“在商言商不问政治”自居的商人，却表示同情。广州总商会、商业维持会等商人团体多次联名担保要求政府发还枪械。此外，绝大多数商人还直接参与了商团发动的两次大罢市。罢市期间，虽然政府一再警告商人，令其迅速开市，并派出警察沿途劝谕商店开门，但素以厌乱著称的商人此时却自甘从乱，对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强令商店开市的军队一过，商店又复闭门。”^⑫大多数商人参加罢市，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既从经济上严重打击了孙中山及其政府，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又在政治上支持、怂恿了商团军的反政府行

为，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少数商团上层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多数商人的逆反心理，使事态不断扩大，最后发动“商团事变”。

三、国民政府：广东商人的心理认可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的方针，老朽的国民党开始注入新鲜血液，孙中山在这段时间，更是从各方面采取新的措施——“黄埔军校的建立，党军开始组建，一个正在营业的中央银行，以及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机构”，将会逐渐显示出功效。^⑬所有这些，是广东政府改变依靠军阀的状况，恢复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广东商人所期望的，亦不过是结束军阀的专横，政府理顺税收政策，社会安定，让他们有生意可做。两者的日渐接近就有可能使广东商人失却的心理平衡得以恢复。

1925年6月，广东政府下令镇压刘杨叛乱。不久，国民党中央决定“以广东为革命政府根据地，亟应整顿内部。”7月初，广州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相继成立后，便进行了统一军政、整顿财政和刷新吏治等工作，宣布收回军权，移军队于郊外；统一了财税，保护商人；禁止贪官污吏勾结奸商坑害商人等政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政府形象有了初步改观。时报纷纷发表评论，如《申报》指出：“国民政府成立后，凡事无不趋于革新”；《东方杂志》也说：“今后广东可说是实施民治最相宜的地方。”而大多数商人也从实际利益中感觉到政府正在实施保护商人的政策。这样，商人原来紧张、逆反的心态也逐渐得到缓和，重新恢复了对国民政府的信任，向心力趋于加强。

在实行统一财政期间，既要坚持政府各项正当的税收，又要革除苛捐杂税，这就需要商人的合作。为此，政府多次邀请广州总商会、省商业联合会、广州市商会和商民协会的商人代表进行讨论，制定办法。经过协商后，商人一致承认印花税是正常的工商税收，商人应有缴纳的义务；同时，对警察随意滥罚、借机克扣的行为提出批评，最后双方议定由商会协同警察检查印花税，并组织“违反印花税法审理机关，官商各半参加。”^⑭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前，需要大批军需战费，没有商人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国民政府专门派出官员安抚商人，表示“用兵东江，抱定不扰民宗旨”，并向商人解释出兵东江的目的在于完成全省统一，“只有统一，才能多开市场。”这当

然很合乎商人的职业心理。结果，商人普遍乐意预借一月租捐作为东江战费。

省港罢工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性罢工，要取得一向不关心政治的商人的合作，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罢工初期，由于省港交通被切断，许多通过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受到影响，并因此影响了广东的经济生活。后来，国民政府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协商，适时调整政策，将原来的“一律封锁”政策改为“单独对英”政策，鼓励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直接与广东商人进行贸易，并开通粤沪航线，发展国内贸易，从而改变了罢工初期工商业停顿的状况。同时，由于国民革命军逐渐收复广东的东江、南路，全省统一市场初步形成，广州成为货物集散地。广东商业因祸得福，“颇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象。”现实的经济利益作用于商人心理，使其对省港罢工的态度由怀疑、观望到理解、赞同，在道义上和经济学上大力支持罢工工人。

实际上，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东征、省港罢工、北伐，所需经费并不少于以往。但由于财政初步实现了统一，军人随意勒索商人的现象大大减少，尽管商人经济负担仍然很重，但比起从前漫无边际的层层剥削，已是大大好转了。因此，广东商人在心理上、经济上还是承受得了的，故对国民政府的行动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另外，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整顿了社会治安，使商人在贸易活动中的不安全感有所减少。政府治安职能的恢复，改变了过去以商团代之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才比较有把握地说：“在本党政府之市场，可以运用军队之力，政治之力，以肃清土匪，肃清贪官污吏，保障一切商场之治安”，因而“商民无武装的必要”。^②

广东商人、市民人心向背与否，直接影响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国民政府成立后所作的一切，表现出一种积极向前的趋势，因而赢得包括商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很快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结 语

从这个时期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可以看到：

第一，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辛亥革命以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而胜利，同时也以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制度而失败。孙中山及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理想和奋斗精神固然可钦可佩，然而却与全国民众的思安厌乱心理形成

鲜明反差。“自从二次革命失败后直到最近时期止，国民对于政治抱绝对消极态度”，^②辛亥革命时期商人阶级摇旗呐喊甚至助刀上阵的情形再也难以看见。这种情况值得深思。思安厌乱本是一般市民的普遍心理，但在20年代最初几年，它是大众对社会现状不满情绪的流露。如何评估这种社会现状，有待我们去研究。事实上，此时的孙中山也处在历经失败而尝试新的道路、但与旧的一切还难以一刀两断的矛盾之中，这样就很难要求一般民众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

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是当时全国民众心理变化的缩影。这一心理变化虽然经历了几个阶段，但基本趋势是期望尽早结束军阀统治，平定社会动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潮流。孙中山为了这个目标曾经心力交瘁、不息地奋斗，但他在1923年初建立的广东政府并没有获得广东乃至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利用军阀的策略反使他掉进了受制于军阀的泥坑。军阀在广东的胡作非为使广东商人、市民怨气冲天，也使孙中山的英名蒙上了尘埃。深知“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的孙中山，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以俄为师、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如果说，这一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对旧民主主义革命表现出失望和不满，是其内因之一。而广东商人对国民政府的认可，则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大势所趋。

第二，由于社会生活处于新旧交替的变动时期，商人的过渡型心理特征非常突出。这与中国近代商人的某种新旧交融，由旧趋新的特质很相似。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有过短暂发展，商人阶级的愿望、需要和价值观念有了新的变化。他们虽然仍口口声声自称“在商言商”，但又往往不甘于军阀的淫威，不时发出强烈的叫喊。商团组织迅速扩大是这种心理态势的表现之一。不过，与西方资产阶级比较，他们还是相当幼稚的。不成熟的阶级孕育了不成熟的阶级心理。在“商团事变”中，广东商人高叫“自治”，其实这只是一种反常的心理表现。若真言“自治”，连资产阶级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广东也不具备条件。况且，进入20年代的资产阶级，其利益和命运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更紧密了。中国资产阶级生与俱来的弱点，为帝国主义插手中国政治提供了机会。因此，广东商人所谓的“自治”，很容易为帝国主义利用和操纵。

广东商人不成熟的心理状态还表现在始终是对新的强力中心的企盼。希冀在强力的保护下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其心理的几次变化不过是这种企盼的不同表现形式。利益的功利性使他们不在乎长远的政治性，只要这个强力中心能为他们提供自由自在发展的机会。这也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普遍心理。

-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维经斯基在中国的
有关资料》第236页。
- ②④⑤ 《申报》1923年9月16日、3月25日、3
月20日。
- ③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海军大元帅大
本营公报》1923年第1、31号。
- ⑥⑧ 《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第132页、第7辑
第28页。
- ⑨⑰⑱ 香港华字日报社：《广东扣械潮》第1、
98、105页。

- ⑩ 《国闻周报》第1卷第5期。
- ⑪⑭⑮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4日、7月
12日、5月31日。
- ⑫⑬⑯ 《申报》1924年8月16日、2月10日、
5月26日。
- ⑲ 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
288页。
- ⑳ 同⑪1925年12月21日
- ㉑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册第
491页。
- ㉒ 《东方杂志》第21卷第4号。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林有能



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

梁方仲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不仅对所专研的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提出了不少精辟创见，而且在人们很少涉及的某些领域作了艰辛的开拓工作。如关于一条鞭法、粮长制、黄册、鱼鳞图册、里甲制度、易知由单、户贴制等问题的研究，以及晚年更关于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综合研究等等，所取得的成就，早已为国内外历史学界所推重。

梁先生研究一条鞭法历时最久，用力甚勤，做了不可磨灭的开创和奠基工作。明代一条鞭法的推行，由开始到结束，不仅拖延的时间长，而且各个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变通形式，头绪纷繁，难以掌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梁先生从大量分歧繁杂的文献资料中，抽象出规律性的内涵，进行综合概括，得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梁先生认为，一条鞭法主要是徭役制的改革。徭役由力差改为征粮，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改革徭役制又影响到农民田赋负担的变化，减少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差徭负担。

在一条鞭法没有实行以前，田赋按田亩计算，差徭按丁及该户丁所占田亩编订

均派。对农民来说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负担。实行条鞭法，各个地区通过不同的形式按丁、地两项分摊徭银，将徭役的一部分或全部课之于土地。分摊办法因时因地而不同，梁先生将之归纳成为四种形式：一、以丁为主以田为辅；二、以田为主以丁为辅；三、按丁田平均分摊；四、徭银完全由田地承担。在四者之中，后者只在明代后期在个别地区实行过，而前三种占居主要地位。在实行条鞭法以前，徭银虽然有一部分由土地承担，但所占比重很小。实行条鞭法后，徭银之由户丁负担的部分大为缩小，由土地承担的部分显著增加。如明人曾经指出的，由田亩承担的“徭役加派日益月增”。由这种变化说明条鞭法已具有由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的内涵，但它不同于此后清代的“摊丁入地”，因为明代按田亩摊派徭役银之外，人丁还承担部分徭银，这是条鞭制和清代“地丁制”仅存的一点界限。梁先生所说条鞭法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就是指它具有“摊丁入地”的因素，指开始向“摊丁入地”过渡，条鞭法的实行，各地在时间上参差不齐，由开始到结束，只持续了百年左右，有的地区只实行了几十年，在整个赋役史上寿命是短暂的，条鞭法变革本身也

说明它的过渡性。把条鞭制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进行考察，是梁先生在学术方面作出的一个贡献。

对于条鞭法推行的原因和作用，梁先生指出，条鞭制产生原因首先是土地兼并和人口流动。就是说它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在未行条鞭法以前，所实行的以里甲制为核心的徭役制，是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地权比较稳定为条件的。以后伴随着阶级矛盾激化与地权集中，使原来的徭役制失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迫使封建国家不能不考虑调整赋役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关系。梁先生还指出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作用，无疑是促使赋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行条鞭法所导致的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奴役关系的削弱，如梁先生一再指出的，条鞭法出现以前所推行的黄册制度、里甲制度、征派差徭的三等九则制等，都是以暴力强制为条件的。与这种制度相联系，是封建国家对广大农民的强制劳役和人身压迫。条鞭法推行以后，一切徭役改折银两，逐渐把征派差徭的重心转向土地，国家逐渐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这标志着农民一定程度的解放。早在解放以前，关于条鞭实行的原因和作用的分析，就能提出这种看法，是难能可贵的。

粮长制的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课题。粮长制由永充、轮充到朋充制的演变，各个地区在时间上参差不齐，互相交错；裁粮归里，粮里合并的发展、变化到结束，延续了两百多年。粮长制的这种发展演变过程本身就极其复杂难辨，而且还夹杂着其他种种因素，梁先生针对分歧复杂的记载，条分缕析，给人以清晰印象，

并纠正了人们长期存在的某些误解。

梁先生对明代中后期粮长性质变化的研究也很值得注意。朱明开国后的六十年间，粮长这一职务，主要由当地首富——大地主担任，当时粮长权势炫赫，横霸一方，带有“半官”性质。有的还得承皇帝诏见，授予官职，因此当时地主多以充当粮长为荣。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粮长由永充制改为轮充制和朋充制，一般农民皆得充当，这是一个大变化。粮长充当者既由地主改为一般农民，与此相适应，粮长职位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由“半官”性质变成为对农民的封建徭役。梁先生在这方面的剖析极为深刻。

梁先生关于明代中叶前粮长职责的分析也超越了前人。这时粮长要完成一个粮区的秋粮（主要是漕粮和白粮）的催征、经收和解运这一主要任务之外，还参与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册籍、劝诫农民耕种、监督粮户纳粮当差等等。洪武年间，甚至指令粮长检举地方上不法官吏和横霸顽民。在有些地区，粮长还兼有听讼理狱的权力。这时的粮长制，就其职责性质而言，如梁先生所论证的，超出了单纯征收税粮的任务，而在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政治组织的作用。

值得提及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梁先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态度和工作方法。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梁先生于1934年曾经同当时部分史学工作者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明确提出要“随时代的进步”撰写“适合时代要求”的作品；主张历史著作应该是“叙述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变化，和文化的进步”；同时提出研究历史要以“整个民族和各民族的发展为主体。”梁先生在

历史研究方面所持的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史学界要求进步的思潮和初步的唯物主义史观。

解放以后，梁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历史。梁先生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经济史时，曾经这样说过：“掌握经典著作的真义就是攀登高峰。只有登上了这个高峰，研究历史才能极目千里，全景在望”。他针对当时流行的把经典作家说过的每一句话简单化为贴标签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强调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在理论方面要求努力做到掌握有关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科研工作中，梁先生坚持严谨学风，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主观臆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掌握大量历史资料，进行仔细分析。他经常谈到，要注意详审辨别资料，所作论断要有充分根据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要求别人这样作，他自己在这方面更是躬行实践。他的论著所有重要论点，都是根据大量资料并经过慎重考虑而作出的。他从不脱离资料而进行漫无边际的推测和主观臆断。

梁先生治学严谨还反映在对待古籍记载的态度，解释力求准确。譬如有一次，在审订资料时，有一句话可以做两种不同的解释。为了弄清哪一种解释比较稳妥，他查阅了大量书籍，并和同事进行研讨，然后作出判断。凡涉及有关财经的典章制度、名物、术语，必查阅群书，详加考订，务求弄清其真实含义和全部内容，从不望文生义。他对自己写的文稿，在发表以前总是一再推敲和修改，甚至对待每一

个标点符号都十分注意。他对待科研问题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很值得学习。

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对一切历史现象，必须对它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掌握问题的实质。梁先生一贯比较注意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研究，他经常谈到：选定题目，从事研究，要从大处着眼；需要处理的问题，有的需要考证，但不要停留于考证。他从事研究明代赋役制度所选题目，范围大者如一条鞭、粮长制和里甲制，小者如户贴和易知由单，在研究过程中都经过详细考证，最后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解放以后他所写的有关明代赋役制度的论著，更加贯串着这种精神。

和严谨学风紧密相联系的，梁先生的科研工作还贯串着一套科学方法，特别是关于数字统计的整理和运用。研究经济史，数字记载极关重要。尤其是长时期的统计数字，是进行研究的基本材料。梁先生有很多文章都尽量使用数字统计。如《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根据二十五史、历代政书、各省方志、历朝文集、以及近人著述有关数字材料，进行了详审的考核测算。中国史书所记数字，每互相歧异，梁先生则详加考订注释。研究某一历史事件，对有关数字资料进行科学加工，制成统计图表，从数量变化考察其发展趋势，这种方法极为必要。有的事物发展变化比较复杂，具体内容一时不容易掌握，则采用编年纪事法，按时间顺序及地区进行排比，对某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地区间的差异，可一目了然。梁先生所著《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就是采取的这种处理办法。这样，从杂乱无章的记载

中，可以看出条鞭法在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变化，作出比较确切的论述。

梁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之所以能做出卓越贡献，不仅由于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还由于他的坚韧勤奋。这反映于对资料的搜集积累上。他写每一篇文章，几乎要求把所有能找到的参考书都进行查阅，而且对有关资料都亲手摘录。只要有一部比较重要的书籍还没有看到，他决不轻易放过。如对所进行的明代土地赋役制度的研究，于正史、文集、札记和方志有关资料广泛搜集摘录，广征博引，进行比较。又如解放后所写《明代一条鞭法年表》一文，查阅有关文献达一千多种。特别是梁先生在其最后整理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付出了极其艰巨的劳动。此书对由前汉至清末两千多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加

工。全书凡70多万字，主要是图表，计图6个，各类表253个，有的表长达八九页。参考书目数百种，当不下数千卷。每个图表的制作，都经过精心设计和计算。书中所引用数据并非简单罗列，而是对各家记载进行比较，于互相歧异之处加以考订，探微索隐，务求详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一部巨著。这样一部著作，工作之浩繁难以设想，充分表现了梁先生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勤奋的治学态度。

注：此文是《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序言，发表时作了删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凌 峰



“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

景钟 雷泉 一 诞

不同背景的文化接触，不外乎3种结局：1.先进的本土文化消融落后的外来文化，如古希腊罗马文化消融入古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文化；2.落后的本土文化被先进的外来文化消融，如印第安文化被美洲殖民者的拉丁文化所同化；3.双方文化旗鼓相当，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彼此渗透、相互吸收。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及基督教文化的交往属第三种情况。

东汉以后，印度佛教文化在华传播，逐渐适应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特别是建立在“缘起”哲学基础上的宗教学说，与中国的主流文化产生了共鸣。中国主流文化亦因之丰富、发展了自己，禅宗和宋明理学的出现就是显例。到了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向中国传布天主教，同时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如天文历算、数学、物理学、兵器制造及某些科学实验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与科学文化的发展。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保护了传教特权，基督教在中国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但中国亦没有因此而基督教化。基

督教的入华代表着先进的西方工业社会向落后的东方农业社会的挑战。与前两次中外文化交流不同，基督教入华不仅要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李提摩太的“孔子加耶稣”），更要顺应中国本身要求步入近代世界强国之林的趋势。而基督教教会在华兴办所谓教会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要正确认识基督教会在华办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和影响，首先应区分以下3条界线。

（1）区分帝国主义殖民政治与基督教的界限

在中国近代史上，基督教与列强的殖民政治一度紧密联系。殖民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工具，基督教则借助殖民主义势力（比如通过不平等条约）传教。但这两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它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受16、17世纪以来政教分离运动的影响；一是受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冲击。基督教会在华曾力图摆脱“洋教”的色彩，美国传教士代表人物甚至联络一部分传教士向美国政府提议脱离传教条约的保护。①传教士愿意以“超政治”的面目出现，这是中国

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与西方政教分离运动交互作用的结果,应该说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旧中国的基督教界不乏虔诚的基督信徒,其中绝大多数是真诚爱国的,有些人在中国历史的进步中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基督教新教是宗教改革后的产物,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它的传入亦冲击了封建制度及以儒教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基督教的教义本身如主张平等和牺牲精神,在传教过程中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加上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工业科学文化同时传入,使得一部分爱国青年不能不引起深思,燃起富国强兵的思想。

(2) 区分基督教中传教与办教会大学的界限

基督教在华办教会大学的主要动因是传教。但因在华传教活动受阻,促使传教士调整争取下层群众的“向河中洒种”的方法和途径,把传教的主要目标转向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把开办学校作为提高教会形象的手段,以提高传教的质量和功效。这一战略性的调整,客观上适应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改组的现实。传教士本身也认识到,不可能光靠基督教本身来瓦解、取代中国文明,只有在基督教背后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有效地渗入中国社会精神新旧递中的空隙。而这只能通过办教会大学,传播西方文化并培养一大批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来实现。

19世纪末期山理(Charles Alfred Stanley Jro)和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的争论,表明基督教在单纯的传教和传播广义文化的认识差异。前者主张建立多功能的教会大学,以英美高等

学校为模式,传授非宗教性的西方知识,不注重宗教课程。后者则主张建立培养传教人员的神学院。本世纪的教会大学历史表明,山理主张的多功能和世俗化的教会大学乃大势所趋。教会教育的专业化、世俗化和相对独立这一趋势超出了单纯的基督教传教事业的范畴,汇入更大范围的中西文化交流领域,从而成为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和西学输入的媒介。

教会是维护非理性意识的堡垒,大学则是宣扬理性主义的阵地,是传播科学知识的场所。教会大学并没有办成传教士自我封闭的神学阵地,相反,它为基督教本身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开辟了道路。简单地把教会大学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文化租界”、“反动思想的堡垒”,并不妥当。

综观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至少有这样3点:

第一,它冲击了中国旧式教育制度,使旧式的学塾和书院让位于新式的学校。

第二,它带来了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培养通才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素质要求,反映了新兴工业社会的要求。其教学方法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倡导个人独立钻研,主张学术思想自由。

第三,它的学科设置打破了中国封建学塾制度的狭隘性、片面性和神秘性,开设文、理、医、工、农等各科,培养了我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和文化交流骨干,并促成了中国近代新式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和体育教育。

(3) 区分教会大学中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界限

办教会大学的原意当然是通过传播西

方科学文化来传播基督福音，事实上教会大学中也确有不少学生信奉了基督教。但教会大学毕竟不同于神学院，由于贯彻“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本世纪20年代中期，教会大学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后，部分教会大学的宗教课也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1936年甚至公开提出“信仰自由”的原则，他为人书联道：“孔佛耶回，有教无类。亚欧非美，天下一家。”^①

实际上，宗教教育在教会大学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仍以岭南大学为例。本世纪三十年代，这所大学设有医学院、工学院、商学院、神学院、农学院和文理学院六个学院共约三十个系，所开科目逾四百种。而神学院所开科目不过社会训义、基督人格、有神论科学关系等十余门，其余就是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皆适合时代，足应要求”的世俗教育。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政治上，它与殖民主义势力保持着一定距离，组织机构是相对独立的。教会大学虽与基督教教会有关联，带有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任务，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实际上主要传播了西方

文化尤其是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教育思想。

在教会大学背后，屹立着从源远流长的希腊—希伯来文化发展至今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文化与这种文化的交融远远没有达到像与佛教文化那样水乳交融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说，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使之中国化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从历史来看，中国的主体文化不可能被佛教文化或基督教文化同化，但也不可能把佛教与基督教排斥于国门之外。如果说，近代基督教入华是在中国丧权辱国、被动承受的局面下进行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已是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以主动迎战的态度促成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内的中西文化交流。教会大学是基督教理性化和世俗化进程中的产物，它不仅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过去的在华教会大学和今天的国外教会大学理所当然地都是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岭南校友》第13期，第18—19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梁启超是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回国的第一人

张铁宝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其刊刻的书籍大部分被清政府焚毁，有一部分流传到国外，保存在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内。辛亥革命后，随着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兴趣的提高，这些保存在国外的太平天国印书，逐渐引起去海外留学、访问的学者们的重视，相继被转抄、摄照回国。谁是从事这一工作的第一人？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是程演生，他于1924年从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回国。其实不然，据目前已知资料表明，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应是梁启超。

湖北省图书馆珍藏太平天国印书抄本5种，该书一册，抄录次序为：《太平天国天条书》、《太平天国定营条规十要》、《太平天国行营规矩》、《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谕后注有“此诏书系当时旧本之事实”）、《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太平天国礼制》、《太平天国诏书》（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谕后注有“壬子二年奏准新刻颁行之旧本”）。后附《梁任公先生游和国来丁纪略》书跋，跋云：

“梁任公先生由法京乘汽车到和国游观诸胜，税驾于海牙我国公使署焉。迨是月四日偕我国公使唐在复先生诸人，均为和国政府通译官戴闻达先生欢迎邀览来丁大学藏书楼等处。任公先生将该楼中西诸书悉览无遗矣，间有咸丰时太平天国诏书五册，竟为任公先生留意焉，即将该书囑唐在复先生谕寅缮录云尔。

寅窃阅该诏书，一曰礼制，一曰行营条规，一曰天条十款，一曰太平诏书，分为五册，俱载明壬子二年新刻。中有一旧本，系当时刻印颁行之原书，余皆手录。近今吾国所以罕觐是书者，推原其故，系自洪杨既败，满祚延长，是书悉为火化，孰敢藏留以贻祸者哉？即小说中所云亦是扬满抑洪，不足为事实之征证，故以讹传讹，莫

能知太平之事实为何如也。”

由上可知，梁启超1919年8月4日应邀参观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时，发现并囑人抄回5种太平天国印书，其事比程演生1924年从法国抄回太平天国印书要早5年，也比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1937年撰文介绍荷兰莱顿大学所藏太平天国印书早18年（《太平天国史论考》第27页）。而这一点，以往研究梁启超的著述均未提及。同时亦知，荷兰莱顿大学收藏的5种太平天国印书，除《颁行诏书》中《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为原刻本外，其余均为手录抄本。且原抄者并未注明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3篇檄文汇编的书名是《颁行诏书》。《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似附在《太平条规》之后装订成一册，而《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因是原刻本特单独为一册，故书跋未列出《颁行诏书》之书名，并致使传抄者在抄写时，因不明瞭3篇檄文实为一部书，而误将其分开抄录，未能相属连写。

梁启超囑人抄回的5种太平天国印书，经与国内通行的英、法、德等国藏本互校，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5种印书抄本中，均有涂改过的墨迹或书眉批语，说明抄者曾进行过校对，改正或补上抄错或脱漏的字，对明显的错字还在字旁画上问号或在字行上端眉批，可以说基本忠实于原抄本和刻本。据统计，这5种印书抄本中，《天条书》讹22字，脱漏9字（处），衍5字，异同9字；《太平条规》讹6字，脱漏2字；《颁行诏书》讹11字，脱漏16字，衍2字，异同6处；《太平礼制》讹5字，脱漏5字，异同21字；《太平诏书》讹33字，脱漏30字，衍7字，倒置9处，异同14字（处）。

二、荷兰莱顿大学收藏的5种太平天国印书，

“俱载明壬子二年新刻”，且均没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据王庆成同志研究，太平天国实行“诏书总目”和盖“旨准”印制度约在癸好三年（1853年）六月之后夏秋间。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曾看到15种太平天国印书的不同版本，其中就包括荷兰莱顿大学收藏的这5种印书。除《太平条规》为同一版本的2种刻本外，余下4种均有实行“诏书总目”制度前后几种不同版本的印书。（《广西社会科学》1986.1）再从荷兰藏5种印书的内容分析，基本可以确定它们是实行“诏书总目”制度以前的印书。既然如此，那么荷兰莱顿大学收藏的5种太平天国印书，在内容与国内通行的本子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异同，除《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为刻本——极可能是介于

初刻本与修改本之间的另一种版本，或同初刻本版本的又一种刻本外，我们目前还无法断定抄本中的这些异同（包括某些讹误、脱漏、衍文及倒置）究竟是所据原刻本就是如此，还是原抄者或传抄者抄录时改动或无意中造成的。如果属于前者，显然就是有关太平天国印书的又一种版本或同一版本的不同刻本，这将对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印书版本学和探讨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的思想及政策演变提供新资料。

作者单位：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
博物馆

责任编辑：林有能



客方言——“牵阳叛”的语源略释

潘允中

细阅你刊最近几期内容，很有启发。我是一个喜爱搞语言文字的读者，特为撰此文，以就教岭南专家学者。

“客方言”「牵阳叛」的意思是“使人上当”之意。语源是六朝宋代以来俗呼男女轻佻为阳畔，呼物不坚实而外华美为阳畔货。接近人张亮采先

生《中国风俗史》3编1章13节云：“按今江西、湖南俗呼男女轻佻为阳畔，呼物不坚实而外华美为阳畔货。”张氏以为这“俗语即是六朝以来流传至今的。这意见是颇可信的。”（以上引自王运熙著《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凡口铅锌矿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体会

冯秋明 陈先舜 龚天培(执笔)

凡口铅锌矿是我国大型有色金属采选企业之一,铅锌金属产量占全国六分之一,是国内目前最大的铅锌生产矿山。现有职工5400多人,党员1130多人,职工、家属共22000多人,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行政、党团工作、职工家属思想政治工作是大量的。同时,由于远离城镇,企业办社会的问题相当突出,因此企业下属部门和系统,条块繁杂,层次较多。在机构精简后,行政仍有六大部分,共含七个车间分厂,十二个职能处室,五个生产技术独立执行部门,十三个服务部门及二个集体所有制单位。党委系统则分七条战线,下属二十一个直属党总支、支部;四十一个基层党支部。工、团组织也同样设有相应的条块组织。在党政分开前,党委一元化领导包揽一切,以党代政、以党代群,党政领导常被卷入日常事务的旋涡中。一九八七年,在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形势下,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后,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摆在企业面前,凡口矿在这方面迈开了探索步伐,收到良好的效果,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一)

我们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对企业行政来说,主要是全面推行矿长负责制,使矿长处于对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全面负责的中心地位。而对企业党组织来说,则要求党委职能上、领导观念上、领导方式上和领导关系上要实行转变,因此,有相当大的难度。为了实行这一系列转变,凡口矿党政两方面,都从本职能角度,按照党政分开的要求作了较大的努力。作为党委主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党政分开后,党组织不再直接管理行政事务及生产经营方面的工作,是否

意味着党委地位下降了,权力缩小了?党委认为,企业党委与行政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分工不同的工作系统,它们在企业中虽有独立的工作机构、工作职责、内容和工作方法,但都是为发展企业的生产这一中心任务而工作的。因此,党政分开只是职能不同而已,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谁地位高低的问题。党委在矿内层层举办学习班,提高认识。党委书记在全矿生产班长以上干部职工大会上,郑重宣布矿长是矿山的法人代表,是全矿行政和生产经营的领导中心。为矿长树立权威。在实际工作中,党委领导积极支持矿长的工作,积极拥护行政的决定,并主动协助解决企业承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凡属矿长工作的范围权限,党委不干涉包揽。

其次,党政分开后,党委、行政和职能、责权都与过去不同了。党委明确了党政分开后基层党组织的四项工作职能:一是做好保证监督作用;二是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三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四是做好对工会、团委的思想政治领导工作。为了落实好上述职能,党委制订了《矿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党组织八项工作制度》、《矿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党组织信息工作制度》,坚持了书记月度例会、政工月度例会,切实加强自身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党委还通过每月一次的党、政、工、团联席会,参与行政每半月一次的调度会,了解矿里的生产形势,掌握矿行政方面的工作信息,结合书记例会、政工例会进行布置反馈,有针对性地做好党的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党政分开不分“心”,大家都围绕全矿生产经营目标这一中心协调地开展各

项工作；二是党政分开不分家。党政分开后，仍如同左右手一样，紧密配合，共创一流现代化矿山；三是党政分开不旁观，党委对企业行政工作的保证监督，不是挑毛病，找岔子，而是抓发动、抓协调，做到补台不拆台、参预不干预，不以旁观者停留在局外。

再次，企业的改革，不光是行政的事，而是全党的事业。因此，改革中，党委做改革的带头人。近年来，为加快企业内部改革，党委连续主持召开多次党政领导会议，中层领导会议，分析改革的形势，统一认识，宣传和支持多项改革措施的出台，特别在改革方向上，做好把关定向的工作，同时通过抓好党风，做好党内监督工作，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

作为矿长和行政部门在党政分开中，主要做到：

掌权不专权。作为企业中心和法人的矿长，在党政分开后，全面行使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挥权，决策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独断专行，也不等于事事负责。矿长的负责制应当是总体负责，因而，十分注意树立群体意识，发挥好群体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群体，将自己这个中心变为轴心，使全矿各方面工作围绕轴心运转。并通过几个方面形式把党政（工团）力量扭成一个合力。一是与党委共同定期开好党政工团联席会，平衡协调工作，二是坚持向党委定期汇报工作，主动争取党组织的支持，三是定期召开职代会，发挥民主管理作用，激发广大职工的主人翁精神。

正确认识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正确认识与党委的关系。党政分开后，党委与矿长同样对企业兴衰负有责任。但党委主要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落实，它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人，是人的思想。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去动员职工为实现企业中心任务而努力奋斗。行政部门主要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通过组织管理和生产活动，把物与物、人与物指挥好，搭配好，运转好，创造新的物质财富。并主动争取党组织协助支持和监督，保证不脱离党的领导。二是正确处理“双重身份”的关系。矿长既是一矿之长，又是党委成员之一，既对企业生产行政工作全面负责，同时也义不容辞要贯彻执行党委的决议，接受党委交给的任务，主动做好党的工作。因此，在抓好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同时要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三是正确处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不但要完成生产任务，还要建设一支

“四有”队伍。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要同时加强。主动创造条件，振奋政工人员的自信精神，确保各种待遇的平等，同时将政治工作纳入到经济责任制考核中，推进物质文明的建设。在任期目标中，突出了抓党风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使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切实挂起钩来。

（二）

党政分开必须在组织上理顺关系，在机构上作了必要的改革和调整。主要是将原来的机构按行政、党群两条线来划分：行政分为职能处室、生产经营执行单位、生活服务单位、社会性服务机构、集体所有制单位五大部分。其中行政职能处室由原相应的18个处室合并精简为12个处室，减少管理人员22.3%。党委则保留纪委、工会、团委、老干等部门，将原党委组织、宣传、党办、信访四个部室合并为党委工作部，人员由16人减为10人。与此同时，将原党委的人事干部管理、中层干部任免、机构设置等权划回行政。纪委不再处理政纪、法纪，由行政设立监察部门。

针对生产经营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各级党组织机构人员。为便于工作党委设置了一名副矿长兼党委副书记。基层则有多种类型的组织领导方式：即设专职党组织书记，或只设专职党的副书记，或党政一人兼，或行政副职兼党的书记，或行政副职兼副书记，党政兼职再设立专职副书记。

党委逐步摆脱处理行政事务的各种日常活动，集中精力抓自身建设。如不再参与各行政工作的领导小组；不再干预行政日常的各种会议，不再批示涉及行政日常的经营活动的报告等。同时，我们重新修订了党务工作八项工作制度，在新形势下，按党政分开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对党组织的科学管理，加强党务工作的基础工作，形成党务工作新的网络。

（三）

实行党政分开的初步实践，效果是良好的。首先，是企业在内部运行机制上走上了科学的良性循环，党、政两大系统都从各自不同的职能上较大地发挥了对企业的领导作用。其次，提高了企业的效益，近几年来，凡口矿连年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3.06%，1987年达1亿4千8百多万元；铅锌金属产量年均增长12.95%，1987年年产达11.2万吨，实现利润年增29%，1987年达9072万元；全员货币生产率年增长12.61%，达26912元/人年。

1988年，凡口矿跨入国家二级企业行列，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文明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预计1990年，凡口矿年工业总产值将达到2.2亿元，实现利润超1亿元。一个技术一流、装备一流、管理一流、环境一流、效益一流的现代化矿山将在粤北出现。

实行党政分开，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一是目前我们仍是企业办社会，还权于政之后，行政部门增加了大量工作，原来由党委管的事都还给矿长管。如公安问题、民事调解问题、老干管理问题、退休职工管理问题等。但目前企业的生产经营工作相当繁重，杂事太多，势必干扰矿长抓生产。为使矿长有更充足的时间精力来抓企业经济活动，我们认为，党委仍然要主动分担一些，但这样是否意味着还权于政的工作不够彻底，以党代政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党政分开后，矿长要全面负责两个文明

建设，也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责。行政应从哪些方面入手，采取何种方式和方法，与党委工作如何协调同步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呢。财力上、人力上、机构层次上又如何来妥善安排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如何来形成。如果不协调，各搞一套，就会出现重迭机构，多头指挥和重复工作，于深化改革不利。这也是有所探讨的一个问题。三是企业内部工作往往情况复杂，因素多变，常常涉及到党政都管的一些工作。怎样处理好这一关系，分清职责，各司其职，以免在职工思想认识中引起混乱，或造成部门推诿扯皮的现象，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最好在基层任职上党政不要分开。

作者单位：凡口铅锌矿
责任编辑：张硕城



广东省青年书法理论研究会成立

广东省青年书法理论研究会，于1988年10月8日至9日在广东省阳江市召开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广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潘佛章、理事张桂光等，以及由全省各地云集阳江的研究会的会员，此外还有阳江市委、市政府的各界代表。

广东省青年书法理论研究会由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团体会员，将联合全省有志于书法篆刻理论研究的青年朋友，通过探讨书法艺术，交流研究心得，为繁荣全省的书法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王世国)

韶关毛巾厂的外向型发展经验

郑 净

企业的外向型转轨是区域经济外向型转动的主体。微观考察企业的外向型转换及其过程，无论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推动，还是体制改革或运行机制的调节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最近，我们在广东省纺织工业品出口基地之一的广东韶关毛巾厂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该厂的一些做法可供借鉴。

一、群体的分流重组与协调管理

韶关毛巾厂创办于1965年，传统的产品生产型体制下，封闭式的小经济思想，严重地束缚着企业的发展。真正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的企业运行方式是在1984年。这年创汇33.4万美元，同时亏损了近40多万元。而1986年，时间仅间隔2年，迅即扭亏为盈，成为创汇119.7万美元的外向型企业。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组织管理方式的变革。1986年初，厂长换届，摆在新的厂长、班子面前的首先是上千职工（含临工），他们吃惯了“大锅饭”，惰性大，而知识素质不高，更主要的是管理上的混乱落后，劳动组织不通畅，人的积极性与素质得不到提高。这种状态无疑是企业外向型发展的最大障碍。为此，企业外向型转换首先是企业人群管理方式的转换。理顺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次，从基层管理方面

抓起，立足于建立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群体组织管理体制。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①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②设立厂管理委员会。③试行中层干部聘任制。④改革管理建制，实行直线制管理。⑤员工的定额管理与质量管理相结合。⑥着重于人的智力素质的提高，定期对工段长、班组长进行系统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管理水平。⑦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企业内群体关系的理顺，干部职工的分流重组，明确的职责，及其配套的管理制度，使企业内部的群体形成一种既互相推动又互相制衡的机制关系，这大大地提高了厂的群体合力和劳动生产率。1987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739元，构成了企业外向型发展的主体。

二、建造适合国内外两个市场需要的产品多层次结构，是企业外向型转轨与发展的基础

外向型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品的主要部分出口，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不断的对外交换中发展自身。旧的产品计划生产模式实际上是不适合市场需要的无计划经济，是一种放大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型体系，排斥商品的国际交换，与此相适应

的是长期维系着的僵化单一的产品结构。企业的产品要大量出口，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使产品适合国际市场的需要，彻底改造旧的产品结构。另一方面，企业从内向型经营转向外向型经营有个过程，同时企业产品的100%都出口也是不可能的，立足于巨大容量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上长期的供给缺口和内外销差价紧紧地拉动着企业外向型发展过程中的部分内向性。况且，企业外向型发展并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内向部分。因而企业的外向型发展，其产品结构不但要适合国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要有适应国内市场需求变化的特征。否则，外向型企业会失去国际市场的接纳和国内市场的原材料与产品结构关联的基础。

毛巾是一种日用轻纺工业品，产品需求大的同时，存在着较大的供给弹性与替代系数，市场供需的种类多样，更新换代周期短，要使毛巾产品跟上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市场需要，实现国际市场的应有占有率，必须有一个灵敏的“市场触角”和反应迅速的产品结构变动机制，不断有新品种新花样推向市场。为此韶关毛巾厂在产品结构方面着重抓好两个市场的需求反应工作：(1)高度重视国内外毛巾商品市场的信息导向工作，掌握毛巾系列产品的市场动向。(2)产供销密切配合，产品结构 with 供销经营、工艺技术改造、新产品设计相配套，抓准有利时机，及时变换生产品种，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3)主动走向国际市场，接收来样加工的产品开发，多种形式地开发新品种，创名优产品为拳头，打向国际市场。仅1987年就设计、生产出35个新品种(包

括来样加工19个)、73个新花色。其中提花沙发巾获省轻纺工业“四新”产品二等奖，大提花阻燃装饰布获省轻纺工业“四新”产品一等奖；3457印花面巾在省行业质量评比中获优良产品称号，207彩条面巾和5506提花毛巾被获市优质产品称号，青松牌206彩条毛巾获88年纺织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4)提高产品质量与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国内外市场上产品的竞争，除了产品的款式和价格的竞争外，更有产品质量的竞争。为了保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他们健全质量机构，严格质量管理考核制度。各生产车间分别成立TQC小组，指定干部分管质量工作；车间各工段配备抓质量的工段长，班组设有专职的质量检验员，从上到下严格质量管理制度。厂部定期对车间进行质量抽查和定期召开质量分析会，车间设置不合格产品样本和劣质产品展览栏。同时分配上实行个人工资收入、奖惩与产品质量挂钩的办法。从管理上、员工心理上、分配上形成配套的提高产品质量机制，多方位地监督和约束，使每个员工都自觉地提高产品质量，坚持质量否决制。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不合格产品不出厂。

三、加速技术设备更新改造，增加新技术的投入，是企业外向型发展的必要条件

国际市场上产品的倾销，新产品层出不穷、竞争激烈，竞争的实际是现代科技的竞争。设备更新缓慢，新技术投入不足，势必拉动劳动生产率的国际市场上相对降低和产品换代的滞后，产品更新周期伸长又必然引发产品国际成本价格上升和

市场的萎缩效应，从而不利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外向型企业的发展。为此，韶关毛巾厂在注重搞好外引内联，积极开展经济技术的横向联营的同时，着力多渠道筹集资金，加速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增强对新技术的投入。仅1987年就通过国家经委、国家纺织工业部取得出口产品专项技改贷款270万元和市工商行、中行贷款及港商补偿贸易的投资，共350万元人民币，100万美元外汇，组织技术设备的第一期更新改造和新技术投入。建造了一栋2470平方米的新成品车间和180平方米的配电房；配置了毛巾前后处理联合机、印花机、高温高压低温低压染色机、烘燥机、锅炉等一系列新技术设备；从国外引进了具有80年代技术水平的分条整经机和割绒机；通过与港商补偿贸易方式进口了4台喷气织布机。新设备与新技术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仅新印花机投产，就比原来提高了一倍的生产效率，印花质量亦较前大有进步，印花产量与质量上升，又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以上三者的大配套，使韶关毛巾厂的经济技术水平迅速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创造了企业的较大经济效益，而且为国家的税利收入和创汇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产值，1987年达670.28万元，比1986年增长了15.5%，今年1—10月又升至658.21万元，比1987年同期增长了21%；上交税利，1987年为67.8万元，比1986年增长了8.8%，今年1—10月达82.7万元，比

1987年同期的58.33万元增长了41.8%；出口创汇，1987年为90.9万美元，比1984年增长了172%，今年1—10月已达127.28万美元，已大大超过了1987年的全年总额。

广东省韶关毛巾厂的外向型转变的实践表明，企业内员工群体的分流重组与协调管理，建造适合于国内外两个市场需要的多层次的产品结构，引进新技术设备内涵扩大地投入的机制，是企业外向型转变与发展的“连环套”。企业外向型转轨与发展的根本是人的外向型意识及其群体的分流重组与管理，劳动组织流畅，同心协力。首先要有外向型的人群才有企业的外向型转轨与发展。在群体的合力作用下，变革维系了几十年的封闭式的僵化单调的产品结构，形成多元的系列与多种的层次相结合的新型产品结构，适应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与优胜劣汰规律推动下，以国际市场为参照系，改革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不断更新改造技术设备和增加新科技的投入，改造和提高劳动者的智力素质及其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企业营运机制，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互相推动，互为机制关系，创造联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外向型企业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
学会联合会

责任编辑：石英

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向

罗 克 明

1. 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加深，美国相对衰落，日本正在崛起。

日本在一九八六年超过西德之后，追赶美国的战略取得重大成功，成为可以同美国抗衡争霸的超级经济大国：(1) 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中的比重从五十年代的2%提高到一九七八年的10%，到一九八六年又提高到15%。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中的比重，却从五十年代的40%下降到八十年代初期的22%，日本人均产值1.96万美元，超过美国(1.84万元)。(2) 一九八五年日本在海外净资产1298亿美元，第一次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而美国一九八五年净负债额107亿美元，从一九一九年以来第一次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里根政府在短短几年之内，消耗了70年来积累起来的国外资产(一九八二年美国在海外净资产为1362亿美元)。(3) 去年美国外贸逆差1700亿美元，其中510亿美元是对日本的逆差，占近三分之一。(4) 日元对美元汇价大幅度升值，在各国外汇储备中比重增加，美元比重下降。日元正以帮助美元的姿态成为另一种主要国际货币。目前世界十家大银行中，全部为日本所占。一九八六年日本购买了6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美国财政赤字三分

之一要从日本筹集。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东京已成为对外贷款最大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伦敦、东京、纽约)。

(5) 在科技上，日本虽然在基础理论研究与高技术领域上还不如美国，但在应用科技成果上超过美国。在工业高科技方面，除宇宙航天、生物工程、核聚变以及一些高信息技术还落后于美国外，其他已大致同美国相当甚至稍为超过美国。

美国之所以相对落后于日本，同它在战后所执行的政策有关。(1) 技术无保留地向日本转让，新的技术设备迅速流向日本，使日本的设备比美国本土的设备先进五到十年。加上日本人的才能和干劲，将搞来的工业技术加以消化，进行小改小革，着眼于商业使用上，从国际市场竞争角度搞产品商品化，是日本能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产品研制到商品化，日本平均为三年半，美国为七年半)。(2) 美国是消费型的国家，美国进口的皮鞋竟占市场销售量63%，电视机占66%。靠借债过日子，借来的钱又主要用于购买外国货，投资工业只占百分之二十，而且主要是投资于军事工业(特别是宇宙航天工业)。美国热衷于军备竞赛，做世界保护伞，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研制武器。因

此民用投资不足，传统工业衰落，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日本研制一辆汽车只要80—100小时，年修1.1次；而美国却要150—160小时，年修3.5次。美国的工业产品竞争能力弱，这是形成大量外贸赤字的根本原因。(3) 搞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歧视，抑制了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出口，失去了一部分市场。

2. 经济发展进一步国际化。

美元汇率动荡，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加剧，新科技的发展，促使海外投资急剧增加。而投资的需要又促使企业谋求伙伴进行联合投资，以对抗保护主义，减少风险，相互利用对方的资源、技术以弥补自己的弱点，避免技术上的重复研究开发。于是个别厂商之间的竞争逐步为跨国的群体厂商的竞争所代替，从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向地区之间的联合竞争，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趋势。

欧洲共同体十二国从明年起允许成员之间自由采购，6600亿美元的市场完全自由化。计划在1992年建成资本、人员、劳务、商品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以刺激共同体内部需求的发展，对抗日、美的保护主义。

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区。计划从1989年起，十年内逐步取消双方的贸易关税，建立一个北美统一市场。

非洲北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利比亚、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等五国计划实现马格里布一体化。

亚太地区、加勒比地区、拉丁美洲亦分别酝酿成立地区性的一体化组织。

美日准备联合投资5000亿美元，在20年内搞15项世界性工程，这是企图联合称

霸，控制世界的一个重大步骤。

至于企业之间为了竞争需要而相互联合、兼并、收购，同竞争对手相互合作、合并，在海外投资设厂则已成为一股热潮。在调配零件、研究开发和销售等方面开展了超越国境的企业活动（所谓全球规模企业战略）。出现了一批“候鸟企业”到成本最低的地方去生产，到价格最好的市场去销售。如日本的丰田、三菱汽车工业公司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合办汽车生产企业，向当地输入技术，利用当地劳务、零配件，已制成汽车向外地出口并返销日本。现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少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品，所谓“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方向转变。

生产的进一步国际化，促进了贸易的国际化。在四千多亿美元容量的美国市场中，充斥着日本商品1000亿美元，亚洲“四小龙”商品500多亿美元，西德商品300亿美元。西德商品900多亿美元充斥西欧共同市场。为了避开关税，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在海外设厂，采取迂回出口的战略。各国之间竞相扩大出口，挤占别国市场。日本同美国、西欧；美国同“四小”、西德的贸易摩擦加剧。

金融国际化。以伦敦、东京、纽约为中心，庞大的国际资金市场相互买卖股票、债券、期货、外汇，进行巨额资金的信贷。全球的金融交易为商品交易的四十倍。美国既是最大的贷出国（八五年底政府和民间债权余额九千多亿美元），又是最大的债务国。

在激烈竞争中相互依存。美国五年多的经济增长，依靠大量财政赤字和外贸入

超。依赖日本、西欧的支持，同时也推动了日本、西欧经济的增长，但美国赤字严重，债台高筑，又拖累了西欧和日本。据估计，如果美国消灭了一千多亿美元的外贸赤字，全世界将有四千万人失业。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严重问题，很快就涉及到其他国家。各国之间围绕贸易、汇率、利率等问题的经济协调和局部的暂时的妥协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在国际间进行调节，延缓危机发生的重要手段。

3. 新技术革命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竞争十分激烈。

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发展科技，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制定发展的战略（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革新基础研究计划），建立高技术发展基地（美国加州的“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与健全科研体制。争夺科技优势主要在美、日、西德，还有苏联之间开展。特别是日本，把它定为赶超美国战略目标之一。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光子技术，基因工程，超导材料等高科技领域正蕴酿着重要的突破。科学家们预计，当代六大高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以及海洋开发技术将在21世纪中加速发展，并将通过广泛的实用和商品化，形成强大的高技术产业。并将推动传统工业的改造，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新技术革命能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使它避免危机？从目前来看：（1）新技术革命主要是取代劳动的作用大于制造工作岗位的作用。机器人代替了人的某些工作，但还没有为人创造新的工作。因此相当时期内实行新技术，必然增加一批人失业。

（2）新技术实施后，很多中层管理人员被淘汰，剩下少数高工资人员和大量低工资人员，这就削弱了社会购买力。（3）新技术工业部门的产品，相当时间内在各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只能占一小部分（据美国估计，到一九九三年，顶多能占全部产值的40%）。短期内抵消不了传统工业停滞的趋势。因此，从目前来看，它不能把资本主义从停滞中解救出来。从长远看，它不能避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带来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利润下降的情况（甚至会更严重）。新技术革命是要发展的，但它不可能使资本主义避免危机。

4. 国际货币金融非常不稳。

现在已形成美元、日元、西德马克、英镑、法郎等多极的国际货币体制，流动资金非常多，约有三万亿美元的货币（其中美元占40—50%）。在市场上，每天有上千亿美元资金在冲击着各种货币，进行各种投机赌注（外汇、股票、债券、期货、黄金等），利用电子仪器、电话等先进信息传递工具进行投机，因此，一有风吹草动，股市汇率就呈现动荡。加上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欠债额高达1.2万亿美元（其中拉美占40%，亚洲占25%，非洲占20%），每年需还本息1400亿元，占这些国家出口额27%。这些债务的欠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集中在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占其资本额百分之八十。如果债务危机一旦发生，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风暴就会迅速波及全球。发展中国家欠美国银行的债，美国银行又欠全世界银行的债，导致美国金融体系很脆弱，美国银行一垮，波及其他国家的银行。这种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如不能及时调整补救，势必导致全球性的经

济危机。

5. 周期性的因素又重新起作用,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新一轮经济危机日益迫近。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缩短,美国经济从一九八二年底复苏以后就转入低增长,虽然至今延续六十七个月,时间之长,打破了战后的记录,但实际意义不大。因为1980年以来各主要工业国家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7%,估计整个80年代可达到25%,大大低于70年代的32%,60年代的45%,50年代的38%。美国经过一九八三、八四年较快的增长(两年增长10%),美国经济的“小繁荣”局面是靠过渡的消费来维持。从一九八五起,消费者的开支已经不能再支持美国的经济以同样的速度上升了。美国的出口贸易不振,财政赤字庞大,美元大幅度贬值;黑色星期一股票大波动,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投资将更为谨慎。说明美国经济发展又要到一个新周期。美国经济危机一爆发,势必波及到日本、西德等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现代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自我调节能力加强。现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适当紧缩财政、信贷,提高利率同适当放宽信贷、降低利率、减少税收结合,交替、渗透使用的政策,着力对经济不断进行调整。不过分强调产值和速度,而注意提高效益和竞争能力,其发展战略是:低速增长、尽量避免波动、力求延缓危机爆发的时间,减轻可能发生的危机的程度。除了根据市场竞争和发展新技术的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增强国际之间的协调以外,在政策上,围绕着发展速度、失业率、通胀率,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利率、

汇率、信贷)进行调整。

通胀率低时(3—4%以下)适当降低利率、汇率,放宽信贷,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发展,减少失业。

通胀率高时(或有高的趋势),适当提高利率、汇率、紧缩信贷和开支。尽量做到保持一定速度又不助长通胀。或者宁可速度放慢一些,或失业率高一些,也要防止通胀,以避免衰退。

金融不稳,股票狂跌,债务危机发生时,则降低利率、放松信贷,宁可通胀率高一些,也要避免金融市场大动荡,股市崩溃,发生经济危机。

外贸出口情况不好,逆差过大时,用货币贬值,降低货币汇率,或采取关税、配额等措施,实行贸易保护。

从以上这些经济动态分析,可以预见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

1. 日美激烈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美国日益衰落,日本逐渐兴起,取而代之的趋势正在发展。长期以来,由美国经济支撑的国际经济结构正在解体,而进入由日本、西欧与美国合作来支撑世界经济的时代。

2. 经济发展进一步国际化、多极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固有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新兴科技和生产的发展,促使原来一个国家之内的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发展成为国际之间更大的垄断集团的竞争。各主要工业国在激烈竞争中(特别是日美、美和西德、日本与西欧之间)相互依存,美国地位在衰落,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左右局势的发展。为了阻止衰退发生,将不断进行局部、短期的协调、妥

协。

3. 新一轮技术革命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可能有新的突破,它必将大大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地避免经济危机发生。

4. 金融货币体制不稳,发生去年十月十九日股市、金融风暴的因素未根本消除,估计今后还要不同程度的多次发生。但近期内还不会发生崩溃性的危机,因条件与

一九二九年的十月不尽相同。

5. 周期性因素重新起作用,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美国在里根政府以后的新总统上台,势必要改变刺激过度消费的经济结构和政策。届时美国很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作者单位: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责任编辑: 黄振荣



文天祥佚文

官桂铨

1987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熊飞等校点的《文天祥全集》是迄今收集文天祥诗文最为完备的一部书,但尚有遗漏。

最近,我看到《河南方氏族谱》(民国三十四年1945福州德兴印务局石印本)收有1篇文天祥《题方氏历代像跋》:“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能并以传者,必先人之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斯世,乃能留其像与。凡慕容虽盛不久者,皆以无谱之故也。方氏族像灿然,可传千百世而不朽。子孙瞻先人之像,阅先人之谱,而不兴起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德祐二年陬月之吉,吉州文山文天祥书。”这篇《像跋》不见于新版《文天祥全集》,为新发现的一篇佚文。

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方世琮由南京流水卫偕闽王王审知来闽,“闽之有方氏自此始”。明嘉靖、万历间方振、方俊等人迁居福州北门外新店厦坊村,繁衍至今。确切地说,上面这部方氏族谱应称为《福州厦坊方氏族谱》,文天祥《像跋》下注“编者录”,究竟抄自何书,不得而知。

德祐二年(1276)陬月(正月),“文天祥任知临安府,不拜。以轻兵赴阙,始从初议,以益王赵昀判福州,广王赵昺判泉州,以图兴复。十九日,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见熊飞《文天祥年谱辑略》)二十日,文天祥至北营被拘留。可见,这篇《像跋》写于正月十九日之前。



论腐败

舒展

“腐蚀”同“腐败”所含的深意是大不一样的。四十年来，我们常说的是谨防被糖衣炮弹击中，要拒腐蚀，永不沾。就是说，你来腐蚀我，我对你取预防抗拒态度。而腐败呢，不是客体对我如何，而是主体本身，内囊出了毛病。也就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所云：“安富尊荣者多，运畴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敢于承认腐败，是健壮自信的表现。三年前，一九八五年底，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了一个清除一切腐败现象的通知，指责争购和更换进口小轿车、滥派出国人员、公费旅游、请客送礼、干部不正当收入、以权经商，共六个严重问题。自此，腐败二字在报刊上出现的频率增多了。

但是请注意，决不能用荣国府来比喻如今存在的腐败现象，本质和数量，均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若不郑重说明清楚，“言论摘编”者所掌握的“达摩克里斯剑”就

会不费劲儿地落下，要你的命。因此，谈论有关腐败问题，宁说少，别说多；宁说下，别为上；宁内部通报，勿向外张扬；宁痛打死整指摘腐败者，而对于干腐败者的揭露，必须慎之又慎。历史如扭秧歌，进三步退一步；道路如盘山蛇，绕几圈又绕回来。三年前严厉禁止的以权经商，到底是制止了呢，收敛了呢，还是更大规模、更具有创造性地恶性膨胀了呢？

按惯例对杂文的字数要求是一个“短”字，然而维护腐败的师爷们对杂文引用的数据、立论的观点，又要求一个“全”字。就是说，必须在千字文中做到如同政府工作报告那么样“成绩、问题、今后”，毫无片面性。巴金在反右派运动前夕，曾就千字杂文难免片面性问题向毛泽东主席请教。毛泽东的回答也很全面：一是片面性往往难免，有些片面也不是不得了，否则就阻碍批评的发展；二是鲁迅后期的和列宁的部分杂文也没有片面性。鲁迅、列宁，我等恐怕永难企及其项背也。数字是定量分析的根据，比如：你知道豪华轿车与小学危楼的全国数字吗？你知道“官倒爷”比一九八五年肯定更多更狠毒吗？你凭什么说滥派出国人员的现象还没有克服呢？

哑口无言，瞠目结舌！

按高标准严要求，不修炼到列宁、鲁迅的程度，不在国家统计局出任要职，写杂文不挨批？休想！

为防“达摩克里斯剑”的突然落下，鄙人还得不厌其烦地再次郑重声明：本文凡谈到腐败现象及其分子时，前面一律须加上“个别的”、“极少数的”数量限制词。皇

天在上，读者作证，笔者决不敢再犯三十一年前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大罪也。

中国大陆上出现的腐败现象，就象今年发了病的太阳一样，大黑子群和耀斑空前活跃，它甚至可以影响指南针的磁性，出现方向性的颤抖，使飞机和海轮受到威胁，心血管病人症状加剧，交通事故增多。太阳犯神经病要痊愈，一二年不行，得四五年。腐败幽灵象黑子和耀斑笼罩在中国人头上，时显时现，昼夜纠缠；加上人多、拥挤、贫穷、落后象地上的温室效应。上烤下蒸，煎熬着正在初级阶段起步走的中华民族。

正视腐败，不等于认识腐败。正如说就诊的患者“有病”，这不须大夫说。高明的大夫在于分析、确诊、下药。好在中国大陆理论界不乏有识之士，会作出高明的诊断。杂文者，小小银针而已，操在鄙人笨手之中，难免扎错穴位，甚至误诊。

愚意以为，人的衰老并非腐败。健壮的机体也难免发生部分腐败甚至坏死，这也是正常的。腐败之成为综合性并发症，在于它扼杀生机，视健康力量为寇仇，自己既失去造血功能，又失去对主体动作和客观情势的控制，体内的生物钟分寸已乱，眼中的指南针发出颤抖。其主要表现为：硬腐，干腐，海绵腐和粥糜腐四种特征。

一曰硬腐——

硬腐者，腐败的野蛮性和虚弱性相结合之产物也。凡出头鸟，一律枪打。一定时期，收拾一批。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头换面，然后设下“言论摘编”之纲，对理论探索者凡碰纲触纲者，即进行苛妄巧诋，

陷入于罪。无理可讲，不准申辩；禁止公开争鸣，只许特权起哄。真要对出头鸟执行枪决时，除个别迫害妄想狂症患者举枪射击外，其余起哄者又都怕受子孙唾骂，扔下猎枪逃之夭夭。

二曰干腐——

干腐者，腐败的顽固性和市侩性相结合之产物也。接过一切赢得人心的口号，为我所用，为我所化。你提承包招标，我把标底泄露给亲信。你提民主选举，我搞画圈走过场。你提人事制度引入竞争机制、搞公开化，我把政治标准、德字搞得玄而又玄，使公子世袭成为政治势力搞权力再分配的平衡机制，搞半透明的人事朦胧化。你说要爱护人才，我把四十年一贯坚持“左倾”毫无悔改之意的“左得利”们全部当宝贝搜罗起来，储备力量，以便“不是运动胜似运动”时的急需。昨天骂别人是性文学的鼓吹者、写作者，今天以官阶身份开公司作买卖，公然声称“除了妓院，什么都可以干！”

三曰海绵腐——

海绵腐者，腐败的传染性和免疫性相结合之产物也。见水就吸，有养料就喝的饕餮巨兽，比资本剥削凶恶十倍。不需要什么生产资料，租用豪华宾馆的几个套间即可；不用出入货场，只须倒卖批条、证明信，便有人争先恐后将外汇、美元和人民币送上门来。把有权即有钱的变幻过程，迅速变化轮转，甚至可以使痛骂权力剥削、特权经商的人只要条件具备，迅速加入吸血鬼式的海绵集团。一旦风声紧急，撤点收摊，成了神出鬼没的飞行军；一旦打到头上，琅琅入狱，没事，他有免疫性，财产转移，水份释放。有权即有

理，权比法大，一个电话，乖乖放人。风声缓和，总结经验，卷土重来，海绵更加膨胀。学会攀龙附凤，便能富贵荣华。

四曰粥糜腐——

粥糜腐者，腐败的伪善性和合法性相结合之产物也。将美丑、真伪、善恶、是非搅成一锅粥。你若投鼠，我喊忌器。你要戳穿伪面脓疮，我说那会伤害肌体脏腑。你说不能在封建特权和民主政治之间、在“极左受惠”与实事求是之间搞什么平衡，我说保护特权和极左是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需要。你说要鼓励理论界探索，我说：“你比党还高明吗？”你说党也要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我说“你有可疑行动，必须对你进行监视、监听，不准你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作品，什么时候我认为你不可疑了，才能取消专政的措施。”然而，有些特殊的犯罪分子却可以逍遥法外，受到特殊保护。倘若法官坚持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否则宁愿以身殉职；那么，“好，我不等你殉职，先撤你的职，把你调开！叫你无职可殉！”一个政权，只要看看它对“出头鸟”是保护还是枪打，对衙内纨绔是保护还是整治，从而判断它

的健康与腐败，不是再明白也不过的吗？

不幸中之万幸者，人民中的健康力量，拥护实事求是路线的有识之士，并未向腐败力量低头，虽屡战屡败，然亦屡战屡胜，这就说明，国之根本并未腐败。

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微妙的母性之门，是天地的根源（据张松如教授释义）。祖国母亲的生机将会连绵不绝，她的优秀子女觉醒的力量，汇入现代化建设的大潮，太阳黑子群、耀斑也好，地球上的温室效应也好，高级起哄也好，曲折回潮也好，都无法阻挡现代化时代的大潮汹涌澎湃。

让沾沾自喜的腐败的维护者们得意去吧——

“不知腐鼠成滋味，
猜意鸱鸢竟未休。”

封建极左的鸱鸟们，正在将利禄的腐鼠嚼得津津有味。请看看胡风先生的历史评价吧，再看看勃列日涅夫女婿的下场吧。“左得利”们怎么懂得雏凤吃竹实饮甘泉的高洁境界。显赫一时，一时而已！

中国人有藐视腐败的气魄！

中国人更有战胜腐败的力量！



杀鸡吓不住猴儿

老 烈

8月5日广州日报头版消息,《市审计局查获一批倒卖化肥案》,说从化县农业局农场股倒卖化肥得款一万五千元,开支招待费两千元,上缴农业局四千元,奖金分配四千元。这个股只有两个人,每人分了一千八百五。还剩下五千元,以私人名义存入银行。粮食股倒卖化肥得款三千九百元,上缴县农业局两千七,余下的一千二百元作奖金分掉了。……广州日报要求严惩“官倒”,保护农民利益。

这条消息写得好,不但讲清了为“官”的怎么“倒”,还落实了“倒”来的钱哪里去了。读来令人心打颤,怒火中烧。

照我看,这批“官倒”往高里抬也不过是“中官倒”,或者竟是“小官倒”,比起藏在暗中窃笑“嘻嘻,他们倒霉了”的“大官倒”来,小巫而已。但,只这几只“米老鼠”,就把化肥价格哄起了一倍多,说他们“玩农”,未免太客气,他们在“害农”、“杀农”,就是说他们破坏经济改革也不为过,我们反对过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叫做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它还得有点资本,这班东西做的是无本生意,只凭官和权,倒卖那三寸纸条,便大发横财,它的盘剥要比官僚资本严重

厉害得多,不是利润,而是脏款。

这样说不是混淆了两类矛盾吗?有谁愿意,请把他们“保”起来罢,这样的“公仆”实在难得。应当用农民的血汗把他们喂得更肥,连同那个腐败透顶、坐地分脏的农业局,都当作“样板”供起来,以免断了香火。

一阵清风消不了暑气,杀鸡吓不住猴儿。希望审计局拿出点“三敢五不怕”的精神来,把那些“大官倒”、“老官倒”、“钢铁老虎”、“水泥老虎”、“汽车老虎”凡是吃人的老虎都“审”出来,不管它是中央省市、部委厅局;不管它是“公司”、“中心”还是“办事处”;不管他官儿多大、资格多老、级别多高、后台多硬,只要弄权枉法发“改革财”便把它揪到台前亮相。倘不如此,还是杀鸡吓猴老一套;“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岂有此理?何以服众?安得四化?

或曰,此种“倒卖”都是在国营经销部门之间进行的,上级又允许他们异地采购、高进高出,未必就是非法。先生之言谬矣。来路是“上级”批的,去路呢?装进了自己的荷包。它的去路的违法否定了它的来路的“合法”。不折不扣,这叫作变相

贪污，而且是弄权枉法以贪污，应该罪加一等。国营云云，天大的讽刺。牌子虽然堂皇地挂着，骨子里早已换了主人，该叫它赵家老店、钱记洋行。若说“之间进行的”，请问最后落到了谁的头上，还不是农民出血、国家遭殃！

龙年8月5日深夜

篇末附言：这篇短文，不足千字，本

是老生常谈，等于啥也没说，不过有几句激愤之词而已。然而，却也因为“种种原因”，两个多月未得出笼。真是“无可奉告”。面对“害人虫”，连这一点点激愤之情都没有，那“德行”也真可谓“炉火纯青”达到“世外神仙”的境界了。但激愤又如何？且拭目以待。

1988年10月14日



《易·讼》九二爻辞解

黔 容

《易·讼》九二爻辞是：“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王弼的《周易注》和朱熹的《周易本义》都是这样的标点法。前两句好理解，就是说，争讼遭到失败，“归而逋”实际就是“逋而归”，意思是逃了回来。和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就不好处理了，难以表明其间有什么关系。《周易注》说：“若能以惧，归窜其邑，乃可以免灾。邑过三百，非为窜也，窜而据强，灾未免也。”《周易本义》据以推衍为：“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处卑约，以免灾患。”这样说，“邑人三百户”，便表现为处于卑下的意思。这是牵强附会。何以三百户为小邑，过此便是大邑？又何以窜于小邑就可免灾，窜于大邑就不成？原因何在，恐怕是难以说清楚的。清人陈梦雷《周易浅述》推出苏轼《易传》把“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为一句的读法，这样，逋逃者便不是争讼失败的回归者，而是三百户邑人了。郭沫若采此说并为解释说：“邑人也是当时支配阶级的所有物（奴隶），所以在支配者出去争讼，失败了回来，便逃走了三百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他所主编的《中国史稿》同）不过，这样处理也有问题，因为它还牵连着一个“无眚”。“无眚”是说没有灾害，跑掉三百家奴隶，损失惨重，大为倒运，怎么能说没有灾害？所以也不合适。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对“户”字没做正确的理解。按家之称做“户”，最早出现也只能在战国时期。孔子有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这样的话，还没有把家称户。《周易》的卦、爻辞当成于春秋之前，所以是不会以“户”来代表家的。其正常的解释，依照《说文》：“户，护也。半门为户。”这是个名词，在使用上，有时变为名动词，意思就成为纳入户中，或者说，关起来或保护起来。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屈荡户之曰”（依《石经》），就是这种用法。《讼》的九二爻辞应该这样标点：“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户”是“户之”的简略。爻辞的全意是：（某人或某些人）与人争讼失败了，逃了回来，他（他们）的邑人三百人，把他（他们）藏了起来。没有灾害。意思是明确的。



治官倒良方

杨浩泉

一

前一段，社会各方都在议论“倒爷”，一时间，“倒爷”满天飞，成了过街老鼠。其实，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既然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倒买倒卖，只要不违法乱纪，不违反政策，这种活动也是流通的一种渠道。但是，如果加一个“官”字，叫做“官倒爷”，或简称“官倒”，虽然只是一字之差，那就大不相同了！不是吗，当官的倒买倒卖起来，可不同寻常百姓，他们不倒则已，一倒便可投机垄断，兴风作浪，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牟取暴利，无本生财。这种官倒活动，破坏生产，祸国殃民，其为害就在一个官字。

二

有人对官字作了文字上的考证，说官的本义，古与公通，故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袭”，官可释为公或共的意思。可后来七转八转，官与私结下不解之缘。凡是官字出头的就不会有好事：“官老爷”总是骑在治下子民的头上，“官场”总是黑暗重重，“官势”常教小民有理难辩，“官商”利用权势，侵吞盘剥，无所不为……以及诸如“官本位”、“官”意识、“官僚气习”等等，都不是好

东西。看电影，就常有这样的镜头：老红军或老八路战士，来到新解放区，为老百姓做好事，老百姓感恩戴德，左一个“长官”右一个“官长”，逼得我们的战士不得不赶紧发表声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兴叫“长官”，就叫同志吧。可见，谁都不想跟这个官字沾边。也许就是有这个传统之故吧，我们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称“干部”而不称“官”，以划清为人民服务的人员与当官做老爷的官的界限。

三

然而，孰料七转八转，加上时长日久，为人民服务的人员与当官做老爷的官的界限，在有些人的观念和 behavior 上被模糊了，混淆了，结下不解之缘了。且不说别的，就说这个官倒吧。

官倒源于官商，官商出于干部，而且多属手中有权的干部。这些干部乘今日开放改革之机，或者以权谋私，或者利用“余权”，或者通过种种血缘的纽带，你组一家公司，他搞一个中心，你当个董事长，他任个总经理，于是亦官亦商，有权有钱，左右逢源，财源广进，皆大欢喜；明令禁止嘛，有权在手，怕什么，变个法儿照样在商场上兴风作浪。

有人说，只要干部一旦蜕化为官，这个官就比任何官更官，倘若任其横行，这些蛀虫是非把社会主义大厦蛀倒不可的！

四

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有一段话，骂官最为痛快：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灵魂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为什么官瘾这么深，如此千方百计，孜孜以求呢？不必说那些埋儿刻木的孝

廉，高帽破靴的理学家，八股文的炮制者，连一些发过誓要为崇高理想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也有如逐臭的苍蝇，以求一官，无他，做官是当老谷、发横财的最好门路。

鲁迅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话虽然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说的，今日，仍是抑官瘾，平官商，治官倒的良方，因为人民真的当了家，做了主，什么“官势”，“官腔”，“官话”便都无立足之地，官倒自然都见鬼去了。



《学术研究》1988年1—6期总目录

(括弧内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页数)

总 类

在改革中前进.....编者(4·6)

哲 学

- 略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六个主要特征.....梁 钊(1·14)
- “新三论”与对外开放.....孔幼真(1·50)
- 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吴熙钊(1·55)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要的量变形式.....莫幼立 朱小军(2·34)
- 确定人性的方法论原则之我见.....叶 蓬(2·60)
- “中介”的科学涵义及其不同类型.....姜井水(2·65)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关系.....刘歌德(3·5)
- 形而上学是一门科学吗?
——与肖君和同志商榷.....张系朗(3·47)
- 王充效验论探索
——四评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周桂钿(3·53)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利益矛盾及其调整.....袁惠民 舒日中(4·8)
- 巨大的变化.....(苏)B·布洛夫 李尚德编译(4·83)
- 综合改革试验区人民内部矛盾初探.....秋 田(5·6)
- 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性.....高齐云(5·10)
- 辩证地理解“用足政策”.....马中柱(5·15)
-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农联盟.....彭佩璜(5·18)
-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科学基础的思考.....傅诗济(5·75)
- 认识新探.....肖君和(6·31)
- 适用于普通逻辑的文恩图解.....马铁军(6·37)
- 科技进步与民主发展.....吴志明(6·42)
- 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王 琳(6·46)
- 凡口铅锌矿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体会.....冯秋明 陈先舜 龚天培(执笔)(6·89)

精神文明建设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道德价值观念的进步.....黄春生(1·17)
- 对外开放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
——深圳经济特区的启示.....刘文韶(1·21)
- 广东青年观念变化的考察.....陈镇宏(1·28)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无产阶级党性.....刘经建(2·28)
- 论建设文明厠.....刘 政(2·88)
- 精神产品的含义和特点.....阎文学 母育松(2·42)

观念变革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深入和发展	丘挺 (3·33)
试论生活方式的二重性质	王培林 (3·3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	杨越 (6·24)
近年来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简述	陈明央整理 (6·29)

经 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包心鉴 (1·5)
粮食：广东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张井 (1·31)
重建我国宏观经济的货币调控模型	欧小威 (1·48)
论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于小东 (2·5)
国家所有制改革新思路	丁家树 陈圣河 (2·13)
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市场经济模式及过渡对策	郑炎潮 (2·17)
广东山区经济起飞与工业化政策	路平 张锡洪 梁桂全 黄濯纓 康钟 (2·23)
积累率新探	董继斌 (2·45)
广东近年来运用经济杠杆的回顾与思考	汤世华 (3·9)
海南建省初期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模式构想	何小峰 冯邦彦 (3·13)
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促进县级经济战略转换	
——从化州县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引出的思考	李东辉 (3·20)
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二重结构	李恒瑞 (3·24)
世界华人社区经济模式和展望	何肇发 (3·44)
社会主义个体经济的性质与特点	章新华 范大平 董嘉金 宜民 一中 (3·97)
评“国际大循环”理论	何小峰 (4·13)
不合国情的“国际大循环”构想	
——兼论开放的多元优势次阶跃推进战略	梁桂全 (4·19)
我国特区发展的新阶段及其目标模式	苏彦汉 (4·25)
论市场经济的规律系统	董小麟 (4·33)
试谈经济波动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马留虎 (4·39)
山区工业发展的五个并重	汤彤海 (4·43)
乐昌建设苧麻基地的对策	陈权 (4·46)
镇村企业发展的新形态：集体与个体联营	
——南海县调查	邹灿华 丁锦和 张硕城 (4·80)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平等关系	宋开祥 (5·23)
投资不足：被掩盖的现实	吴强 王雍君 (5·28)
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和抉择	廖建祥 (5·35)
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	张太增 郭利平 杨晓明 (5·39)
走技工贸结合的道路改变民族自治县面貌	龚洪永 (5·41)
扬长补短抓重点	李贤锋 (5·43)
山区劣势中的优势	欧世有 (5·46)
我省乡镇外向型企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欧阳知 (5·52)
成绩显著 形势严峻 试验区怎么办？	
——广东理论界、实际工作者研讨综合改革的理论与对策	本刊记者 郑英隆 (6·6)
中国价格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林江 (6·15)
实现价格改革的配套措施	贾葛辉 (6·20)
韶关毛巾厂的外向型发展经验	本刊记者 郑净 (6·92)

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向.....罗克明(6·95)

法 学

广东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的现状与对策.....周 华(1·37)
从法律上看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两个问题.....张杰林(2·52)

历 史·考 古

戊戌后的康有为

- 思想的研究大纲(摘要转载).....(台湾)徐高阮遗著(1·62)
- 论梁启超对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贡献.....周行易(1·70)
- 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学分析.....乐 正(1·76)
- 刘传大师与石湾陶艺.....于 逢(1·82)
- 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樊树志(1·87)
- 晚清期间香港对内地经济发展之影响.....(香港)霍启昌(2·70)
- 清代台湾与海南经济开发的比较研究.....何 瑜(2·75)
-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概况.....韦庆远(2·82)
- 鸦片战争中的“内鬼”问题.....李 毅(2·87)
- 历史需要不断地重写.....谢本书(3·58)
- 历史的动力与合力
- 兼评刘大年的《说“合力”》.....郑宏卫(3·60)
- 明代广东三十六行新论.....李金明(3·63)
- 近代香港与广州的比较研究.....(香港)陈明隼(3·69)
- 杜国庠与中国经学史研究.....章权才(3·74)
- 近代广东开放与粤人文化心理.....丁旭光(4·59)
- 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1661—1683).....郑德华(4·63)
- 论人的近代化与梁启超的“新民”理论.....陈中凡(5·55)
-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对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影响.....何志慧(5·60)
- 汉代中西交往与社会开放.....丘 进(5·65)
-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
- 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本刊记者 林有能(6·50)
- 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本刊记者 凌 峰(6·56)
- “商团事变”前后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温小鸿(6·75)
- 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李文治(6·80)
- 梁启超是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回国的第一人.....张铁宝(6·87)

教 育

提高办学投资效益的六个途径.....张淮江(2·56)

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教育背景.....杨移贻(4·55)

“教会大学”在中西交流中的历史作用.....景 钟 雷 泉 一 诞(6·84)

语 言 文 学

寻找中国纯艺术精神的根.....刘绍瑾(1·92)

诗与苦闷.....	陶东风 (1·99)
艺术地掌握历史	
——《白门柳》在历史文学意识上的创新.....	吴观澜 (1·108)
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尼.....	许友年 (1·113)
新时期岭南文学的“城市化”趋向.....	柯可 (1·115)
艺术感觉活动中的选择模式.....	杨健民 (2·92)
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发轫与道家哲学.....	李岚 (2·100)
《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	黄挺 (2·104)
关于“戏曲”定名问题的新发现.....	谢柏梁 (2·110)
苏轼居琼时期的一篇佚文.....	朱玉书 (2·112)
段玉裁与金石铭刻之学.....	李中生 (3·80)
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意义.....	伍铁平 (3·84)
语言学与多学科交叉.....	周小兵 (3·88)
广东粤语分区刍议.....	詹伯慧 (3·91)
《诗经》战争诗思想特征浅说.....	赵沛霖 (3·94)
李清照诗的艺术特色.....	刘杰超 (3·100)
认同与融合：闻一多的文化观.....	吴宏聪 (4·49)
刘轲生平及著述考略.....	汤擎民 (4·68)
《清诗纪事》小议.....	陈永正 (4·73)
岭南文学形成的条件.....	黄伟宗 (4·75)
岭南文学的基本特征：融合.....	李树政 (4·77)
论严羽的审美理想与时代的关系.....	韩湖初 (5·71)
文化的人本能动性与其结构规律性.....	(香港) 鲁凡之 (5·79)
我们如何借鉴陈先生.....	王季思 (5·84)
《文心雕龙》的修辞论.....	谢红华 (6·60)
论艺术心理治疗的意义.....	丁宁 (6·65)
粤北古代知名诗人述略.....	黄志辉 (6·70)

答 记 者 问

美国系统工程学者依·拉兹洛谈中国改革与哲学.....	本刊记者 张硕城 陶原珂 (4·87)
波兰经济学家谈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进程中的“风险”与对策.....	本刊记者 张硕城 (5·49)

小 品

漫话诺贝尔的一项设想.....	秦牧 (4·90)
“余热”小议.....	杨浩泉 (4·92)
一三三四.....	老烈 (5·92)
杂感二题.....	石成 (5·94)
闲话“人之初”.....	岑桑 (5·95)
论腐败.....	舒展 (6·100)
杀鸡吓不住猴儿.....	老烈 (6·103)
治官倒良方.....	杨浩泉 (6·105)

新 书 评 介

宏观经济调节理论的新建构

- 读王琢《宏观经济调节论》……………袁耀文(1·116)
- 老牛拓荒喜新获,近代文学终有史
- 读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吴定宇(1·118)
- 评《社会主义改革十论》……………文心田(2·118)
- 一本反映山区改革的新书
- 《南雄特色研究》读后……………韩忠本(2·120)
- 以微见著 推陈出新
- 读《诗经探微》……………夏棻树(2·122)
- 异军突起的《审美中介论》……………刘伟林(3·106)
- 兼取众长,别开生面
- 评《庄子浅论》……………刘绍瑾(3·108)
- 读史使人明智
- 《简明广东史》读后……………张磊(5·89)
- 评《〈资本论〉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同一性》……………傅小平(6·40)

广东专家动态

- 新种葱茏竹万竿
- 王季思教授近况……………林建 叶献高(1·120)
- 我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
- 梁钊韬教授临终前的采访……………张超(1·122)
- 张元元漫谈世界经济的趋势与广东进一步开放的契机……………本刊记者 周华(2·114)
- 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主义
- 迟轲教授答客问……………本刊记者 刘斯翰(2·116)
- 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 访中外关系史专家朱杰勤教授……………本刊记者 凌峰(3·102)
- 陈胜旻教授谈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突破……………本刊记者 林有能(3·104)

书海酌蠡

- 《严复集》外佚文二篇……………官桂铨(1·16)
- 《辞源》疏漏一例……………欧阳世昌(1·54)
- 新发现的梁启超致犬养毅函……………陈占标(1·69)
- “时时”解诂……………董志翘(1·81)
- 《中国历代年号考》补考……………官大梁(1·107)
- “结轨”说义……………王继如(2·22)
- 《邶风·燕燕》是两诗误合?……………边家珍(2·33)
- 《楚辞·抽思》“憺憺”解诂……………曹小云(2·51)
- 黄遵宪任驻日使馆参赞的正确时间……………张小莹(2·81)
- “胸中略转”新解……………陈伟武(2·123)
- “不以阻隘”小析……………唐钰明(3·23)
- 释“猗彼女桑”……………张剑(3·32)
- 孙中山史实订误一则……………迟云飞(3·62)
- 《敢问交际》章疑词试解……………黔容(3·68)
- 冯梦龙同名异人辨正……………易名(3·96)

徐干附曹在建安十一年·····	熊清元(4·24)
枢密院始于晚唐·····	齐辛(4·38)
梁红玉籍贯小考·····	钟士和(4·48)
《茶经》成书时间考·····	杨浩(6·30)
客方言——“牵阳叛”的语源略释·····	潘允中(6·88)
文天祥佚文·····	官桂铨(6·99)
《易·讼》九二爻辞解·····	黔容(6·104)

学 术 动 态

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省(区)、市社科联第三次协作会议纪要·····	(1·124)
广东比较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侧记·····	(1·126)
全国第三届青年工作理论研讨会简述·····	(1·128)
“横向经济联合的法律问题”研讨综述·····	(2·124)
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2·126)
广东哲学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的探讨·····	(3·57)
广东党校系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辩证法”研讨会综述·····	(3·110)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简述·····	(3·112)
关于所有制、产权与企业改革讨论会综述·····	王定坤 金建(4·93)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林亚杰(4·95)
广东九月召开大型“综合改革试验区理论与对策”研讨会·····	石成(5·9)
《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第一卷出版·····	(6·28)
本刊参加广州地区报刊咨询活动·····	(6·41)
广东省青年书法理论研究会成立·····	(6·91)

崛起的外向型企业——(广东韶关毛巾厂)



座落在芙蓉山下的韶关毛巾厂（正门）



厂长朱日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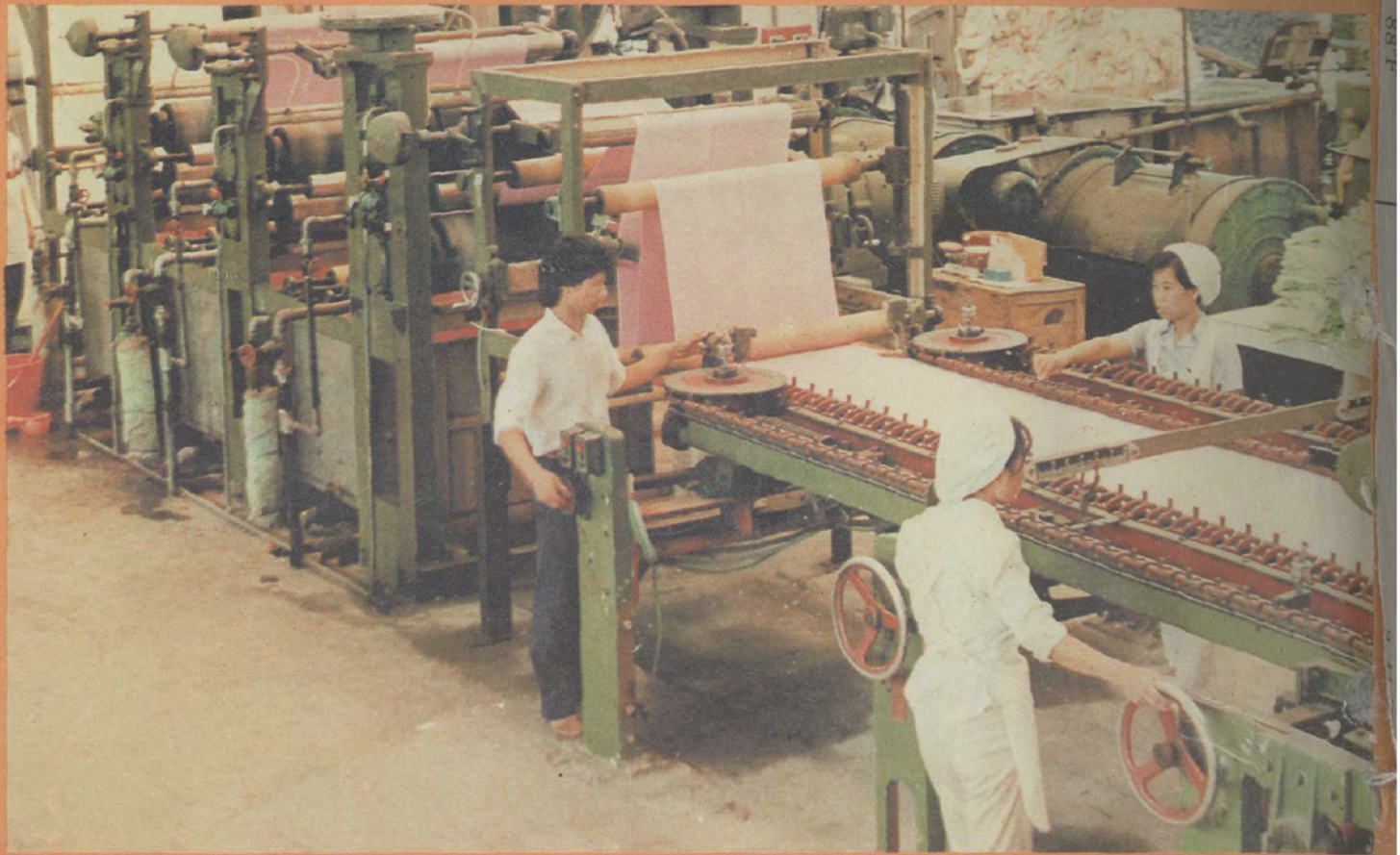
韶关毛巾厂领导班



“青松”206毛巾荣获部优产品称号；“粤北风光”大提花沙发巾荣获广东省“四新”优秀产品奖；5506提花毛巾被荣获广东省纺织图案设计优秀奖。该厂目前生产的十余个系列产品98%出口，年创汇超100万美元。

厂址：广东省韶关市河西5公里
 电话：80525
 电挂：6080

年出口创汇超100万美元 韶关毛巾，走向世界



科学管理出效益——该厂生产车间之一。

引进、消化国外80年代最新技术设备，促进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左图是该厂引进的西德剪绒机；右图是引进瑞士贝宁格公司生产的整经机。

